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八 2024. 2

“我们的文化至今仍在流浪，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度。”

曼德尔施塔姆

时世逝 | 燕妮·埃彭贝克

文学之冬 | 乌维·维特施托克

隐秘的终点 | 娜塔莎·特雷休伊





小说

新书试读 | P.03 时世逝 燕妮·埃彭贝克

P.09 “我拒绝出生，可以吗？”李琴峰

P.15 回归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P.27 维米尔的送奶女工 / 物品 马努埃尔·里瓦斯

非虚构

新书试读 | P.31 “迄今为止对俄国的最佳描述”，百年前的评价并不过时 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

P.39 “我们的文化至今仍在流浪，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度。”曼德尔施塔姆

P.47 一部独特的女儿回忆录，直视深埋的创伤记忆 娜塔莎·特雷休伊

P.55 1933 年，46 天里，集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命运 乌维·维特施托克

P.63 1839 年，当一个叛逆的女人来到江户 艾米·斯坦利



题图为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 剧照

iv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如果在阅读使用小鸟文学 app 时遇到什么什么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启动相关应对措施。

小鸟问答 Vol.38

小鸟 | 小鸟问答

大家好，拜个早年。

i

订户到目前，还没有阅读上的麻烦。

继续提醒：

新一年每月一卷会继续出现在书架上，付费用户可以随时下载。

我们大约在下一个月十号左右，推出前一个月的 PDF。

因为眼下小鸟文学还处于正常使用状态，目前还没有为用户邮箱推送 PDF 文件。

如果你换了手机，而且没有迁移过去软件的话，可能难以下载；如果发生比较大的操作系统升级，而我们因为没办法在应用商店上新版本，可能会丧失一些重要功能，直至无法使用。

ii

有读者写长文来与我们探讨杜斌。替我们总结杜斌画像如下：少年老成；聒噪；用词轻薄；大词喧哗的肤浅；各个“口”。同时感慨，这样的少年是如何出现。

不但是真的。而且还有所掩饰。每每我们也会瞠目结舌。不过细想，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只是程度不同。杜斌更明显一些。更直接一些。“我为你好”，“我觉得你过得不好”，“我来为你规划什么是好”，实际上不过就是我们生活日常。

iii

封面的鸟

二月的小鸟叫攻胸白斑翅雀，Rose-breasted grosbeak。

长版封面上的另一只小鸟叫猩红丽唐纳雀，Scarlet tanager。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Aleksandr Eremin](#) on Unsplash

小说

时世逝

燕妮·埃彭贝克 | 新书推荐

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彼此的苦难，
并且共享和平？

一个柏林人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突然闯入一群陌生人，他们说着混杂破碎的语言，从战火纷飞的非洲越海辗转来到德国。“二战”的早年经历让柏林人无比珍视秩序，“在混乱中没有自由可言”。然而作为前东德公民，柏林墙的记忆从未远去，在自己的国家过着一种移民生活也并非陌生的经验——三十年前，他的国家和属于它的未来在一夕之间消失了。阴差阳错，他与难民们成了朋友，了解了他们颠沛流离的过往，并且深刻地参与到他们的故事当中。“只有他们今天在德国生存下来，才说明希特勒真的战败了。”

《时世逝》是一个与他者相遇的故事：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彼此的苦难，并且共享和平？燕妮·埃彭贝克直面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道德问题，“以文学的形式介入欧洲关于种族、移民、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议题，有力地回应了当下日益深重的危机”（布克奖评委会）。

以下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世界之初，是包含万物、毫无分隔的整体：女性和男性，空间和时间，相似和差异。这个整体在虚空中被分隔开，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女性是聚合的形体，由原始物质构成，女性先出现，之后才有男性，男性是更轻的、运动着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也是这样产生。但这些形态互相依存，不分层级，互相补充，维持着一个整体，一个独立的实体。同样地，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像身体中功能不同的器官，发挥不同的作用，彼此密不可分。最后，还有不同的部落所组成的“政治躯体”。图阿雷格人说：在六十年代，法国人把他们原有的领地分成了五个不同的国家，切开了他们的躯体。

理查德在看书。

他开始读希罗多德，他在公元前五世纪写过加拉曼特人，图阿雷格人的祖先。希腊人从柏柏尔男人那里学到了驾驶战车的技艺，从柏柏尔女人那里学会了诗学。直到今天，年老的柏柏尔女人还会在日出前和夜晚歌唱：

在人富有之时，
死神离他很近。
死亡比时间更大，死亡包含时间。
就在此刻死神射出一支箭，箭落下，
射中了人群。

至少三千年前，图阿雷格人的祖先从现在的叙利亚（甚至可能是从高加索山脉）出发，穿过埃及来到北非，那整片地区在古代叫利比亚，还包括了现在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他们从那里进一步迁至西边和南边，直到现在的廷巴克图、阿加德兹和瓦加杜古。

理查德读着。阅读的时候，他对希腊神话世界的理解发生了转变，这本是他的专业领域，突然却有了新的认识。对希腊人来说，世界的边界在今天的摩洛哥，在阿特拉斯山脉，阿特拉斯在那里撑起天和地，这样乌拉诺斯就碰不到盖亚，也伤害不了她了。今天叫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地方，都属于世界尽头以内的世界，即世界本身。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巨人安泰俄斯站在利比亚的沙地上通过和他母亲——和大地的连接——获取力量，若想战胜他，只能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将其举到空中，切断安泰俄斯和大地母亲的连接。有着猫头鹰一般深色眼眸、被很多学者称为黑色女神的雅典娜，被养父特里同在特里同湖边养大，那里今天叫突尼斯。极为尊崇雅典娜的亚马孙人，本是被称作“亚马奇格人”的柏柏尔女战士，她们在湖岸边跳舞，从那里出发去战场——她们讲塔玛舍克语，也就是几周前理查德从二〇一九号房间的阿波罗口中听到的语言，当时他对这片神话土地地形的认识还是完全错误的。

理查德读着。

就连美杜莎，头上缠绕着蛇发、能将每个迎上她目光的人石化的戈尔贡女妖，据说也曾是利比亚一个美丽的柏柏尔女孩，一个战绩卓著的女战士。在利比亚海岸，她和海神波塞冬在一座雅典娜神庙里交合，愤怒的雅典娜于是给了这个亚马孙女人恐怖的外表，并给了玻耳修斯一面用镜子做的盾牌，可将戈尔贡女妖的目光反射出去，借此方法才能破解石化，砍下她的头颅。从美杜莎被斩下的头颅中流出的血，落到利比亚的沙地上变成了蛇。理查德读着。不，这一定不是巧合，如今牧群和帐篷依旧归图阿雷格的女性所有，她们能自己选择男人，自己决定离婚，她们不戴面纱，但男人外出必须戴，女人拥有继承权，而且依旧因她们的诗与歌而闻名，是她们教孩子们写字，就是那些曾被希罗多德的双眼看到过的文字。

在退休几周后的十一月的这天，理查德读到的东西其实已经伴随他一辈子了，然而直到今天，由于迎面扑来的一小部分知识，一切又重新组合，变得不同。人们要对已知的事物重温多少次，发掘多少遍，撕开多少层面纱，才能深入骨髓地理解一件事？人的一生够吗？他的一生够吗——别人的呢？

他看了柏柏尔人有可能行经的路线：从高加索山脉出发，穿过小亚细亚和黎凡特，直到埃及和古利比亚，到了现在的尼日尔，又从尼日尔回到现在的利比亚，穿过大海，到达罗马和柏林，几乎在地图上画了一整个圆周的四分之三。人类跨过大洲的迁徙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从未停止。贸易、战争、驱逐，人们跟着牲口迁徙，寻找水源和食物，躲避旱灾和瘟疫，寻找黄金、盐和铁，由于对神的信仰而不得不离散他乡，衰落、改建、重建和占领。行经之路有好有坏，但迁徙从未停歇。若要向学生解释他所说的这些过程只是自然规律，无关道德，理查德只需朝窗外指一指：曾经令人欣喜地伸展的树叶，如今都躺在草地上，而下一个春天的嫩芽已经含苞待放。可现在没有学生向他提问。

理查德读着。

他读到加拉曼特人湮灭的城市，读到他们消逝在风沙中的城堡，向南穿过沙漠的商路起点人口稠密，那里的绿洲之下是构造精巧的灌溉系统。而现在，卡扎菲倒台后，人们终于从卫星图像上看到，利比亚的原住民不是未开化的强盗，而是曾在技术上走在时代前沿的人——理查德在过渡期政府的网站上读到。这个网站是两年以前的。卡扎菲对古代研究领域的忽视应视同犯罪，两年前，人们期盼有一个新的开始。不久后，利比亚人终于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被掩盖的、只属于他们的历史。虽然那位主持项目的教授在动乱中撤离了，不过一旦利比亚的形势稳定下来，他就能得到欧洲机构的资助，重新启动研究。两年后的今天理查德才知道，各自为政的民兵组织在卡扎菲倒台后，将利比亚彻底变成了战场。过去两年间，利比亚人根本无暇寻根问祖，他们只顾得上求生。卡扎菲只给了本国的历史学家一些少得可怜的资助，这或许是事实，但现在欧洲人也冻结了资助，历史研究者们这两年或许已经流亡在外，加拉曼特的堡垒、城镇和乡村被穿着制服的文物狩猎者们拿去研究，所有可以换成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而加拉曼特人的后裔在现在的利比亚被当作外国人，正如两年前坐船被赶到欧洲的难民。若想衡量一个时代是否在进步，应该在多长的时间跨度上考虑？

理查德继续读着。

朋友打来电话约他散步时他还没吃午饭，天就要黑了。西尔维娅说，德特勒夫在后边喊道，托马斯也过来。

托马斯不是整个周末都要待在家里吗？

没有，他太太的表妹来看她了。

胖胖的托马斯，曾经的经济学教授，后来变成了计算机专家，一边走一边点了根烟。就剩六根了，他说着晃了晃烟盒，装回大衣口袋。太太每周限额给他的三盒，就剩这一点了。下周一才能拿到新的。

朋友们点点头。

理查德、托马斯、西尔维娅和德特勒夫都住在相距不到十分钟步程的地方，但要不是西尔维娅今天叫他们，他们是不可能见面的。

那些非洲人怎么样了，德特勒夫问。

马上要搬家了。

非洲人？托马斯问。理查德跟他简短讲了那些他已经和另外两个朋友讲过的故事。理查德也讲了雅典娜女神，美杜莎、安泰俄斯，还讲了和阿波罗的约定。

但阿波罗之前在提洛岛啊，托马斯说，虽然他之前的专业是经济史，但懂的其他东西几乎和理查德一样多。

对对，理查德说，不过我说的是那个难民阿波罗。明天阿波罗来我这儿，帮我为花园过冬做准备，我一个人没办法把船拉上岸。把船拉上岸，用石头固定 / 以免四面来的潮湿的劲风将其吹走 / 桨也要取出，不然宙斯的雨会将其腐蚀。

《工作与时日》，托马斯说。

《工作与时日》，理查德说。托马斯是唯一一个能像他一样随口背出赫西俄德的朋友。

要不是我的腰不好，我就去帮你了，德特勒夫说。

我知道的，理查德说。

这个阿波罗是图阿雷格人吗？托马斯问。

是的。

尼日尔来的？

对。

你跟他问好之前，最好用盖格计数器测一下他的放射性。

我知道，理查德说。

为什么啊？西尔维娅问。

世界上几乎没有别的国家像尼日尔那样，有这么多铀，理查德说。

他们走了几棵松树和橡树，一条属于一对老夫妻的狗跑了过去，它叫科尼亞克，经常乱跑，理查德向德特勒夫和西尔维娅——他俩大概不知道尼日尔在哪儿——说起法国的国营康采恩阿海珐，它垄断了那里的铀矿，还把垃圾运到图阿雷格人喂养骆驼的土地填埋。当然，人也住在那里，他说。

天上有几只飞向非洲的鸟，正组成一个三角队形。那座荒废的房子，自从被租给柏林的大学生后，邮箱被漆成了粉色。

理查德说，那里的饮用水源已经被污染了，骆驼接连死去，人们得了癌症却不知道为什么，但那里发的电被传送到法国，也会传到我们这里，德国。

我们这里，德国，德特勒夫重复了一句，理查德不确定，让德特勒夫惊讶的是内容本身

还是理查德的表达。那个叫德国的国家，不久之前还只在墙的另一边。啊，理查德说，似乎是在为自己将两个德语国家统称为一个而道歉。

托马斯说，另外，这个康采恩每年的收入要比尼日尔全国的收入多十倍。

这个你又是从哪里知道的？理查德问。

就是从什么地方读到过，托马斯回答，把烟灰弹向路边的沙子。

真的很糟糕，理查德说，1990 年图阿雷格人组织过一次起义，一场屠杀后一切恢复了平静。但几年前，同样的事重演了。

沙地上的凹陷用碎砖碎瓦铺平了，肯定是为了保护车子的减震器。

唯一想把法国人撵走的政府，很快就在政变中被干掉了，托马斯说。不知道是被谁。

我们往回走吧？西尔维娅说，每次他们散步到住宅区的尽头，她都这样问。他们拐进了一片树林，沿着蜿蜒的小路折返，空气中仍然有蘑菇的气味，虽然现在所有的蘑菇可能都已经腐烂了。

基地组织也听说了尼日尔的铀，理查德说。问题还是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和反对尼日尔政府的图阿雷格人结盟。

或许一方能容下另一方，德特勒夫说。

是啊，理查德说，沙漠很大，容得下很多条战线。

西尔维娅说，这个康采恩在尼日尔做的事，和理查德刚才讲的故事一样，赫拉克里克把安泰俄斯从大地上举起来，让他失去力量。

德特勒夫说，纽伦堡足球俱乐部的球衣上不是也有阿海珐的标志吗？

应该是吧，理查德边说边想，他们聊着天，在回去的路上又路过了那个女公务员的房门口，每次有邻居走近一点，她就会让他们交两千欧元的罚款。他们又路过了一座房子，钓鱼俱乐部的老板在房前挂上了德国国旗。他们路过刚过去的夏天无人问津的游泳区。他看见西尔维娅挽着德特勒夫的胳膊，托马斯看了一眼烟盒，皱了皱眉，又放回外套口袋，没拿烟。他想，就在这一刻，这里的四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手、膝盖、鼻子、嘴、双脚、眼睛、额头、肋骨、心脏或者牙齿。

如果打电话邀请他、托马斯和其他几位柏林老友出来散步的西尔维娅不在了，会怎样呢？

一整个夏天，船就拴在栈桥边上，但因为那个丧身湖中的男人，理查德一次船都没用。前几晚下了大雨，船里的水再多一点，就要沉下去了。就像把一条喝醉的鲸鱼拖到岸边，两个男人帮它登陆，这样他们就能爬到划手座，把水舀出来了。

你是哪年出生的？理查德问。

1991 年，阿波罗说。

和理查德想的一样。

哪个月呢？

一月一日。

尼日尔镇压图阿雷格起义的八个月后，理查德昨天还跟朋友讲过那场大屠杀。他想到了，但没有说。他说：

正好赶上跨年烟火，你真幸运。

这个日子是意大利人定的，如果你没有证件的话。

明白了，理查德说。

他们舀了一会儿水。

过了一会儿，理查德又说，我在网上看到，你们挖很深的井，然后用驴把水拉上来，这是真的吗？

是的，绑在桶上的绳子有多长，驴子就要走多远。然后再走回来。每天大概要三四个小时。太费劲了。

牲口也需要水。

为什么不能把绳子缠起来？用架子或者把手？

沙子固定不住。

那打井的时候，一定也很危险吧。

对，很多人被埋进去了。

他们往船下铺了圆木和锯下来的树干，把船滚到整个草坪的边缘。理查德昨天还读到，由于浸渍矿石需要大量的水，那里矿井周围的水平面有明显下沉。

你知道阿尔利特吗？

当然，我就住在那儿，阿波罗说。

不久后，世界就有机会讨论图阿雷格人了，因为法国部长考虑重点推进已经开始的项目。确定要实施的撒哈拉铁路计划全部实现后，轰鸣的火车将出现在沙漠上，成为灵活的骆驼的对手，这将成为沙漠之子的悲剧。他们想保护文化，却会被精确瞄准的火药和白兰地击退，直到他们像美洲印第安人曾经那样，向文明人交出他们的土地。这篇文章是1881年，也就是新闻业刚诞生的时候，刊登在《凉亭》杂志上的。虽然撒哈拉铁路最终没有实现，差不多一百年后，法国人却在自己的前殖民地上大肆开采铀矿。

文化，理查德想。进步，他想。

他说，当心，你把船翻过去，我去扶着另一边。

理查德扶着船时，阿波罗拿来圆木，放在船下。然后他们缓慢地将船身翻过去，直到它倒扣在地上。

但你没有在阿尔利特的矿上干过活儿，对吗？

没有，我们有骆驼。

你跟过商队吗？

跟过。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

去利比亚卖骆驼。

你从多大年纪开始去的？

十岁左右。我们从十岁就能跟着男人们走了。

商队大概有多长时间在路上？

几个月，有时候一整年。

在沙漠里？

对。

你们怎么认路呢？

我们知道路。

我知道，可怎么认路呢？

这个图阿雷格年轻人耸了耸肩。

我们知道路。

理查德很想弄明白。他站在那艘倒扣在地上的船旁边，和一个穿越了三千五百公里来到他的花园帮忙的年轻人站在一起。

你们是通过星星认路的吗？

对。

白天呢，没有星星的时候？

男人们知道一路上会发生什么。

什么时候？

总是知道。

一直都这样？

对。

他们会跟你讲吗？

对。

走路的时候讲？

我们不走路，我们骑骆驼。

这样啊。

晚上会讲故事。

他们是通过这些故事来认路的？

对。

理查德沉默了。他当然知道，《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在荷马或别的谁第一次把它们记录下来之前，都是口头流传的。但对他来说，空间、时间和诗的关系从未像此刻一样清晰。只有在沙漠的背景中，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这个原则，一个在世上任何角落都一样的原则：没有记忆的人只是地球表面的一块肉。

之后他们修剪了草坪，把花园里的家具搬到檐下，给理查德整个夏天都没用过的橡皮艇放了气，把林子里的木柴搬到壁炉旁，把烤架拆了下来。然后，理查德向这位和他想象中的阿波罗长得一模一样的难民付了酬劳，五十欧元。



燕妮·埃彭贝克

1967年出生于东柏林，德国作家、戏剧导演，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客乡》《白日尽头》《时世逝》，中篇小说集《文字之书》，另著有多部剧作、散文。曾获得汉斯·法拉达奖（2014）、《独立报》外国小说奖（2015）、托马斯·曼奖（2016）、斯特雷加文学奖（201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2017）等，入围“诺奖风向标”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24）。其作品已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insung_yoon](#) on Unsplash

小说

“我拒绝出生，可以吗？”

李琴峰 | 新书推荐

生命的自主权，到底由谁说了算？

《出生意愿确认》的故事发生在 50 年后：人类生育领域科技树到达顶峰，胎儿在预产期的两周前能自己决定“是否分娩”。最终是“出生”还是“退出”，父母都要接受孩子的意愿。如果违背胎儿的意愿执意生产，父母就会被视为罪犯而被社会排斥。“出生意愿确认”成为美丽新世界的进步公约……

东京，普通职员立花彩华腹中，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即将接受最后一次出生意愿确认的彩华，能否顺利生下这个孩子？

以下经野 spring 发布。



“嗯，健康状态良好。”

医生一边看孕检报告，一边微笑着慢慢点了好几次头，“看来你很注意饮食嘛。”

“是的，精准无误。”

听到陪我一起来做检查的佳织活力满满的回答，医生便笑着揶揄我：

“立花小姐真是一位好太太呀。”

我莫名地有些不好意思，错开目光，轻轻拍了拍佳织的胳膊。

怀孕以来，佳织大概是以我的专属营养师自居了。她看书、上网查了各种各样的资料，配合怀孕周数，每天都做饭给我吃。早饭和晚饭不必说，她还会为我准备午饭便当。凛凛花最开始取笑我带“爱妻便当”的时候，我还不好意思，但现在已完全习惯了。佳织偶尔没时间做饭，我们去外面吃或点外卖时，她也会充分考虑营养的均衡搭配。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好笑，认为她不用这么拼命。但有了佳织的帮助，我真的轻松了许多。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已几乎不可能出现流产或死胎，但怀孕给母体带来的负担却依旧未变，医院鼓励孕妇定期接受体检。怀孕后，我每个月都要体检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

“继续努力，二位一定会生下一个和你们一样健康的女孩哦。”

医生说着将体检报告递给我，报告里记载着各项数值：身高、体重、血压、荷尔蒙浓度、血糖。医生说得没错，没有一个异常值。

接着，医生从文件夹中拿出一沓用订书器订好的纸，纸上印着密密麻麻的黑字。终于来了——看到那沓纸，我感到手心汗津津的。医生大略看了一眼，也将它递给了我。

“这个是生存难易度测定报告，立花女士是第一次测吧？知道怎么看吗？”

接过报告，我闭上眼做了个深呼吸，这才将目光落在纸上。身旁的佳织也探着脖子看我手里的报告。我能感受到，她的胳膊在微微颤抖。

*** 胎儿生存难易度测定报告 ***

报告编号：※※※※

性别、年龄：女，28岁

病历编号：※※※※

测定日期：2075年10月21日

产妇姓名：立花彩华

测定次数：第一次

出生年月日：2047年10月8日

怀孕周数（妊娠手术后）：14周

（以下略）

【胎儿基本信息】

国籍（预计）：日本

出生地（预计）：东京都 ※※市

（以下略）

【胎儿遗传基因信息分析】

生物性别：女

性别自我认知：8（男1～女10）

性别不一致倾向：未检出

性取向：3（异性1～同性10）

先天性疾病或残障：未检出

智力水平：110（标准值：70以上）

容貌评价：120（标准值：70以上）

（以下略）

【预计监护人A评价：综合】

经济状况：213（标准值：100以上）

社会地位：276（标准值：100以上）

智力水平：115（标准值：70以上）

情绪稳定程度：125（标准值：70~225）

慢性病：无

残障：无

（以下略）

【预计监护人A评价：生活习惯】

饮酒频率: 3 (最小值 0 ~ 最大值 10)
酒精依赖度: 1 (最小值 0 ~ 最大值 10)
吸烟频率: 0 (最小值 0 ~ 最大值 10)
其他依赖症: 无
(以下略)

【预计监护人 A 评价: 价值观】
现实性: 75 (最小值 1 ~ 最大值 100)
伦理性: 60 (最小值 1 ~ 最大值 100)
艺术性: 45 (最小值 1 ~ 最大值 100)
灵活性: 70 (最小值 1 ~ 最大值 100)
支配性: 40 (最小值 1 ~ 最大值 100)
(以下略)
宗教倾向: 135 (标准值: 100 ~ 200)
政治倾向: 245 (标准值: 200 ~ 300)
(以下略)

【预计监护人 B 评价: 综合】
(省略)

【外部环境评价结果】

生存难易度指数 (日本) : 45.5 (最小值 10 ~ 最大值 100)
生存难易度指数 (世界) : 57.9 (最小值 10 ~ 最大值 100)

【综合评价结果】

胎儿与预计监护人 A 匹配度: 77 (最小值 10 ~ 最大值 100)
胎儿与预计监护人 B 匹配度: 83 (最小值 10 ~ 最大值 100)
胎儿生存难易度: 3 (最小值 1 ~ 最大值 10)
胎儿同意出生概率 (根据日本统计数字计算) : 97.8%

我跳过长达十几页的测定结果清单, 确认了最后的数字, 终于松了口气, 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身旁的佳织也吐出一声放心的叹息。

生存难易度, 是指评估将要出生的孩子即将度过的人生难易程度得来的数值。这个数字与胎儿的性别、性取向、国籍、出生地区、有无先天疾病和疾病的轻重程度、智力水平及才华的多寡、监护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胎儿和监护人的匹配度等参数息息相关, 是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的。一般来说, 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会比没有先天疾病的孩子活得痛苦, 监护人社会地位低的孩子会比监护人社会地位高的孩子活得痛苦。测定这些参数需要分析胎儿的遗传基因信息, 目前的科学技术无法测量孕期不足十三周的胎儿生存难易度,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接受检测。

当然, 各项参数对生存难易度的影响幅度会依时代变化而不同。女人比男人的人生痛苦许多, 同性恋比异性恋的人生痛苦许多, 这在几十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 但随着《歧视缓解法》和《平等推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完善, 社会层面也产生了意识改革。如今, 托这些因素的福, 性别和性取向对生存难易度的影响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但放眼全世界, 还有不少女性和同性恋者因地域或文化差异而承受着差别待遇, 甚至遭到性命威胁。所以性别和性取向仍然是评估生存难易度的重要参数, 尽管它们对生存难易度的影响已经不大, 但仍会作为一项重要因素纳入考量。同样, 虽然日本社会对先天性疾病患者或残障人士的歧视早已不复存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 疾病和残障必然会影响人生的选择。据说生存难易度会根据疾病或残障的种类和程度不同而剧烈变化。为了反映社会变化和世界局势, 厚生劳动省每三年便进行一次舆论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优化生存难易度的计算公式。

“第一次检查的误差是比较大的, 不过随着胎儿的成长, 精准度会逐渐提高。看上去, 二位会成为很棒的监护人, 孩子一定会放心出生的。”

医生带着温柔的微笑, 看看我, 又看看佳织, 缓缓地点了好几次头。我和佳织对望着, 朝彼此嘿嘿一笑。

在生存难易度的计算上, 孩子和监护人的匹配度是重要的参数之一。想来这也是必然的——如果孩子和佳织一样是同性恋者, 却出生在父母厌恶同性恋的家庭, 那对孩子和

监护人来说都是不幸。遇到这种情况, 胎儿和监护人的匹配度就是糟糕的, 生存难易度数值会猛地提升, 同意出生的概率也会相应降低。若想降低胎儿的生存难易度, 监护人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价值观。

为了准确测定胎儿与监护人的匹配度, 胎儿和监护人都必须接受测试。测试会检验监护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政治观、宗教观等多方面因素, 将其数字化。如果监护方在价值观等方面有明显的倾向, 胎儿的生存难易度也很可能会提高。

此外, 国内和世界的生存难易度指数也会影响个体生存难易度的数值。生存难易度指数是衡量治安、社会发达程度、地缘政治风险、战乱、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持有数量、气候、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之后, 综合体现国内和世界生存难度的指数。每年由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的指数, 由专门的国际组织公布世界平均指数。近年来, 受到气候变暖、异常天气、环境破坏等方面的影响, 世界的生存难易度指数年年攀升, 国际组织每次公布上调后的指数都会成为重大新闻。幸运的是, 政府一直努力打造“适合所有人生存”的社会, 因此和世界普遍情况相比, 日本算是一个宜居的国家。据说随着海平面上升, 一些近期可能被海水淹没的国家的生存难易度指数已经逼近一百, 几乎没有胎儿同意在那里出生。还有专家认为, 世界生存难易度指数超过八十的那一天, 就是人类灭亡的开始。

“现在日本整体的同意出生概率如何?”我把想到的问题抛给医生。

胎儿的生存难易度最终被评定为从一到十的十个阶段, “一”是“非常容易生存”, “十”是“活着极为痛苦”。胎儿九个月后, 医院通过特殊装置将这一数值告诉胎儿, 进行出生意愿确认“你大概会拥有生存难易度为三的人生, 愿意出生吗?”——大概就像这样。这一数值是胎儿决定是否出生的唯一判断标准。有批评意见认为, 只凭一个数字就让胎儿做如此重要的决定, 未免太残酷了。但胎儿对这个世界还没有任何认知, 实在难以向其传达更多信息。

当然, 基于上述因素计算出的生存难易度也有不完备之处, 意外的事故、疾病或自然灾害等无法预测的未来事件产生的影响无法纳入考量。即便如此,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 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仍然很小, 以至于可以算在误差范围之内。诸多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已经证明, 现代社会中, 决定人类生存难易度的大部分重要因素都由遗传基因编码和社会相互作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可测定的参数构成。

“这个嘛。”

医生咔嗒咔嗒地敲击键盘, 在电脑屏幕上调出一份统计表。

“根据日本的统计数据生存难易度为五的时候同意出生概率为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说, 一百个胎儿中, 有九十五人会选择出生。即使生存难易度为七, 同意概率仍然高达百分之七十哦。不过, 难易度上升为九的时候, 同意概率还是会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我想起自己那份同意出生公证书中的数字。我没有先天性疾病或残障, 也没有突出的智力水平, 父母是达到平均水准的日本人, 生存难易度是四。即便如此, 我还是在人生中历尽了形形色色的挫折, 不曾觉得活着多么容易。如果某个人的生存难易度为五, 就意味着他将度过比我更痛苦的人生。但即使这样, 仍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胎儿选择出生。生存难易度为七时, 同意出生率仍然有百分之七十。明知道人生不会过得轻松, 孩子们还是想来到这个世上。想到这些胎儿如此勇敢, 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酸。

“但即使生存难易度为一, 还是有胎儿拒绝出生吧?”

佳织突然在我身旁提问。

“此话不假。每个人的性格、人格都不相同, 胎儿也和我们一样。有的胎儿勇于接受挑战, 即使人生艰难仍想来世上一遭; 也有无论如何都害怕出生, 一味拒绝降临人世的胎儿。还有的胎儿性情不定, 没有特别的理由, 就是有时候拒绝、有时候同意, 让妇产科医生也很难办。”

佳织不说话了。或许是看穿了她的不安, 医生语气沉稳地安慰道: “别担心, 要不要出生都是胎儿的意愿。监护人的职责就是珍惜腹中的胎儿, 守护他们的成长, 尊重他们的意愿。只要做父母的做到这些, 胎儿也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是啊, 佳织。别担心, 一定没问题的。”

我紧握着佳织的手, 把这句话说给她听, 也说给自己听。一定没问题。百分之九十七点八的同意出生概率哪会那么轻易就落空呢? 佳织也紧紧地回握了我, 她柔软的肌肤让我感到温暖和内心的坚定。这比报告书上的数字更让我放心。

结账后, 我和佳织手拉着手走出诊所。秋分早就过了, 可气温仍然很高。走到户外的瞬间, 热气从正面袭来, 裹住了我的全身。

“好热。地球到底是怎么了?”

佳织把手挡在额头上, 边遮阴边说: “这世界如此乱套, 孩子们竟然还想出生。是我的话就算了, 绝对算了。”

“日本还算好的了。听说有的国家因为沙漠化或热气流严重，几乎要无法居住了。”

“也是哦。”佳织莞尔一笑，问道，“怎样，要打车回去吗？”

这家诊所开在离家最近的车站前头，步行到家要二十分钟。走回家也不是不行，但佳织大概是体谅到我的辛苦，说在大太阳下走路身体的负担太重、对孩子不好什么的，总是为我打车。我平时都恭敬不如从命，但今天第一次拿到生存难易度测定结果，我情绪激动，说不上为什么，想散步回家，并顺道转一转。

“我们走着回去吧，我想去商业街随便走走。”

“啊——这么热还要逛街？”佳织不情不愿地

嘟囔着，但还是顺了我的意。我拿出遮阳伞撑开，佳织也挤了进来。

耳边传来一阵吵嚷声，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队示威游行的群众正拐过商业街的街角，走向车站前的大马路。

那支队伍由十几个人组成，警察和警卫机器人开道，一面喊着什么口号一面前进。等人群走近了一看，我发现参加游行的人几乎都是女性，打头的三个人扯的横幅上写着：“享受孩子自然出生的喜悦！立即废止虚假的同意出生制度！”其他的游行者也各自举着标牌“生命不需要审查”“顺应自然法则”“生孩子无罪”，等等。队伍经过我们所在的妇产科诊所门口时，走在前头的那个领袖模样的人不知喊了句什么，所有游行者面朝诊所，做出大拇指朝下的手势，劈头盖脸地骂道：

“人渣！”

“国家权力的走狗！”

“快醒醒吧！”

“要点脸吧！”

“不要夺走别人的生命！”

“这些人这么喜欢顺应自然干脆脱光衣服回丛林算了！望着游行队伍远去，佳织冷笑着说，‘越是动不动叫嚣着顺应自然、尊重生命的人，就越是无法离开现代文明而活，越想把自己的欲望强加于人。’

想起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拥护自然出生主义的新宗教团体，我也不由得隐隐作呕“这帮人，难道意识不到自己是犯罪预备军吗？”

“无论什么年代，都有愚蠢的保守派，以自然、传统、道德等为幌子，试图摒除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以前也有这种笨蛋啊，说什么同性恋不合传统、堕胎违反自然造化、男女平等是违背伦理的妄想。”

佳织收集了很多旧杂志、报纸、文艺作品做资料，对过去的事颇有了解。这和她平时写小说也有关系。如她所说，接受新事物之前首先表现出抗拒，或许是人类的天性。当年日本研判是否要引入同意出生制度的时候，社会上似乎也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反对意见，认为该制度违背生物的自然规律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之一。自然究竟为何物？对人类来说，随时与相隔数千数万公里的人对话、让聚合千亿个肉眼不可见的微型集成电路的机器人为自己效力、以超音速飞越长空已经是家常便饭。我虽然搞不清楚，却本能地认为，自然于人类早已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除此以外，质疑出生意愿确认技术准确性的：认为仅凭生存难易度一个数值，便强迫对世界一无所知的胎儿做出重大的决策、表示出生意愿的行为违背了伦理纲常，从而对胎儿表态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担心该制度会有损监护方的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五花八门的意见满天飞，似乎每个都很像那么回事，引发了各个领域的激烈争论。其中也不乏一众阴谋论者煞有介事地蠢蠢欲动：主张该制度的引入是国家基于优生思想筛选国民的，认为测定生存难易度的真正目的是掌握国民价值观和政治观的，等等。同意出生制度引入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存在，但他们已不具备撼动政治的力量。人们往往会在提到这项制度时，以一句“不过，也有持这类看法的人”作结。

我只能通过教科书和旧杂志、旧报纸了解这场三十多年前的舆论纷争，老实说，我也说不清怎样的观点是对怎样的观点是错。只不过每当亲眼见到主张废止同意出生制度的人，我都本能地感到厌恶和恐惧。这群男女不觉得仅凭监护人的一己之见决定孩子的生死有什么问题，他们无视孩子的意愿，若无其事地强迫孩子领受必然会与生老病死的痛苦相伴的几十年都无法逃脱的人生。我想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有这种道德观的人相互理解，在我看来，这群男女的呼吁和嚷嚷着要废除杀人罪没什么两样。

“还是打个车，早点回家吧。”

我已经没了去商业街闲逛的兴致，只想尽快离开那里。一股不同于孕吐反应的恶心涌上喉咙，我按着胸口，竭力忍受。

“是啊，回家吧。我们早点回家，好好休息。”

佳织说着抬起手，叫来一辆刚好路过的出租车，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坐进车里。



李琴峰

1989年生，中日双语写作。2013年旅居日本，2017年，首次以日语创作的小说《独舞》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优秀作；2021年，以《彼岸花盛开之岛》入围三岛由纪夫奖，并获得第165届芥川文学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hris Curry](#) on Unsplash

小说

回归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 新书推荐

俄语文学大师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后期代表作

《基坑》是俄语文学大师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格拉多夫城》《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弗罗》《七月的雷雨》《回归》《第三个儿子》《基坑》《疑虑重重的马卡尔》等8部作品。

本书同名小说《基坑》是普拉东诺夫富于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的里程碑式中篇小说。该小说与《格拉多夫城》《美好而狂暴的世界》《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均为普拉东诺夫的早期代表作，糅合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作家以平实的语言和幽默戏谑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幅寓言性的图景，探究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等哲理问题，反映出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思索。

《弗罗》《七月的雷雨》《回归》《第三个儿子》均为普拉东诺夫的后期代表作。这些小说围绕爱情、亲情等主题切入，流露出自然朴素而克制的艺术风格，深入勘探人性细微之处，并对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海明威曾盛赞小说《第三个儿子》，并自言要向作者学习。经可以文化授权，我们摘选了《回归》分享给读者。



近卫军大尉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万诺夫要复员离开部队了。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一个部队，大家欢送他的时候不免依依不舍，纷纷用歌声和美酒向他表示爱和尊敬。几位亲密的朋友和同志送伊万诺夫到火车站，跟他最后道别，最后只剩下伊万诺夫一个人。火车要晚点好几个小时。过了预定的时间，火车还没有来。寒冷的秋夜已经降临，车站在战争期间遭到破坏，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伊万诺夫只能搭便车返回部队。第二天，伊万诺夫的战友们再次为他送行，再次用歌声和拥抱向他表示忠贞不渝的友谊，不过这次送行仅仅局限于几位知己的范围，他们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也比较简单了。

伊万诺夫再次来到火车站，到了那儿，他得悉昨天的那趟火车还是没有来。他本来可以再回部队住一个晚上，但是他觉得不好意思再一次去打搅战友，让大家再一次体验离愁别绪，于是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

车站的出站道岔旁边有一间未曾炸毁的扳道房。扳道房旁边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身穿棉衣、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的女人，昨天她就守着自己的几件行李坐在那儿等火车，今天还坐在那儿。伊万诺夫昨天离开这儿回部队过夜的时候曾经想过：要不要请这孤零零的女人一起回部队，让她和护士们睡在暖和的屋子里，何必在这儿挨冻呢！不知道她能不能到扳道房去暖和暖和？正这么想着，汽车就开动了，后来就把这个女人给忘了。现在这女人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昨天那个位子上。这种耐心和恒心体现了女性心灵的忠贞不渝和始终如一——至少对待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家庭是这样——她可能也是要回家去吧。伊万诺夫走到她身边：也许她也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至于像她独自一人那样寂寞。

那女人转过脸，伊万诺夫认出了她。这是个姑娘，大家都叫她“玛莎——澡堂服务员的女儿”，因为当初她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她也的确是澡堂服务员的女儿。战争期间，伊万诺夫到机场勤务营看望朋友的时候偶尔见过玛莎，这个澡堂服务员的女儿就在那儿的食堂里做临时工，给炊事员当助手。

此刻，他们周围是一片凄凉忧伤的秋天景象。那趟照理应该送玛莎和伊万诺夫回家的火车，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现在唯一能够使一个人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欢乐的，就是另一个人的心灵了。

伊万诺夫和玛莎谈得十分投机，他的心情也变得舒畅了。玛莎模样可爱，心地纯朴，那双粗壮有力、勤劳的手和洋溢着青春气息、健壮的身体彰显着她的善良。她也要回家，也在思考今后怎样开始和平的新生活。她已经和部队里的那些女友相处惯了，和飞行员们也熟悉了。飞行员们都喜欢她，把她看作自己的姐姐，送给她巧克力，叫她“大玛莎”，这不仅因为她身材高大，还因为她心胸宽阔，她真的像一位大姐姐，心中装着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所有的兄弟。现在玛莎要回家了，回到那些已经生疏的亲友中间，她反而感到不习惯、别扭，甚至担心。

伊万诺夫和玛莎觉得现在离开了部队就像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但是伊万诺夫不能长时间地沉湎于这种悲观消极的状态。他仿佛觉得在这样的时刻有人会幸灾乐祸，会从远处嘲笑他，而他自己却成了个愁眉苦脸的大傻瓜。因此他往往会去办实事，也就是说，他会给自己找一件事做或者找点消遣，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找点唾手可得的乐子——用这样的办法走出苦闷的境地。

他向玛莎靠近了一点，请求她同志式地允许他亲一下她的脸颊。

“我只是稍稍亲一下。”伊万诺夫说，“火车老是晚点，等得都不耐烦了。”

“只是因为火车晚点吗？”玛莎问，仔细打量了一下伊万诺夫的脸。

这位退伍大尉看上去三十五岁上下，脸上的皮肤由于风吹日晒成了咖啡色，那双看着玛莎的灰眼睛流露出谦恭甚至羞涩的神情，他说话虽然直率，却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那成熟男人的低沉嘶哑的嗓音、粗犷黝黑的脸庞以及坚强有力而又孤立无援的表情博得了玛莎的好感。伊万诺夫用大拇指摁灭了烟斗，大拇指已经没有烫痛的感觉，他怀着得到许可的期待叹了口气。玛莎从伊万诺夫身边往后挪了挪。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烤面包干味和轻微的酒味——总之，全是那些从火中产生或者本身产生火的东西的味儿。好像伊万诺夫的生命就是靠烟草、面包干、啤酒和葡萄酒维持的。

伊万诺夫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请求。

“我一定很小心，我只是轻轻挨一下，玛莎……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叔叔好了。”

“我已经把您当成了……把您当成了我的爸爸，而不是叔叔。”

“那好……那么您就答应了吧……”

“父亲亲吻女儿是不需要征得同意的。”玛莎说着笑了起来。

后来伊万诺夫暗自承认，玛莎的头发散发出秋天森林里落叶的气息，令他永远无法忘怀……伊万诺夫走到离铁路稍远些的地方生起一堆小小的篝火，准备煮鸡蛋给玛莎和自己当晚饭。

夜里，火车来了，把伊万诺夫和玛莎送往他们的故乡。他们俩一起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第三天火车把玛莎带到了二十年前她出生的那个城市。玛莎在车厢里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请伊万诺夫帮她把背包背到肩上，可是伊万诺夫却拿起她的行李挎到自己肩上，跟着她下了车，虽然他还得坐一天一夜多的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伊万诺夫如此热情使玛莎又惊奇又感动。她怕一下子就孤零零地留在这个城市里，尽管她生在斯长于斯，但如今对她说这儿几乎成了陌生的异乡。

玛莎的父母被德国人从这里赶走后不知道死在哪里。现在家乡只剩下她的一个表姐和两个姨妈，玛莎跟她们缺乏亲近感。

伊万诺夫到铁路军运指挥部办理了中途停留手续，跟玛莎一起留在这城里。其实，他应该赶快回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等着他，他也整整四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可伊万诺夫还是推迟了与家人团聚的那个欢乐而令人不安的时刻。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想自由自在地再玩几天。

玛莎不知道伊万诺夫的家庭情况，出于少女的羞涩，她也不好意思问他。她信任伊万诺夫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心，别的什么也没有想。

两天后，伊万诺夫重新踏上返乡的路途。玛莎送他到车站。伊万诺夫习惯地吻了吻她，满怀深情地向她保证，他将永远记住她。

玛莎笑着回答说：

“干吗要永远记住我？这没有必要，您迟早会忘掉我的……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把我忘了吧。”

“我亲爱的玛莎！以前您在哪里？为什么我很久以前一直没有碰到您？”

“战前我在念中学，很久以前我还没出生呢……”

火车来了，他们互相道别。伊万诺夫走了，他没有看到玛莎剩下独自一人的时候放声大哭，因为无论是女友还是萍水相逢的同志，她都无法忘怀。

伊万诺夫望着窗外，散落在铁路沿线的一幢幢小房子在他眼前掠过。他想，今生今世他未必还会看到这座小城，但是在另一个城市，在外表相仿的一幢小房子里，住着他的妻子柳芭、儿子彼佳和女儿娜斯佳，他们正在等他回去。还在部队里的时候，他就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他立即就要离开部队回家了，盼望早日亲吻

她和孩子们。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伊万诺夫的妻子，连续三天都去迎接从西边来的每一列火车。她请了假，耽误了完成定额，几个晚上都兴奋得无法入睡，眼睁睁地听着挂钟的钟摆缓慢而冷漠地摆动。到第四天，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打发两个孩子——彼佳和娜斯佳——去车站接父亲，晚上仍然由她去接。

伊万诺夫第六天才到。迎接他的是儿子彼佳。彼佳今年已经十一岁多了，父亲没有马上认出这个显得比实际年龄大的老成少年就是自己的儿子。父亲看到彼佳又矮又瘦，但是脑袋很大，脑门很宽，脸上的表情镇定自若，好像对生活中的烦恼已经习以为常，那双观察世界的褐色小眼睛却充满了忧郁和不满的神色，仿佛看到的尽是混乱的景象。彼佳穿着整齐：脚上穿的是双旧鞋子，但还管用，裤子和上衣是父亲的旧衣服改的，但是没有破绽，该缝的缝了，该补的也补了，彼佳整个儿看上去像个虽然贫穷，但是勤快的小个儿庄稼汉。父亲惊讶得叹了口气。

“你是父亲吧？”彼佳被父亲抱起亲吻的时候问道，“这么说来，是父亲！”

“是父亲……你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你好……怎么走了这么久？我们一直等啊等啊……”

“彼佳，火车走得慢……母亲和娜斯佳怎么样，都好吗？”

“好，”彼佳说，“你得了几颗勋章？”

“两颗，彼佳，还有三枚奖章。”

“我和母亲还以为你胸前都挂满了勋章呢！母亲也有两颗奖章，是她立了功发给她的……你的东西怎么这样少——只有一个背包！”

“我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带着个箱子打仗不方便吧？”儿子问。

“不方便，”父亲表示同意，“带一个背包就方便多了。打仗没有人带箱子。”

“我还以为大家都带着箱子呢。要是我就把东西全放进箱子里——放背包里容易折断弄皱。”

他提着父亲的背包往家走，父亲跟在他后面。

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今天她向单位请了假，她的心好像有预感似的，知道丈夫今天回来。她离开工厂后先回家，然后打算再到车站。她怕谢苗·叶夫谢耶维奇上她家有时候他喜欢白天来，他有个习惯——一大白天来跟彼佳和五岁的娜斯佳坐一会儿。

谢苗·叶夫谢耶维奇从来不会空手来，总会给孩子们带点糖果啦，砂糖啦，一个白面包啦，一张日用品购货券啦什么的。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自己也没有发现谢苗·叶夫谢耶维奇有什么不好，他们相识两年来，谢苗·叶夫谢耶维奇一直对她很好，对孩子们就像父亲那样，甚至比有些当父亲的更加关心孩子。但是今天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不希望丈夫看到谢苗·叶夫谢耶维奇。她把厨房和房间收拾了一下，家里必须保持整洁，不应该有多余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明天或者后天，她自己会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他。还好，今天谢苗·叶夫谢耶维奇没有来。

伊万诺夫走过去拥抱妻子，久久不松手，尽情感受亲人那已经忘却但又熟悉的温暖。

小娜斯佳从屋子里出来，看了看陌生的父亲，使劲要把他从母亲身边推开，然后哭了起来。彼佳背着父亲的背包，一声不响地站在父母身边。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们行了吧，娜斯佳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会哭个不停的。”

父亲放开母亲，抱起吓得直哭的娜斯佳。

“娜斯佳！”彼佳喝住她，“别犯傻了，听见没有！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亲人！……”

父亲进屋洗了把脸，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他伸直了两条腿，闭上了眼睛，心里顿时感到一种融融的乐趣和宁静的满足。战争已经过去。这几年他的这双脚走了几千里路，脸上留下道道疲惫的皱纹，一合上眼皮眼睛就疼得像刀割似的——现在它们盼望在昏暗或者黑暗中得到休息。

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全家都在厨房和房间里忙碌着准备节日般的佳肴。伊万诺夫逐一打量着家里的所有东西——挂钟、餐具柜、墙上的温度计、椅子、窗台上养的花、俄式炉灶……这些东西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一直在想念他。现在他回来了，看着它们，重新认识它们，仿佛它们都是他离开后一直生活在思念和贫困中的一个个亲人。他闻着家里那股挥之不去的亲切的气息——木柴的烟味、孩子们的体味、炉膛里的焦味……这气息与四年前一模一样，并不因为他不在而消失和变化。伊万诺夫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闻到过这样的气息，尽管他在战争期间到过许多不同的国家，住过几百人家，但是那些地方散发着另外的气息，没有自己家园的感觉。伊万诺夫还想起了玛莎身上的体味，她头发的味儿，那是林中落叶的味儿，是陌生的杂草丛生的道路的味儿，是将要重新开始动荡不安的生活的味儿，而不是自己家庭的味儿。她现在在干什么呢，从部队回去后她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这个澡堂服务员的女儿玛莎？

伊万诺夫发现，彼佳处理家务事最利索。他不光自己干活，还指挥母亲和娜斯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样做才好。娜斯佳绝对听彼佳的话，她已经不再害怕父亲，不再把他当作陌生人了。她有一张生动的、专心致志的、做什么事都认真老实的娃娃脸和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彼佳说什么她都不生气。

“娜斯佳，把杯子里的土豆皮倒掉，我要用……”

娜斯佳乖乖地倒掉土豆皮，把杯子洗干净。母亲这时候正在做不加酵母的快速死面馅饼，她急着要把馅饼放进炉子里烤，彼佳已经把炉火烧旺了。

“快点，母亲，动作快点！”彼佳在发号施令，“你没看见我把炉子准备好了。怎么老是磨磨蹭蹭的，还是斯达汉诺夫先进生产者呢！”

“一会儿，彼佳，我一会儿就好。”母亲顺从地说，“我再加点葡萄干就完了，你父亲大约好久没吃过葡萄干了。这葡萄干我一直留着等你爸回来吃。”

“他能吃上，”彼佳说，“我们部队也发葡萄干。你没看见我们的战士一个个都吃得胖乎乎的，他们的伙食不错……娜斯佳，你怎么坐下来了，你是来做客的吗？给我削土豆去，一会儿要放到平底锅上煎了当午饭呢……光吃馅饼一家人能吃饱吗！”

看到母亲馅饼还没有做好，彼佳用大炉叉把汤锅送进炉膛，不让炉火白白烧着。他又开始对炉火发号施令：

“瞧你是怎么烧的，火苗到处乱窜！你给我好好烧着。对准了锅底烧，你以为那些当劈柴的树在树林里长大是那么容易吗……娜斯佳，你怎么搞的，怎么把劈柴往炉子里乱塞，要放整齐，我不是教过你吗。土豆皮你怎么削得这么厚，要削得薄一点——你干吗把土豆连皮带肉都削掉了？这样——来我们的口粮就减少了……这事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现在我给你说最后一次，下次再这样我就给你后脑勺一个巴掌！”

“你怎么啦，彼佳，怎么老是数落娜斯佳，”母亲柔声柔气地说，“她怎么惹你生气啦？她削了那么多土豆，难道你要她像理发师那样一个个都削得那么薄，一点儿肉都不碰吗！……父亲回来了，可你老生气！”

“我没有生气，我说的是正经事……得养活父亲，他刚从战场上回来，可是你们白白糟蹋粮食……我们家一年光土豆皮就浪费多少粮食！……我们要是养口母猪，光一年的土豆皮就能把它养得又肥又壮，送到展览会上准能得个奖章……你们瞧瞧，要是这样多好啊，

可你们不明白！”

伊万诺夫没想到自己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儿子，他坐在那儿，打心眼里佩服儿子精打细算的聪明劲。不过他更喜欢性格温柔、也在一刻不停地忙家务活的小娜斯佳，她那双小手已经习惯干活了，十分灵巧。这就是说，这双手早就学会干家务活了。

“柳芭，你怎么什么也不跟我说？”伊万诺夫问妻子，“我不在的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身体好吗？在单位里干些什么？……”

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在丈夫面前现在像新娘似的感到羞涩：她跟他生疏了。丈夫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甚至脸红了，脸上像年轻时那样露出腼腆惊慌的神色，正是这样的表情当初令伊万诺夫心醉神迷。

“还好，阿辽沙……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孩子们很少生病，我一直照看着他们……糟糕的是我只有晚上才能在家里和他们在一起。我在砖厂干活，压砖坯，到工厂上班挺远的……”

“在哪儿干活？”伊万诺夫没听明白。

“在砖厂压砖坯我又没有什么专长，起先在工厂的大院里当杂务工，后来教我学会了技术，分配我去压砖坯。工作挺不错，就是孩子们没法照顾，他们挺孤独的……瞧，他们都长大了，什么都会干，像大人一样。”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低声说，“这样是不是好，阿辽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以后就知道了，柳芭……现在我们全家团聚了，是好是坏往后会搞清楚的……”

“有你在，一切都会好的，要不我一个人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老是提心吊胆的。现在你自己要想一想，咱们该怎样培养孩子……”

伊万诺夫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圈。

“照你这么说，总的还可以，你们的心情好吗？”

“还可以，阿辽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都熬过来了。就是特别想念你，生怕你永远回不来了，像别人那样牺牲在那儿……”

她脸对着已经放进铁模子里的馅饼哭了起来，眼泪扑簌簌地掉在面团上。她刚给馅饼的表面涂了一层鸡蛋糊，正在用手掌往面团上抹，现在又往节日的馅饼洒上一层泪水。

娜斯佳双手抱住母亲的一条腿，脸紧紧贴着她的裙子，皱着眉严厉地看着父亲。

父亲俯身问她：

“你怎么啦！……娜斯佳，你怎么啦？你生我的气了？”

他把她抱起来搂进怀里，抚摸着她的小脑袋。

“你怎么啦，闺女？你把我全忘了，我上前线的时候你还小……”

娜斯佳把脑袋搁在父亲肩上，也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娜斯佳？”

“妈妈哭我也哭。”

站在炉门前的彼佳感到不可理解，不满地说：

“你们这是怎么啦？……都闹起情绪来了，可炉子里的火快烧灭了。难道要重新生一次火吗？谁能给我们再发一张新的劈柴票呢？原来那张购柴票上的定量全买了，快烧完了，柴房里只剩下一点点了——十块劈柴，还全是白杨木的……母亲，趁炉膛里还热，快把面团搁上。”

彼佳从炉膛里取出搁在大炉叉上的汤锅，再把烧红的炭火拨拢，而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好像要尽量讨好儿子，赶紧把两个生馅饼放进炉膛，甚至忘了给第二个馅饼抹鸡蛋糊。

伊万诺夫对自己的家感到十分奇特，也无法完全理解。妻子还是原来的模样——脸庞依然那么可爱，那么羞涩，尽管显得相当疲惫。孩子还是他生的两个孩子，只是在战争期间长大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妨碍他全身心地感受回家的快乐——也许他对家庭生活已经完全不习惯了，即使最亲近、最亲密的人也无法立即理解了。他看着彼佳，看着自己如今已经长大的大儿子，听着他说出这一番话，心里不免有点胆怯。他本来打算详细追问妻子：近两年来经常到他家里的这个谢苗·叶夫谢耶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他来找谁？是找娜斯佳还是找他漂亮的妻子？但是彼佳跟母亲大谈家务事：

“吧！吃了母亲再给你添一块。”

“吃什么都一样。”彼佳皱着眉说，“我已经够了。”

“他怕自己吃多了娜斯佳会学他的样也要吃得多。”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坦率地说，“他舍不得吃。”

“可你们什么也不心疼。”彼佳冷冷地说，“我想让你们多吃点。”

父亲和母亲相互看了一眼，儿子的话使他们受到震动。

“你怎么也好好吃呢？”父亲问娜斯佳，“你是不是学彼佳的样？该吃就吃，不然永远长不大……”

“我已经长大了。”娜斯佳说。

她吃了一小块馅饼，把另一块稍大些的放在一边，用餐巾遮住。

“你这是干吗？”母亲问她，“要不要给你抹上点黄油？”

“不要，我吃饱了……”

“那就这么吃吧……干吗把这块饼放在一边？”

“谢苗叔叔要来。我这是留给他的。这不是你们的饼，是我省下的。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要不凉了……”

娜斯佳从椅子上下来，把那块包着餐巾的饼放到床上，然后塞到枕头底下。

母亲想起五一节的时候，她也是这样把烤好的馅饼用枕头捂着，免得谢苗·叶夫谢耶维奇来了吃了凉的。

“这个谢苗叔叔是什么人？”伊万诺夫问妻子。

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于是说：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常常一个人来看望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德国人杀害了，他跟咱们的孩子混熟了，经常来跟他们玩。”

“怎么玩？”伊万诺夫惊讶了，“他们在你这里玩什么？他多大年纪？”

彼佳迅速地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父亲。母亲什么也没回答，只是用忧伤的目光看着娜斯佳。父亲冷笑了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点燃了烟。

“这个谢苗叔叔跟你们玩的玩具在哪儿？”过了一会儿，父亲问彼佳。

娜斯佳从椅子上下来，爬到衣柜旁的另一把椅子上，从衣柜上取下几本小书交给父亲。

“这是玩具书，”娜斯佳对父亲说，“谢苗叔叔常常念给我听。瞧，这米什卡多好玩，这是个玩具，还是本书呢……”

伊万诺夫接过女儿递过来的几本玩具书：有讲狗熊米什卡的，有讲大炮的，有讲多姆娜奶奶在那间小屋里跟她的孙女织麻布的……

彼佳想起现在该关上烟道的风门，不然屋里的热气要跑掉的。

他关上风门，对父亲说：

“他比你老，那个谢苗叔叔……他给我们好处，别跟他过不去……”

彼佳怕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走过去看了看窗外，发现天空中飘着九月里不该有的乌云。

“这云怎么这样阴沉沉的，”彼佳说，“肯定要下雪了！没准明天早上就要转冷了？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土豆还全在地里，过冬的准备还没有做……唉，真糟糕！……”

伊万诺夫看着自己的儿子，听着他说出这一番话，心里不免有点胆怯。他本来打算详细追问妻子：近两年来经常到他家里的这个谢苗·叶夫谢耶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他来找谁？是找娜斯佳还是找他漂亮的妻子？但是彼佳跟母亲大谈家务事：

“母亲，把明天的粮票和指定供应证给我。煤油票也给我——明天是最后一天。还得买木炭，可你把口袋丢了，那里买炭要自备口袋，你就随便再给我找一个，或者找点旧布缝个新的吧。没有口袋咱们可不行。让娜斯佳明天看住我们院子里的水井，要不大家把水都打光了，冬天眼看就到了，到时候水位下降，我们家的井绳不够长，吊桶够不着水。总不能吃雪吧，化雪水还得用柴火。”

彼佳一面说一面还在炉子旁边打扫并且整理灶具。然后从炉膛里取出炉叉和汤锅。

“我们吃了点馅饼，现在来喝肉汤吃面包吧。”彼佳向大家发出指示，“你呢，父亲，明天早上到区苏维埃和军事委员会走一趟，你早一天去报到，我们就早一天领到你的粮票。”

“我去。”父亲顺从地答应说。

“你一定要去，千万不能忘记，不要明天一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不会的，我不会忘记的。”父亲保证说。

全家默默地吃完了这战后的第一顿有汤有肉的团圆饭，连彼佳都平静地坐在那儿，好像父亲、母亲和孩子们都害怕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会破坏全家团聚的宁静和幸福。

过了一会儿，伊万诺夫问妻子：

“柳芭，你们穿得怎么样？大约都穿烂了吧？”

“大家都穿旧衣服，可现在要添新的啦。”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说着微微一笑，“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我补了又补，你的西装、你的两条裤子、你的所有内衣全改给他们穿了。我们缺钱花，但孩子总得穿吧……”

“说得对，”伊万诺夫说，“为了孩子别舍不得。”

“我没有舍得，连你替我买的大衣我都卖了，现在我穿的是棉衣。”

“她的棉衣很短，穿了容易感冒。”彼佳说，“我要去澡堂当锅炉工，我领了工资就给她买大衣。集市上有人对手卖，我已经去打听过价钱，那儿有合适的……”

“你别操心，没有你的工资我们也能解决。”父亲说。

午饭后，娜斯佳往鼻子上架了一副大眼镜，坐在窗口给母亲补手套。那手套是母亲上班时套在袖笼里的——天气变冷了，已经是秋天了。

彼佳瞪了妹妹一眼，冲她发火说：

“你捣什么乱，干吗戴谢苗叔叔的眼镜！……”

“我是从眼镜上面看，没从眼镜里面看。”

“还犟嘴！我都看到了！这样你会损害眼睛变成瞎子的，到那时候，你就一辈子靠领养老金让别人养活你吧。马上把眼镜给我摘下来——听见没有！别补手套了，母亲自己会补的，或者等我空了我来补。去拿本子写字——你连上次什么时候写过都忘了吧！”

“怎么，娜斯佳上学了？”父亲问。

母亲回答说，还没有上学，她年龄还小，但是彼佳规定娜斯佳每天都要学习，他给她买了本子让她写字。彼佳还教她数数，用几颗南瓜子教她加减法，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自己教她认字母。

娜斯佳放下手套，从衣柜的抽屉里取出本子和蘸水笔，彼佳见妹妹都照他的吩咐做也就满意了，于是穿上母亲的棉衣到院子里去劈明天烧的柴。彼佳一般把头天劈好的柴隔夜搬进屋里，在炉子后面码好，让柴烘干，第二天既好烧又节省。

晚上，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早早做好了晚饭。她想让孩子们早点睡，自己可以单独和丈夫坐下来说话。可是孩子们吃了晚饭好久都不睡，娜斯佳躺在木沙发上从被窝里偷偷看着父亲，而彼佳躺在俄式炉炕上——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都睡在这炉炕上——他在炕上翻来覆去，一会儿咳嗽，一会儿自言自语，折腾了老半天。夜深了，娜斯佳这才合上了疲惫的眼睛，彼佳也在炉炕上呼呼入睡了。

彼佳睡觉十分惊醒：他老是怕夜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听不见，火灾啦，贼偷强盗抢啦，或者母亲忘了插门销，半夜里门开了屋里的热气全跑光了。这一次，彼佳醒过来是因为父母在厨房隔壁的屋子里情绪激动的谈话声。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是半夜还是凌晨，反正父母还没有睡。

“阿辽沙，你别嚷嚷，会把孩子吵醒的。”母亲悄声说，“你不要骂他，他是个好人，他爱你的孩子……”

“我们不需要他的爱，”父亲说，“我的孩子我自己会爱的……亏你说得出口，他居然爱上了别人的孩子！我给你寄了军人领款证，你自己也有工作，为啥还需要这个谢苗·叶夫谢耶维奇？是不是你熬不住了……唉，柳芭啊柳芭！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这么说来，你把我当成了大傻瓜……”

父亲不再说下去，他划了根火柴点烟斗。

“阿辽沙，你怎么这样说话！”母亲提高了嗓门，“孩子都是我一手扶养照管的，他们几乎没有生过病，身体都结实……”

“那又怎么样！”父亲说，“人家有四个孩子，照样日子过得不错，孩子长得不比我们家的差。你看看你的彼佳，成了什么样的人——说话办事像个老爷爷，可读书多半忘记了。”

彼佳在炕上叹了口气，为了继续往下听，他假装打起了呼噜。“得，我是老爷爷，”他想，“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吃现成饭！”

“可是生活中最困难最重要的事情他都经历了！”母亲说，“再说学文化他也没有拉下啊。”

“你那个谢苗究竟是什么人？别给我东拉西扯了。”父亲光火了。

“他是个好人。”

“你爱他，是不是？”

“阿辽沙，我是你孩子的母亲……”

“说下去！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我爱的是你，阿辽沙。我是母亲，当女人的那种事是很久以前了，而且也只跟你做，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了。”

父亲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在黑暗中抽烟。

“我想你想得好苦啊，阿辽沙……是的，我身边有孩子，但是他们代替不了你，我一直在

等你，这漫长可怕的几年，早晨我都不愿意醒来。”

“他在单位里担任什么职务？”

“他是我们厂材料处的。”

“明白了。一个骗子。”

“他不是骗子。我不知道……他们全家都死在莫吉廖夫，三个孩子，女儿都快出嫁了。”

“没关系，他又换了一个现成的家庭——那娘们还不老，模样还挺俊，所以他过得挺滋润的。”

母亲什么也没有回答。屋子里静悄悄的，但是彼佳很快听到了母亲在哭泣。

“他跟孩子们经常讲起你，阿辽沙，”母亲又开口了，彼佳凭声音知道，母亲眼睛里噙着大颗大颗的眼泪，“他常给孩子们说你在前线为我们打仗，为我们受罪……他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告诉他们，因为你是个好人……”

父亲哈哈大笑着敲灭了烟斗。

“你们那位谢苗·叶夫谢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可是对我大加赞赏。真了不起！”

“他确实没见过你。他这是故意编出来的，想让孩子们经常想着父亲，爱父亲。”

“他这样做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是为了尽快把你搞到手？你说啊，他究竟要干什么？”

“也许他心肠好，阿辽沙，所以才这样做。不然又为什么呢？”

“你真蠢，柳芭。请你原谅我。天底下不图回报的事是没有的。”

“可谢苗·叶夫谢耶维奇经常给孩子们带点东西，每次都带，有时候带点糖果，有时候带点白面，有时候带点砂糖，前几天还给娜斯佳一双毡靴，但是不能穿，尺码太小。而他自己从来不要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也不要他的，阿辽沙，没有他的礼物我们也能过，我们过惯了苦日子，可是他说，他关心别人的时候心里好受些，可以稍稍减轻对死去的家人的思念。你见了他就会知道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尽是胡说八道！”父亲说，“你别把我当傻瓜……跟你在一起，柳芭，我感到没意思，我还想好好过日子呢。”

“跟我们一块儿过吧，阿辽沙……”

“我跟你们在一块儿，而你去跟谢苗·叶夫谢耶维奇一块儿，是吗？”

“我不会再跟他一起了，阿辽沙。他再也不会上我家来了。我要告诉他，让他别再来了。”

“既然今后你不再跟他在一起了，那就是说，过去你们在一起过？……唉，柳芭，原来你是这种人，你们女人都是这一路货。”

“那你们是什么货？”母亲恼火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女人都是一路货？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没日没夜地干活，我们做火车头锅炉用的耐火砖。我做得面黄肌瘦，大家都认不出我了，连要饭的都不会向我伸手。我也做得很苦，把孩子撇在家里没人照应。下班回来，家里常常是火没生，饭没做，灯没点，孩子们愁眉苦脸的，他们一开始不会做家务，不像现在，彼佳那时候还小……谢苗·叶夫谢耶维奇开始上我们家。他一来就陪孩子们玩。他也是孤身一人过日子。他问我：‘我可不可以上你们家暖和暖和？’我告诉他我们家里也挺冷，我们家的劈柴潮乎乎的。他回答说：‘没关系，我的心整个儿都凉透了，我只要在你们的孩子旁边坐坐就行，不用为我生炉子。’我说那好吧，你就来吧，孩子们跟你在一起也不会害怕了。后来我对他也习惯了，他来了我们大家的心情会好一些。我看着他就想起你，想到我们还有你在……家里没有你实在太苦太难了；只要有人来，气氛就不那么凄凉，时间也过得快些。没有你，时间对我们有什么用！”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父亲催促道。

“后来什么事也没有。现在你回来了，阿辽沙。”

“那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父亲说，“该睡觉了。”

但是母亲央求父亲：

“待一会儿再睡。咱们再说会儿话，跟你在一起我多高兴啊。”

“他们争得没完没了，彼佳躺在炕上想：讲清楚了不就行了呗。母亲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可她还在东扯西拉，哭倒是不哭了，但是高兴得不是时候。”

“这个谢苗爱你吗？”父亲问。

“等一等，我去给娜斯佳盖好被子，她睡着了总要踹被子，容易着凉。”

母亲给娜斯佳盖好被子，走进厨房，在炉子旁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彼佳睡着了没有。彼佳明白了母亲的用意，打起了呼噜。过了一会儿母亲回去了，彼佳听到她在说话：

“大概是爱的吧。他看着我的时候神情挺温柔，我发现，可我这副模样——难道我现在还好看吗？他心里不好受，阿辽沙，他总得爱什么人吧。”

“你该吻吻他呀，既然你们是这样一种关系。”父亲平静地说。

“你又来了！他主动吻过我两次，尽管我不愿意。”
“既然你不愿意，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他说他一时糊涂，想起了妻子，而我有点儿像他妻子。”
“他也像我吗？”
“不，不像。谁都不像你，你是独一无二的，阿辽沙。”
“你说我是独一无二的？数数就是从一开始的，有了一就有二。”
“他只是吻了吻我的脸颊，没有吻嘴唇。”
“吻哪儿反正都是吻。”
“不，不一样，阿辽沙……你对我们的生活了解多少？”
“怎么不了解？这场战争我从头打到结束，离死神比你近……”
“你在打仗，可我在这里想你都快想疯了，心里难受得手都发抖，但是为了养活孩子，为了支援国家打败法西斯，我还得打起精神干活。”
母亲的语气平静，但是内心很痛苦，彼佳很可怜母亲：他知道，她自己学会了给一家三口补鞋，因为找鞋匠补鞋太贵，为了几颗土豆她帮邻居修理电炉。
“我受不了这样的日子和对你的思念，”母亲说，“要是实在受不了，我会死的，我知道那样会死的，可是我有孩子……我当时需要感受什么别的东西，阿辽沙某种乐趣，让我喘口气。有一个人说他爱我，他对我那么好，就像你很久以前对我那样……”
“这个人是谁，还是谢苗·叶夫谢吗？”父亲问。
“不是，是另一个人。他是区工会的指导员，他是疏散来的……”
“管他是什么人，让他见鬼去吧！那么结果怎么样？他安慰你了？”
关于这个指导员的事，彼佳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感到奇怪的是怎么居然一无所知。“咳，我们这个母亲胆子也够大的。”彼佳在心里说。
母亲回答父亲说：
“我从他那儿什么也没有得到，没有任何快乐。后来我反而更加痛苦。起初我的灵魂向往他，因为我的灵魂快死了，而当他成了与我亲密无间的人的时候，我却十分冷漠，心里想着家务事，后悔让他亲近自己。我明白了，只有跟你在一起，我心里才会感到平静和幸福，只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能得到休息。没有你，我无处躲避，即使为了孩子我也无法拯救自己……和我们一起过吧，阿辽沙，我们会幸福的！”
彼佳听得很清楚，父亲默默地起床，点燃了烟斗，坐到凳子上。
“那次亲近之后还碰过几次面？”父亲问。
“总共才一次。”母亲说，“后来再也没有过。还要几次啊？”
“你想几次就几次，那是你的事。”父亲说，“那你为什么说你是我们孩子的母亲，只有跟我在一起才做女人，而且还是很久以前的事……”
“这是实话，阿辽沙……”
“怎么可能呢？这算什么实话？你跟他在一起不也是女人吗？”
“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女人，我想做女人，但是做不到……我那时候觉得，没有你我要完了，我需要有人跟我在一起，我已经受尽了折磨，心力交瘁，我的内心一片漆黑，连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爱了，而你是知道的，为了孩子我什么都能忍受，为了他们，我要献出这把骨头也心甘情愿！……”
“等一会！”父亲说，“你不是说你看错了这另外一个谢苗·叶夫谢吗，从他那儿你似乎没有得到任何乐趣？可是你并没有完蛋，也没有死，而是活得好好好的。”
“我没有完蛋，”母亲低声说，“我还活着。”
“这就是说，你现在还在对我说谎！哪一句是你的真话？”
“我不知道，”母亲喃喃地说，“我知道得很少。”
“好啊！但是我知道得很多，我经历的苦难也比你多。”父亲说，“你是个烂货，就这么回事。”
母亲一声不吭。只听见父亲急促而吃力的喘气声。
“现在我回来了，”他说，“仗也打完了，可是你伤了我的心……那好吧，现在你去跟你的什么谢苗·叶夫谢聊过日子吧！你让我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成了笑柄，可我也是个人，而不是玩具……”
父亲摸着黑，开始穿衣穿鞋，然后点着了煤油灯，坐到桌子旁边给手表上发条。
“现在是四点钟，”他自言自语说，“天还黑。俗话说：女人好找，妻子难得。这话有道理。”
家里静悄悄的。娜斯佳睡在木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彼佳脸贴着热炕上的枕头，忘记了自己应该打呼噜。
“阿辽沙！”母亲低声下气地说，“阿辽沙，原谅我吧！”
彼佳只听见父亲在唉声叹气，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彼佳从帘子缝里发现父母的那

间屋里变暗了，但是灯还亮着。“他把玻璃灯罩砸碎了，”彼佳猜想道，“可是玻璃灯罩现在哪儿也买不到。”
“你把手划破了，”母亲说，“你的手在流血呢，到衣柜里拿块毛巾捂上。”
“给我闭嘴！”父亲冲着母亲吼道，“你的声音我都受不了……给我叫醒孩子，马上叫醒！……去啊，听见没有！让我告诉他们，他们的母亲是个什么货色！让他们知道知道！”
娜斯佳吓得尖叫着醒了过来。
“妈妈！”她喊道，“我要到你那儿，行吗？”
娜斯佳喜欢夜里爬到母亲床上和母亲睡一个被窝。
彼佳从炕上坐了起来，双脚悬在炕沿上，对大家说：
“该睡觉啦！你们干吗吵醒我？天还没有亮，外面黑着呢！你们吵什么？还点了灯？”
“睡吧，娜斯佳，睡吧，还早呢，我这就过来。”母亲说，“彼佳，你也别起来，也别说话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说话？父亲要干什么？”彼佳说。
“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父亲答道，“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
“你为什么把灯罩砸了？你干吗吓唬母亲？她已经这么瘦了，吃土豆也不抹黄油，把黄油省给娜斯佳吃。”
“你知道母亲干了些什么丑事？”父亲像小孩告状似的大声说道。
“阿辽沙！”柳博芙·瓦西里耶芙娜央求丈夫。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彼佳说，“母亲为了你老是哭，一直在盼你回来，可你回来了，她还是哭。你才什么都不知道自己！”
“你还什么都不懂！”父亲火冒三丈，“我们家里出了你这么一个宝贝。”
“我什么都一清二楚。”彼佳在炕上回嘴说，“你自己才不懂呢。我们都有事情要做，要过日子，可你们吵个不停，像笨蛋似的……”
彼佳不再说话，他靠在枕头上忍不住啜泣了起来。
“你在家里发号施令，”父亲说，“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你就在这里当家长吧……”
彼佳擦干眼泪，回嘴说：
“你啊，算什么父亲，说出这样的话，亏你还是个大人，上过战场……明天你到残废军人合作社去看看，哈里顿叔叔在那儿站柜台，他卖面包从来不缺斤短两。他也上过前线，现在回来了。你去问他，他给谁都说，自己还笑呢，我亲耳听到的。他的妻子阿纽塔，学会了开汽车，现在专门运食品，她人挺好，从不偷拿面包。她也有相好的，经常去人家家里，人家还请她吃东西。她那个相好也有勋章，缺一只胳膊，是工业品零售店的头儿……”
“你胡说些什么啊，还是去睡吧，天快亮了。”母亲说。
“你们不是不让我睡吗……天亮还早呢。那个缺胳膊的和阿纽塔好上了，他们在一起日子过得挺好。而哈里顿当时在打仗。后来哈里顿回来了，就跟阿纽塔吵架。白天吵，夜里就喝酒，还吃菜呢，阿纽塔只是哭，什么也不吃。吵啊吵啊，后来他折腾得连自己都没有劲了，也不再折磨阿纽塔，反而对阿纽塔说：你怎么只有一个独臂的家伙，你真是个蠢婆娘，你瞧我，离开你之后我跟格拉什卡、阿普罗西卡、玛鲁西卡、跟你同名的纽什卡、再加上玛格塔林卡都有过关系。说着他自己也笑了，阿纽塔阿姨也笑了，后来阿纽塔夸起了哈里顿，说她的哈里顿是个好人，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他杀死了好多法西斯，女人也排着队要跟他好。这全是哈里顿叔叔收点面包的时候跟大家讲的。现在他们日子过得挺和睦，挺友好。而哈里顿叔叔又笑着说：‘我骗了我的阿纽塔，其实我一个女人也没有，格拉什卡啦，纽什卡啦，阿普罗西卡啦，还有什么玛格塔林卡啦，一个都没有。当兵的——就是祖国的儿子，他没有时间胡搞，他一心一意要打敌人。我这是故意编出来吓唬阿纽塔的……’父亲，你睡吧，把灯吹灭了，没有灯罩烟灰多……”
伊万诺夫听了儿子彼佳讲的故事感到十分吃惊。“这狗崽子！”父亲在心里骂儿子，“我还以为他接着要讲我的玛莎呢……”
彼佳说累了，打起了呼噜。这一次他真的睡着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吓了一跳：自己睡了这么久，早晨的家务事一点也没有做呢。
家里只剩下娜斯佳一个人。她坐在地上翻那本很久以前母亲给她买的图画书。这本书她每天都看，她没有别的书。她一面看一面用手指在字母上划来划去，好像在阅读似的。
“你怎么一大早就糟蹋书本？把书放回去！”彼佳吩咐妹妹，“母亲在哪里？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娜斯佳轻声回答，合上了书。
“父亲上哪儿去了？”彼佳朝厨房和房间里看了一遍，问道，“他拿了背包没有？”
“他拿了。”娜斯佳说。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说，他光亲了亲我的嘴巴和眼睛。”

“原来是这样。”彼佳说着便沉思起来。

“你给我站起来。”彼佳命令妹妹，“我来给你把脸洗干净，给你穿上衣服，我带你出去……”

此刻，他们的父亲正坐在火车站。他已经喝了四两伏特加酒，一大早就凭旅途供应证吃好了午饭。昨天夜里他就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到玛莎住的那个城市，和她再次相会，也许从此以后跟她永不分离。遗憾的是，他的年龄比这个澡堂服务员的女儿大许多。不过，结果究竟怎样还得走着瞧，事前无法预测。但伊万诺夫还是希望玛莎见了他多少会高兴的，要是那样的话，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表明他自己也有了新的知己，而且还是个漂亮的、活泼的、心地善良的人。到了那儿事情会清楚的！

不一会儿，火车来了，这列火车正巧开往昨天伊万诺夫回来的那个方向。他拿起背包向车厢走去。“玛莎料不到我会去，”伊万诺夫想，“她曾经对我说过，我迟早会忘记她的，我和她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我现在就去找她，而且永不分离。”

他上车后站在过道平台上，他想等火车开动了再最后看一眼这座小城——这是战前他居住的地方，是他的两个孩子出生的地方……他想再看一眼他抛弃的那个家，从车厢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家的房子，因为他们家所在的那条街正对着火车要经过的铁路道口。

火车启动了，徐徐经过车站的岔道，向荒凉的秋野驶去。伊万诺夫抓住车厢的扶梯，从过道平台上看着一幢幢小屋、大楼、板棚以及消防瞭望塔，看着这座曾经使他感到亲切的城市渐渐向后退去。他认出了远处那两个高高的烟囱一个是中国厂的，另一个是砖厂的，柳笆现在正在那儿压砖坯。现在让她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吧，他也将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也许他能够原谅她，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反正他已经铁了心，决不原谅那个在战争期间为了排遣孤独和寂寞而与他人亲吻同居的人。至于柳笆因为生活艰难、不堪贫困和痛苦折磨而跟什么谢苗或叶夫谢亲热，这不能成为开脱辩解的理由，只能证明她对他们有感情。一切爱情均产生于贫困和痛苦，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缺，一点都不痛苦，那么他永远不会爱上另一个人。

伊万诺夫打算离开过道平台，到车厢里睡觉。他不想最后看一眼那幢自己曾经住过、他的孩子还留在那儿的房子，何必自寻烦恼呢。他探身看了看前面，想知道离那个道口还有多远。他一眼就看到了道口。铁路在这里与一条通往城里的乡间土路交叉。土路上散落着从大车上掉下来的一束束麦秸和干草，以及柳枝和马粪。除了一周两天的赶集日子，这条路上一般很少有行人，偶尔有个农民赶着满载干草的大车进城或者从城里返回乡下。现在就是这样，路上不见人影，只是从城里，从和土路相接的那条街上，远远的有两个孩子跑过来，一个大一点，另一个小一点，大的搀着小的手，拉着他飞跑。那小的不管怎样使劲，怎样加快脚步，还是赶不上那个大的。于是那个大的拼命拖着小的往前赶。跑到城边最后一幢房子附近，他们停下了脚步，朝车站方向看了看，肯定是在考虑要不要到车站去。然后他们又朝正在经过道口的客车看了看，便径直朝列车奔来，似乎想立即追上它。

伊万诺夫所在的车厢正在通过道口，他拎起放在过道平台地板上的背包，准备进入车厢，躺到上层那个铺位睡觉，免得其他旅客来打搅他。那两个孩子有没有追上最后一节车厢？伊万诺夫在通过平台上探身朝后面看了看。

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继续向道口奔来。突然，他俩一起摔倒了，爬起来又继续往前跑。大的那个举起一只手，脸对着行进中的火车，对着伊万诺夫的方向，不停地招手，好像在呼唤什么人回到他身边。这时候，他们又摔倒在地上。伊万诺夫看清楚了，大的那个孩子一只脚穿着毡靴，另一只脚穿着套鞋——怪不得他老是摔跤。

伊万诺夫闭上眼睛，他不愿看到，也不愿感受那两个筋疲力尽、摔倒在地的孩子的疼痛。他只觉得自己胸口火辣辣的，似乎他那颗禁锢着的心有生以来始终在无谓地跳动，直到此时此刻才冲破牢笼获得了自由，使他浑身充满了温暖和战栗。他好像豁然开朗了，对过去知道的一切，现在认识得更加准确更加深刻了。过去他是隔着一层自尊和自私的屏障去感受另一种生活，现在他那颗袒露的心突然直接接触到了。

他站在车厢扶梯口，再次朝车尾方向那两个渐渐离去的孩子看了一眼。这时候他已经知道，那是他的两个孩子，儿子彼佳和女儿娜斯佳。车厢经过道口的时候，他们肯定看见他了，所以彼佳才呼唤他回家，回到母亲身边，而当时他正在考虑别的事情，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们，没有认出自己的孩子。

这时候列车已经把彼佳和娜斯佳远远抛在后面，但他们还在沿着铁轨旁的沙土小路拼命奔跑。彼佳仍然拉着妹妹娜斯佳的手，她的脚步赶不上的时候就拖着她跑。

伊万诺夫把背包扔下车，然后走下扶梯，踏上了那条沙土小路，他的两个孩子正沿着这条小路向他奔来。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作家、戏剧家、诗人，被誉为“二十世纪唯一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光荣传统的苏联作家”。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篇小说《基坑》《原始海》，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归来》，诗集《蔚蓝色深处》，儿童文学故事集《七月的雷雨》等，另有戏剧作品多部。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其主要作品才陆续得以出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Johannes Vermeer](#). (1657–1658) *The Milkmaid*

维米尔的送奶女工

显然,我永远无法报答母亲的恩情,也永远写不出能与《信》——米盖尔·托尔加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创作于科因布拉——比肩的诗作:

“儿子”……

接下来你将读到的文字

纯洁、明亮,

即使我在黑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母亲是送奶女工。她推着小车,带着两只锌皮奶罐,挨家挨户地送奶。奶是从马努艾尔外公家的牛身上挤出来的,外公住在圣科尔波,离城十二公里。外公年轻时,一天抓着教区牧师的钢笔说:“要是我会写字,一定写得一手好字!”他学会了写字,真的写得一手好字,那种用植物修饰的花体字。他还受人之托,修了几百封家书,给远在他乡的亲人。我在他书桌的明信片上,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像、伊瓜苏瀑布和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骑手。我们住在拉科鲁尼亚高山区,圣托马斯街的底层,低到连活动地砖里都藏着蟑螂。有时,我们会玩蟑螂,当它们是敌军。我知道什么叫害怕,不懂什么叫恐惧。我来说说是怎么感到恐惧的。母亲推着小车,带着奶罐去送奶。我和妹妹玛利亚在家玩,突然听到爆炸声,街上闹哄哄的。我俩跑到底层窗前,想看个究竟,贴着窗户,发现恐惧正向我们走来。母亲回到家,看见我和妹妹躲在厕所里抱头痛哭。恐惧是大头国王。

一九六〇年我三岁,下午听囚犯在监狱院子里唱赞美诗,晚上看大力神灯塔上的光束如宇宙风车,在床头扫来扫去。灯塔的光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父亲在大海的另一边,一个叫拉瓜伊拉的地方。

三岁那年的事我记得一清二楚,比说这个故事前、今天发生的事还记得清楚。连别人说没发生过的事我都记得,比如:教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火鸡过圣诞节。圣诞前夜,火鸡奔向大力神灯塔所在的那座山,左邻右舍穷追不舍,眼看就要抓到,火鸡不可思议地腾空而起,如野鹅般消失在海里。我见过、却没发生过的事,这是一例。

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那次盼望已久的旅行是我的朝圣之旅。我迫不及待地去看《吃土豆的人》。画中包含着神秘的热切之情,是我见过宗教性最强的作品,圣家族的真正体现。我克制下跪的欲望,生怕像戴墨镜、穿短裤逛教堂的古怪游客那样引人注目。卡斯蒂利亚语里的“热切”有两个词: *hervor* 和 *fervor*, 加利西亚语里只有一个: *fervor*。土豆盆里的热切,上升到微弱的灯光下,照亮了农户的脸。一家人热切地注视着神圣的食物,大地奉献的卑微果实。我还去了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见到了维米尔的《送奶女工》。

《送奶女工》创作于一六六〇年,梦幻之处在于光。专家和批评家们纷纷撰文,对光的本质提出了各种建设性看法,但结论无一例外,永远是问号,被称为维米尔之谜。《送奶女工》落户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之前,曾数易其主,一七九八年被一个叫简·雅各的人以一千五百弗罗林的价格卖给一个叫 J. 斯潘的人,货单上写着:“光从侧面窗户照进,奇迹般自然。”

三岁时,我见过这幅画,认识那个女人。我能解开光之谜。

还记得吗,妈妈? 几百年前,在代尔夫特,
你在约翰内斯·维米尔家举着奶罐倒奶,
就是那个画家,卡塔莉娜·博尔内斯的丈夫,
卡塔丽娜是玛丽亚·廷斯夫人的女儿,
自大的廷斯夫人有个傻儿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威廉,
是他玷污了可怜的玛丽·赫里茨,
妈妈,就是那个给你开门,
让你进去的女仆,
你走到墙角桌旁,
从奶罐里倒出蝴蝶般的光影
源于在代尔夫特阴郁的绿草上放牧的奶牛。
就是我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里梦见的那个,
约翰内斯·维米尔用牛奶

小说

维米尔的送奶女工 / 物品

马努埃尔·里瓦斯 | 新书推荐

加利西亚作家马努埃尔·里瓦斯代表作

《蝴蝶的舌头》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原书名《亲爱的,你要我怎么做?》,是加利西亚作家马努埃尔·里瓦斯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他用诗意、敏锐的笔触,融合民间故事、幻想、人类心理学,编织了十六个与爱有关的故事:

一名旅行推销员焦急等待着离家出走的儿子回家,并得到一个摇滚乐手的神奇帮助;维米尔《送奶女工》这幅画的神秘之光让一位作家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名年轻人在一次拙劣的抢劫中丧生,他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一名小学生和一位教师出于对动物生命的共同好奇而建立的友谊,在一九三六年夏天遭到毁灭……

经 99 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维米尔的送奶女工》《物品》两篇,分享给读者。



画墙、画黄铜水罐、画篮子、画面包、
画你的胳膊，
尽管在创作的画面里
光源是窗。
维米尔之光，几百年的谜，
上帝之手晃动的难以形容的明亮
是蝙蝠出没时，
你在昏暗的牛圈里挤出的奶。

我把诗拿给母亲看，她眼睛眨都没眨。我心里没底，说的是光，也许太晦涩。我去书架，拿了本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有关维米尔的书，里面有《送奶女工》的照片。这下，她受到震动，不声不响地看了好久，后来把诗收好，走了。

若干天后，母亲又来到我们家，和平常一样，带来了自家鸡生的蛋，自家菜园里种的土豆、洋葱和莴苣。她总说：“去哪儿，都带上点。”临走又说：“我还给你带了样东西。”她打开包，拿出一张白纸，叠得像绣花手绢，里头有一张照片。母亲说，去姐妹家挨户地找，刚找到的。

是她少女时的照片，拍摄于一九六〇年前，当然，远在一六六〇年后。谁拍的，她不记得了。但她记得那户人家，女主人脾气不好，儿子脑袋不好。开门的女仆貌美如花，家乡在库列雷多附近。“一天，我去那儿，开门的不是她。她被辞退了，原因我一直没弄清。”她目光里有个疑问：“你怎么会知道可怜的玛丽姑娘的遭遇？”她又说：“穷人多坎坷。”

然而，母亲丝毫没有留意，画中的女子和照片中的女子就像两滴牛奶，一模一样。

物品

“作为观众，说实话，他表情不太丰富，”电视机说，“他端着威士忌，坐在那边沙发上，冷冷地看着电视，似乎酒不上头，上头的只有冰块。那天晚上不同。那天晚上，他和屏幕上的人一起说话，像在配音。我觉得，他不喜欢台词，也不喜欢画面，一个劲地皱眉头，像在游园会上照哈哈镜，丑态毕露。”

电视机一反常态，沉思了好几秒。

“好吧，我承认，此看法纯属马后炮。”

躺在客厅桌上的哈姆雷特说：“他读书不多，至少这些年读书不多。不过，那天晚上，他来到书架前，我们这些书个个争先恐后，昂首挺胸。他碰了几本，最后选中了我，一口气读到第三幕第二场，夹上书签，就在‘让我变得残忍，但不失去人性’这页。”

“像水一样，一清二楚。”杯子声音沙哑。

“为什么？”灯问。

“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答案。”

“别傻了，”灯投下黑天鹅般的影子，反驳道，“‘让我变得残忍，但不失去人性！’这话说了也白说。虽然我对哈姆雷特朋友十分敬重，但文字如今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文字只跟作者有关，也许跟作者都关系不大。只有留给打扫卫生的阿姨的纸条是他亲笔写的：麻烦您擦一擦客厅窗户。根本不像遗言。”

“有个警察，最胖的那个，做了记录，”哈姆雷特腼腆地说，“他翻到书签那页，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

“他抄什么，我全看见了，”灯出言讥讽，“此时，我无法心口如一。”他抄的是这句。朋友，问题在于，你找你话，他找他话，各取所需。”

“姑娘冰雪聪明，”烟灰缸自负地说，知道多点的人就这德行，“她擦掉了所有指纹，连沾上口红的烟蒂都装在包里带走了。”

“不是她干的！”电视机怒吼。

“你怎么这么肯定？”挂钟问，“没人摆出这种脸色给我看。哈姆雷特也许会说，脸色比遗臭万年的墓志铭还难看。”

“她气坏了，仅此而已。”电视机说，然后又小声补充：“我了解她，不是她干的，她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干出这种事……”

挂钟老于世故地笑了。

“我见过她在电视里开枪，为什么不在现实生活里开枪？戏里戏外都是戏！还记得沙发上的爱情戏吗？撕碎我！吞掉我！杀了我！”

“你傻，”电视机打断它的话，“什么都不懂。”

“我是现实主义者，”挂钟不动声色，“我们知道真相，人类不知道。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可真相就是真相。她嫉妒了，她有理由嫉妒。她发现有别的女人来过这儿，空气中还有别人的气息。他们去卧室，吵了起来。有枪。她知道床头柜里有枪。她开枪杀了他，像电影里那样。干吗自己骗自己？手枪的话，咱们全听见了。”

“你说得没错。”灯表示赞同。

“咱们什么也没看见，”电视机说，“咱们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听见了，这就够了！”挂钟嚷嚷。

“你别仗势欺人！”电视机气急败坏。

窗外雨声凄切，像黑色电视剧里的场景，闪烁的霓虹灯泪珠般洒落在落地窗上。挂钟居高临下。有悬念，想想再说。它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手枪的话，咱们全听见了：是她干的！是她干的！”

这时，黑暗鬼魅地在卧室里大声叫唤：

“手枪是小人！”

所有物品静待下文，挂钟的嘀嗒声敲打着房屋的太阳穴。

“姑娘跑过去，想拥抱他，”黑暗说，“我听见手枪在小声嘀咕：要不是我，你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混蛋。”

大家都等着哈姆雷特压轴，可他望着港口。一艘大太阳捕鱼区的轮船汽笛长鸣，像海上公鸡报晓，向白昼神致敬。



马努埃尔·里瓦斯

屡获殊荣的加利西亚作家、诗人、编剧和记者。出生于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科拉鲁尼亞省，以加利西亚语为创作语言，被视为加利西亚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作家。十五岁开始写作生涯，至今已出版了十九部长篇及短篇小说集、十部诗集、一部剧作等，其中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木匠的铅笔》是加利西亚文学史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还被改编为电影。曾获得西班牙文学批评奖、西班牙国家叙事文学奖、加利西亚文学评论家奖等，二〇〇九年当选为加利西亚皇家学院的院士。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Vasily Surikov](#). (1881) *Morning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Streltsy*



彼得堡，7月20日

根据早上得到的消息，彼得霍夫庆典时发生的灾难，比我想的还要严重。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搞清楚事件确切的情况。这里的任何事故都被当作国家大事，以为那是天主没有尽到对皇帝的责任。

政治迷信作为莫斯科大公国社会的灵魂，使其首领要承受所有的不满，以至于无能会引发反叛，地会极力要求反抗天。如果我的狗受了伤害，它会到我这里来疗伤；如果天主让俄国人受苦，他们马上会呼唤他们的沙皇。这位君主不为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负责，却必须为天主方面的所有事情负责。这是人篡夺神的权利自然会带来的后果。一个允许别人把自己看作不仅仅是凡人的人，要把在他统治期间上天降到人间的所有灾祸担在自己身上。由这种政治狂热产生了在别的国度闻所未闻的脆弱和敏感的心理。不过，在极少取决于人类意志的灾难问题上，政府认为有必要维持的保密，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它给想象力留下了随意驰骋的空间。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的兴趣、担忧、抱负或者心情的不同，由于各色人在宫廷中的处境或者在世上的地位不同，每个人讲得都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彼得堡，真相全凭想象。法国现在也变成了这样，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随心所欲的书报检查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连要弄清楚最简单的事实都不可。

因此，有些人说前天只死了三十人，有人说是一千两百人，有人说两千人，还有人说是一百五十人。我们连可以说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可以想象，所有事情想必都是不确定的。看到一个如此浑浑噩噩的民族，心满意足地、平静地生活在主人的政策给予它的朦胧的光亮中，我始终感到很惊奇。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习惯于认为，就像人的身体离不开太阳和空气一样，人的灵魂也离不开真理；但我的俄国之旅让我如梦方醒。真理只有对于高尚的心灵或者先进的民族才是必需的；适合粗俗的民族的是谎言，那对它们的感情和习惯有利；在这里，撒谎是为了保护社会，说真话是要推翻政府。政治领域朦胧的光亮还不如极地的天空透明。

我可以保证与彼得霍夫大灾难有关的一起事故的真实性。三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那个我认识——在彼得堡待了有些日子了。他们的父亲在英国，母亲在卡尔斯巴德等着他们。庆典那天，两个年龄小的乘船前往彼得霍夫，他们的哥哥不在船上，因为他一直不肯答应他们提出的要他同去的要求，理由是他丝毫不感兴趣。他把他们送上小船，跟他们说明天再见。三个小时后，两人都死了！和他们一起遇难的还有同船的几个妇女和小孩，以及两三个男人：获救的只有一个善于游泳的水手。幸存下来的那个倒霉的哥哥陷入了难以言状的绝望。他现在正准备出发，到他母亲那里，告诉她这个伤心的消息。她曾经写信给她的几个儿子，要他们记得去看一看彼得霍夫庆典，而如果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想要多待些日子，那就不用着急离开——意思是她会在卡尔斯巴德耐心地等待。她如果表现得稍微着急一点，说不定会救了他们。

在彼得堡，真相全凭想象。

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大灾难会引起多少报道、议论和建议啊！有多少报纸会说，又有多少声音会附和说，警方根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那些船只根本不适合在海上航行，船夫只想着赚钱，而当局非但没有干预，反而因为自身的麻木或腐败加剧了危险！还会说，像其他许多皇家婚礼一样，在庆祝女大公婚礼的时候，就出现了非常不好的兆头；接着就会是日期、暗示和例证。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到处都在沉默，这种沉默比灾难本身更可怕。报纸上的两行字，没有细节，就是公开给出的全部消息，而在宫廷、城市和上流社会的

非虚构 “迄今为止 对俄国的最佳描述”， 百年前的评价并不过时

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 | 新书推荐

以另类视角，游历19世纪的沙皇俄国。

1839年法国作家屈斯蒂纳开启俄国之行。此行是受到巴尔扎克的鼓励，更主要的刺激来自托克维尔，后者在1835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获得巨大赞誉。托克维尔在书中不情愿地承认美国模式不可避免的胜利，同为贵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纳对此却表示怀疑，想通过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称式比较来否定这一观点。从7月10日抵达圣彼得堡，8月3日到达莫斯科，到10月1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国待了不到三个月，不会说俄语，而且旅行中一直受到政府官员的保护和监视。不过之后他却写出了一份长篇旅行记录，用三十六封信来呈现他的俄国之行。

《俄国来信》是屈斯蒂纳最为著名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俄国对应。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称该书为迄今最了解俄国的著作，20世纪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称其为对俄国的最佳描述。

除了以优美的文笔生动地描述宫廷、街头和乡村的生活，作者还收集了关于法院、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以及行政、科学和民俗的资料，整体呈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风貌，让我们获得另一个渠道，了解被伟大的俄国文学描写过的那个国家。

经野望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七封信分享给读者。

沙龙里，则只字不提。彼得堡没有可以让人在那里评论报纸的咖啡屋，实际上也没有可评论的报纸。小雇员比达官贵人还胆小；上级之间不敢提到的事情，下属更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至于商人和店主，那种对于所有想在这个国家生活并变得发达的人来说必不可少的城府，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他们说到严肃因而是危险的话题，那只有在完全私密的场合。（作者附释：这里我插入今年[1843年]收到的一位女性友人的来信摘录；它虽然不能增加新的东西，但还是有助于说明我已经说过的内容；而且相比我自己的说法，它能让人对于心灵在俄国受到的钳制有更深的了解。“当您在彼得堡的时候，有位意大利画家也在彼得堡。他现在在巴黎。就像您之前跟我说过的那样，他也把大灾难的情况告诉了我，说是在大灾难中死掉的大约有四百人。画家把他的故事告诉我时，声音很低。‘这我知道，’我对他说，‘但您为什么要这么小声呢？’‘唉！因为皇帝禁止谈论此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隔了这么远的距离，他还是这么听话，真让我惊讶。但您一向直话直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出版您的游记？”我再举一个例子，它出自1842年10月13日《辩论报》的一篇文章。

“1840年10月，在圣彼得堡至克拉斯纳克塞洛的铁路上，两辆列车迎面相撞，原因是它们的工程师因为浓雾没有看到对方开过来。所有东西都撞得粉碎。据说在破碎的车厢周围躺了有五百人，有的死了，有的缺胳膊少腿，还有的受了不同程度的重伤。这件事在彼得堡几乎没有人知道。只有在次日一大早，有几个好奇的人冒险去看了事故现场。他们发现车辆残骸已被清理，死者和伤者已被转移，而唯一能证明发生过事故的是，他们发现有几个警方的探员。那些探员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早去那里，之后又责备他们太过好奇，并粗暴地命令他们全都回家。”

俄国奉命不要去说会让皇后烦心的事情，这样，她就可以跳一辈子舞！“她会难受的，所以不要打破她的宁静。因此，就连孩子、朋友、亲戚这些亲爱的人死了，也没有谁敢为他们哭泣。这里的人可怜得都不敢有怨言。

俄国人全都是廷臣。在这个国家，士兵、密探、狱卒、刽子手做的事都超出了他们的本分，都在像寄生虫一样从事自己的工作。谁能告诉我，一个不是把人的尊严作为基础的社会，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再说一遍，要破的和要立的一样多，然后这里才会出现一个民族。

警方的这次沉默不只是因为想要讨好，也是因为害怕。奴隶害怕主人发怒，于是就想方设法让他高兴，让他处于无害状态。沙皇一旦生气，锁链、地牢、鞭子和西伯利亚都是他可以用上的惩罚手段。最好的情况下还有高加索，它对于因为时代精神而变得温和了些的专制统治来说，算是比西伯利亚要轻的惩罚。

不可否认，在这次的例子当中，灾难的头号原因是管理部门的玩忽职守。如果当局不允许彼得堡的船夫超载，或者不允许太小或太不结实、不能抵御波涛的船只冒险在海湾航行，那就不会死人；可谁知道呢？总的来说，俄国人做水手不行；他们在哪儿，哪儿就有危险。如果水手是长袍长须的亚洲人，听说船只出事就不足为奇了。

庆典那天，一艘通常往返于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的汽船驶向彼得霍夫。它又大又结实，可还是像那些比较小的船只一样有倾覆的危险，要不是因为乘客中的一个外国人，它真的就那样了。这人（他是个英国人）看到周围有几艘船翻掉了，意识到形势很危险，而且他还注意到，他们的船只操纵和指挥得非常不当，于是他想到一个好主意，用自己的刀割断了用来固定为了乘客的舒适和方便而搭在甲板上的遮阳篷的绳子。一看到要起大风的样子，头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凉棚撤掉。俄国人根本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办法，要不是因为那个外国人比较镇定，船绝对翻掉了。船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航行，不过，总算是得救了，而船上的人真是太幸运了，能够返回彼得堡。要不是救了它的那个英国人是我的一个英国朋友的熟人，这件事我是不会知道的。我对其他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起它，他们证实确有此事，但让我不声张！哪怕是《圣经》中的大洪水发生在俄国皇帝统治时期，要议论也不行。

在所有的才能当中，这里唯一看重的是处事要圆通。想象一下整个国家都在这种客厅美德的重轭下俯首帖耳，想象一下整个民族都像一个早晚要发大财的滑头那样世故，你就会明白在俄国交谈的实质和价值。如果说哪怕是在宫廷里，这种宫廷气氛都压迫着我们，那在它追逐我们进入非常清净的家庭圈子时，它对于生活是多么不利啊！

俄国是个哑巴国家。某个法力强大的魔法师把六千万人变成了机器人，他们要等待另一个魔法师的魔杖，才能重新享受生活。它还让我联想到森林中睡美人的宫殿，金碧辉煌，但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生气，或者说自由。

皇帝想必为此非常苦恼。天生发号施令的人，不管是谁，无疑都喜欢服从，但人的服从比机器的服从更有价值。被阿谀奉承之人包围的君主，对于不希望让他知道的事情，肯定总是不知道。因此，他必定是什么话都不信，什么人都不信。这就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的命运。他和蔼可亲是没有用的，他活得像人也是没有用的，环境的力量让他身不由己地变得冷酷无情。他占据了专制君主的位置，就必须顺从专制君主的命运——采取他的态度，或至少扮演他的角色。

在这里，欺瞒的罪恶蔓延的范围之广超乎想象。俄国的警察折磨起民众来反应很快，但在民众遇到不测向他们求助时，他们提供的帮助或信息总是姗姗来迟。

这个国家虽然崇拜圣灵，但它在人间有自己的神。像泰摩兰一样，俄国的皇帝也接受臣民的偶像崇拜。俄国的法律根本就没有受洗。

我每天都听到有人赞美圣彼得堡的人温文尔雅、有礼貌、脾气好。要是在别的国家，我会称赞这种平和的性格，但在这里，我只能把它看作我感到不满的那种罪恶的最恶劣的表现。人们是因为害怕才装出一副满足而平静的样子，好让压迫者满意，也好保证受压迫者的安全。真正的暴君喜欢周围都是笑脸。在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恐怖气氛的统治下，顺从成了普遍的行为法则，受害者和刽子手全都养成了顺从的习惯，结果使得他们造成的或他们忍受的罪恶永远存在。

我的思考和议论有点散漫，但我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因为，相比于用一种比较有条理的方式，尽量避免诸如不连贯、东拉西扯或主题混乱之类的指责，我这样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从一个想法转向另一个想法，从而可以更好地从总体上描绘俄国，如实地反映它在我眼中的样子。人民的状况，皇帝的伟大，街道的面貌，公共建筑的美观，宗教原则的堕落所引起的心灵的退化，全都同时映入我的眼帘，而且可以说，同时在我的笔下闪过。俄国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对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思考，可以揭示出俄国生活的原则。

昨天，我和一个法国人在外面散步。他是个聪明人，对彼得堡的情况很熟，因为他是家庭教师，就住在彼得堡一个大贵族的家里，因此有机会了解过客们完全不可能了解的真相。他认为我把俄国想得太好。想到俄国人将会对我提出的责难，这话让我乐了，但我坚持说我是公正的，因为在这里就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我憎恶的只是在我看来不好的东西，我赞美所有好的东西。

这个法国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俄国的贵族当中。我们正悠闲地走在涅夫斯基大街漂亮的人行道上，突然，一辆黑色的，或者说深绿色的四轮大马车在我们前面经过。它又长又矮，四面全封闭，活像一具带轮子的大棺材。四个大约六英寸见方的带铁栅栏的小孔，可以给这座移动的坟墓透气透光。一个八岁或者顶多十岁的小孩赶着车上套的两匹马，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它有不少士兵护送。我还没来得及问我的同伴这么奇特的马车是做什么用的，一张苍白的面孔就让我的问题有了答案。透气孔旁边的这张面孔使我立刻意识到，这辆马车是用来押送囚犯到他们的目的地的。

“这是俄国的囚车，”我的同伴说，“别的国家肯定也有类似的可恶的东西，但他们尽量不让公众看到，而在里，他们是尽可能地公开。多么可恶的政府！”

“想想它必须面对的困难吧！”我答道。

“啊，您还在受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看得出来，俄国当局可以随意地向您灌输不管什么观点。”

“我尽量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什么比执政者的立场更需要被公正对待的了，因为事情的现状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即便是在进行谨慎的改革，也要维护它。如果只是把统治这个劣等民族的铁棒拿开一小会儿，社会就会天翻地覆。”

那是他们告诉您的。可是，相信我，他们喜欢这种虚假的必然性。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些对于他们不得已才实行的严厉措施怨言最多的人，会后悔放弃它们。他们实质上喜欢不受检查或制衡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运作起来要比其他任何政府都容易。没人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可以让他的工作变得比较容易的东西。要是不借助于地狱中恐怖的景象，您能指望布道者去改变冥顽不化的罪人吗？地狱是神学家主要的惩罚工具。（作者附释：我请求读者记住，那样说话的不是我。）起初他们用它还带着遗憾，觉得那属于必要的恶，但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要把大部分人都罚入地狱。苛政也是一回事。在尝试之前，它们让人害怕，但在看到它们取得的成功之后，它们受到称赞；请您相信，在这个国家，这样的想法太普遍了。我常想，他们喜欢制造事端，那样

一来就必然要加以惩罚，因为他们担心长时间不操练就变得生疏了。难道您不知道伏尔加河畔现在发生的事情吗？”

“我听说那里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但他们说它们很快就被镇压了。”

“那不用怀疑，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您是不是想说，我准备告诉您这些可怕的骚乱是皇帝的一句话引起的？”

“您决不会要我相信，他会赞成如此可怕的事情吧。”

“我也没有说他赞成。不过，他说过的一句话我相信无意中招来了灾祸。事情是这样的：尽管皇帝委派的管家不公正，但皇帝的农民还是比其他农奴的命运好一点，所以，每当君主获得某个新的领地，其居民便会成为他们所有邻居羡慕的对象。不久前，皇帝买了一个相当大的庄园，那个地区后来造反了。农民马上从周围农村的各个地方派代表去见皇室土地的新管家，恳求皇帝把他们也买了。被选为代表的农奴接着又被派去彼得堡。皇帝接见了他们，对他们很和善。可是，让他们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买他们。‘我不可能把俄国全买下，’他对他们说，‘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个帝国所有的农民都获得自由；如果事情仅仅取决于我，那俄国人从今往后就会享有我希望他们拥有的独立的地位；我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在将来获得这种独立的地位。’”

“好，这个回答在我看来非常合理、坦率和人道。”

“那是肯定的，但是，皇帝应该知道他这番话是对谁说的，不能因为对农奴心软就对贵族不客气。这些话经过野蛮、嫉妒之人的解释，把整整一个省都点着了，那样一来，就不得不惩罚受到蛊惑犯下罪行的民众。‘我们的父亲希望我们得到解放，’回去的代表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边境地区呼吁说，‘他只希望我们幸福，这是他亲口对我们说的，因此，与我们为敌并且反对我们父亲的善意的，只是贵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让我们为皇帝报仇！’这以后，农民们相信他们反抗自己的主人是替天行道，结果，一个县的所有贵族及其所有代理人都和家人一起遭到屠杀。有的被他们串在烤肉杆上活活烤死，有的被他们放在大锅里煮死，庄园的管家和代理人被他们掏出肠子，用其他各种花样杀死。他们把遇到的人全都杀掉，把整个城市全都烧掉，总之，蹂躏了一个省，不是以自由的名义，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而是以解放的名义和皇帝的名义。”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路过的囚车里，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些野蛮人。西欧各国的政府采取的温和手段，在这种人身上怎么可能有效果？”

“必须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觉得改变他们的居住地更方便。每次发生诸如此类的事件，村子和整个县都会被迁走。没有哪里的居民有把握保住他们的地盘。结果，已经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土地的人们，在奴役中被剥夺了适合他们状况的唯一的补偿。他们没有得到解放，却被接连几下阴招弄得失去了立足之地。君主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像树木一样连根拔起，脱离故土，送到世界的尽头死去或受苦。置身于最高权力的这些风暴中的农民不爱自己的小屋，尽管那是他在整个世上唯一可以爱的东西；他憎恶自己的生命，不理解它的责任，因为要让人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就必须让他得到某种程度的幸福。悲惨的生活只能教会他虚伪和造反。自利，如果得到合理的理解，即便不是道德的基础，至少也是它的支柱。”

“但是，要改变人民的精神很困难，它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一个君主就可以做到的。”

“这是他们真心下功夫做的事情吗？”

“我想是的，但他们比较谨慎。”

“您说的谨慎，我认为是没有诚意，因为您并不了解皇帝。”

“可以说他固执，但不能说他虚伪。在君主身上，固执往往是一种美德。”

“您相信皇帝的性格是真诚的吗？想想他在普希金死的时候的表现吧。”

“我不清楚那件事的情况。”

我们就这样一路谈着，来到巨大的战神广场。它虽然是在市中心，看起来却像是在荒漠。与卧室相比，在那里谈话被人偷听的危险性很小。我的导游继续说道：“正如您知道的，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

“那方面我们不好做出评价。”

“至少我们清楚他的名声。不管是否有足够的根据，他当时名声很大，年轻，脾气暴躁。您知道，他继承了他母亲一方的摩尔人血统。他的妻子非常漂亮，他对她的激情多过信任。他的诗人气质和非洲血统使他很容易嫉妒，正因为如此，在被类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表面现象和有关不忠的恶毒谣言激怒之后，这位俄国的奥赛罗

失去了理智，试图逼迫那个他相信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与他决斗。那人是法国人，而且很不幸，还是他的连襟。他名叫丹特士。决斗在俄国是很严重的事情，尤其是，和我们那里不同，它在这里不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人们的看法和习俗，大家对它的印象不好，因为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信奉骑士准则的，不如说是东方的。决斗在这里和其他国家一样是非法的，但除此之外，和别的国家相比，公共舆论也不太支持。丹特士先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想要避开这个麻烦。对于那个痛苦的丈夫的强烈要求，他拒绝了，尽管是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继续献他的殷勤。普希金快疯了。他盼着死的那个男人经常出现，在他看来是永远的侮辱，所以，为了亲手除掉那个男人，他采取行动，让决斗不可避免。连襟两个打了起来，丹特士先生杀死了普希金。遭到公共舆论谴责的那个人获胜了，而无辜的一方，那位受伤的丈夫，那位民族诗人，却倒下了。

“这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公愤。普希金，杰出的俄语诗人，用那种语言写成的最优秀的颂诗的作者，国家的荣耀，斯拉夫诗歌的复兴者，总之，时代的骄傲，未来的希望，倒在一个法国人手里！此事让公众愤怒到极点。彼得堡、莫斯科以及整个帝国都群情激愤。皇帝比在俄国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俄国人。他小心地加入哀伤的公众。他下令举行葬礼；我不确定他装得是不是有点过，竟然亲自出席仪式，为的是公开他的遗憾，让天主见证他对于英年早逝的民族天才的钦佩之情。

“不管怎样，君主的同情让莫斯科大公国人非常高兴，结果唤醒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爱国热情。第一艺术得到的尊重与保护让这位过于轻信的诗人欣喜若狂，他竟然胆大到以为自己有了灵感！在充满感激的渴望中，他思如泉涌，甚至冒昧写了一首颂诗，充满爱国的热情，感谢皇帝成为文学的保护人。他以歌颂已故诗人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那首杰作。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我读过那些诗，我可以证明作者的动机是纯洁的，至少除非是说，隐瞒内心或许想要在将来成为第二个普希金的愿望是一种罪，而在我看来，年轻人有这样的愿望完全是可以原谅的。

“鲁莽的年轻人！竟然想要成名，竟然在专制统治下流露出对于荣誉的强烈的爱！这就好像普罗米修斯对朱庇特说：‘您多保重，我要夺走您的霹雳。’

“因为以那样的方式对其主人之于艺术美和纯文学的热爱公开表示信任，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得到的回报是一道密令，去高加索继续研究他的诗歌——那里是一座自在的小教堂，附属于古老的西伯利亚。

“在那里待了两年之后，他回来了，身体毁了，精神垮了，头脑中的幻想荡然无存。有鉴于此，您还会相信皇帝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和在众人面前的表演吗？”

“皇帝是人，他一样有人的弱点。年轻诗人的引经据典想必有什么触怒了他。也许那些典故是欧洲的而不是民族的。皇帝的做法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完全相反，他挑战而不是讨好欧洲。我承认，这样做不对，其实故意对着干本身也是一种依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完全是受矛盾的影响。但这一点情有可原，尤其是当您想到一辈子都热衷于模仿的君主们给俄国带来的害处。

“您真是不可救药！”这位古代波雅尔的支持者惊呼道，“那您相信俄国文明是可能的？它在彼得大帝之前很有希望，但那位君主把它扼杀在萌芽中。到莫斯科去吧，那是古代帝国的中心。但您会看到，所有人都转向了工业投机，而且那里的民族性格和圣彼得堡一样，也被抹去了。尼古拉皇帝尽管持有的看法不同，但他现在犯了一个和彼得大帝差不多的错误。他没有考虑到整个时代的历史，即彼得皇帝时代的历史：历史有自身的宿命，既成事实的宿命。不顺从命运的君主是要倒霉的！”

天色向晚，我们分手了；我一边继续散步，一边想着在无声的专制统治下，习惯于反思的心灵肯定会涌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样的政府并不能损害人的品德，反而会让它们变得更加坚定和强大。

一回来我就坐下，重读了普希金诗歌的一些译文。它们证实了我先前阅读时产生的一个想法。这位作者的风格很多都借鉴了西欧新的诗歌流派。他不但汲取了拜伦勋爵的反宗教观点、我国诗人的社会观念或德国诗人的哲学，还吸收了他们描述的方法。因此，我认为他不是真正的莫斯科大公国诗人。我觉得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更像是斯拉夫人，尽管他和普希金一样，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真正的俄国诗人，假如说真的有，如今只能对人民说话。沙龙里没人懂他的诗，也没人读他的诗。没有语言的地方也没有诗，实际上也没有思想者。尼古拉皇帝已经开始要求在宫廷里讲俄语。他们现在嘲笑仅仅被视为他们主人突发奇想的新事物，而下一代却会因为理智对时尚的这一胜利而感激他。

人们说着四种语言却一种也不能熟练掌握，在这样的社会中，民族特色怎么可能

得到发展？思想的原创性与语言的纯洁性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的紧密。这一事实
在俄国被遗忘了一个世纪，在法国也有些年头了。我们的孩子会感受到时兴英国保
姆的后果，那种风气在我们中间已经感染了所有“时尚的”母亲。

从前在法国，第一个法语老师，而且我相信也是最好的法语老师，就是保姆。人
终其一生都应该学习他的母语，但是对于孩子，不用正儿八经地教他母语；他不用
学习就该在摇篮里接受它。现在我们法国的小孩不是这样，他们从生下来开始，就
咿咿呀呀、磕磕巴巴地学说英语和德语，之后才把法语当作一门外语教给他们。

蒙田庆幸自己在学会法语之前就学会了拉丁语。也许，我们要把我们古代文学中
最纯正、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归功于《散文集》作者如此引以为荣的那个优势。
他有权利感到高兴，因为拉丁语是我们语言的根，但是，在不尊重自己祖先语言的
民众当中，表达的纯正性和自发性完全丧失了。我们的孩子说英语，正如我们的男
仆仆粉一样！我相信，现代斯拉夫文学之所以缺乏原创性，原因就在于波兰人和俄
国人在十八世纪形成的延请外国家庭教师的风气。当俄国人想把他们的思想再转换
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时，他们需要翻译；由此可见，这种借来的时尚阻碍了思想的流动，
同时破坏了表达的简洁性。

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为什么能在文学、哲学、道德和立法方面，为人类做出比俄
国人更大的贡献？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原始的说话方式始终抱有强烈的爱。

几种语言混杂在一起，对于庸人不会造成伤害，相反，它可以为他们的奋斗提供
帮助。这种人只适合肤浅的教育，而助长这种肤浅的教育的，是用同样肤浅的方式
学习活生生的语言。这样一种轻松的学习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精神上的放松，
对于懒汉或者致力于物质上的目标的人非常合适。可是，一旦这种体系不幸被用于
优秀人才的教育，它就会阻碍自然的进程，把天赋引入歧途，要么是让人在将来因
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要么是让人付出哪怕是最优秀的人在少年期过后也几乎没有闲
暇或勇气付出的努力。不是所有伟大的作家都能像卢梭那样。卢梭是作为一个外国
人学习我们语言的，而如果像他那样去学习法语，就需要具备他的表达天赋和想象力，
加上他固执的性格，还有他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这个日内瓦人的法语
和费奈隆的法语之间的差异，也比如今在巴黎给最上层阶级子女教的那种混杂着
英语和德语的语言之间的大。要是卢梭在儿童都说法语的时代（那时的情况也一样）
就出生在法国，那这个大作家也许就不会经常把句子写得那么难读了。

当时流行的学习古代语言的做法非但没有害处，还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自己语
言的唯一手段，因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就起源于古代的语言。这种学习的好处除了最
适合发展儿童的能力之外——因为作为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力量应当首先灌输到儿
童心中——还能引领我们回到我们的源头活水，从那里强化我们的民族特色。

俄国在如今君主的领导下摆脱了先前君主的错误，慢慢地恢复了生气，并有望获
得一种语言，而我们自己当中的诗人、散文家以及有教养的和自认为开明的人，正
在为法国制造出一代浮皮潦草的模仿者，一代缺乏独立思想的读者。能够很好地理
解莎士比亚和歌德原著的人，竟然既欣赏不了波舒哀和夏多布里昂的散文，雨果的
即兴诗作，拉辛的古典主义作品，莫里哀和拉封丹的原创性和胆识，塞维涅夫人的
风趣和趣味，也欣赏不了拉马丁的情感和神圣的和谐！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创造
出具有足够多原创性的东西，永远保持他们语言的荣耀，并像从前一样把各国的人
们吸引到法国，学习和欣赏趣味的奥妙之处。



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

生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卒于第二帝国时期。他的父亲被处死在断头台上，他和母亲侥幸在恐怖年代活了下来。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屈斯蒂纳因为发表了两本游记《斐迪南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和《俄国来信》而赢得了认可，后一本游记对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根源和特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分析。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Daniele Levis Pelusi](#) on Unsplash

非虚构

“我们的文化至今仍在流浪，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度。”

曼德尔施塔姆 | 新书推荐

“这整个的洪流将把人类词语的脆弱的船
带进未来的广阔海洋”

曼德尔施塔姆是 20 世纪俄苏最有才华也最传奇的诗人。在内战时期，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关押；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又两次被捕，长期遭流放；他一直很贫穷，长期居无定所；他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自杀……最终，他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营。

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和他的诗同样重要。他讨论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关联，描绘了当时圣彼得堡的生活与人们的精神状态，并且最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的未来：未来，社会建筑不再是用人建造的，而是为人建造的。

《时代的喧嚣》是曼德尔施塔姆的代表作，同名篇的自传不仅叙述自己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也描绘了 20 世纪早期圣彼得堡社会生活，书写西方与俄罗斯精神的冲突与交缠、历史的不安与战栗。书中还收入曼德尔施塔姆的文论，展现了阿克梅派的重要主张，见证了白银时代文学的高峰和现代主义的先声。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论词的天性》一篇分享给读者。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文学是不是统一的？当代俄国文学真的是涅克拉索夫、普希金、杰尔查文或西梅翁·波洛茨基的文学的延续吗？如果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那么，它对过去的延伸又有多远呢？如果俄国文学具有一种不间断的特性，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它的统一，什么是它本质上的原则，即所谓的准则呢？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历史进程的加速会变得尤其尖锐。是的，也许有着将当今历史的每一年当成一个世纪的夸张，但是，在历史动力和能量那不断积蓄、增长的潜能之汹涌的实现中，可以发现某种类似几何级进步、类似正确合理之加速的东西。由于摇摆的波浪——即在特定时间间隔中发生的事件——的改变，时间统一的概念也被动摇了，于是，当代的数学科学便并非偶然地提出了相对的原则。

为了在现象那变化的旋风和不止的洪流中拯救统一的原则，以柏格森（其深刻的犹太智慧受到了实践一神论之强烈需求的制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为我们提出了现象体系学说。柏格森不是在合乎时间先后顺序的现象序列中观察现象，而是在现象的空间延续序列中观察现象。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使这一联系摆脱了时间，他在单独地进行观察。这样一来，相互联系的现象便仿佛构成了一把折扇，各个扇面都可以在时间中展开，但与此同时，它们又都服从于可以理解的收拢。

将在时间中相互联结的现象比作那样一把扇子，这所强调的只是现象的内在联系，取代了那种胆怯地屈从于时间思维、长期使欧洲逻辑学家伤神的因果问题，提出了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剥夺了所有的形而上学余味，因为，对于科学发现和假说来说，它更富有成效。

建立在关系原则而非因果原则上的科学，使我们摆脱了进化理论那愚蠢的无穷，更不用说进化理论那庸俗的附庸——进步理论了。现象没有开端和终结的无止境链条的运动，就是愚蠢的无穷，它不能向寻求统一和关系的思想道出任何东西，它会用轻松的、合适的进化理论来催眠科学的思维，这种进化理论貌似科学的概括，但其目的却是对一切综合和内在构造的拒绝。19 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在认识即将到来的世纪之性质上所表现出来的含混和庞杂，彻底败坏了科学思想。智慧，不是知识或知识的总和，而是做法、方式、方法，离开科学，它能够独立地存在，可在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食物。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一智慧是徒劳的，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政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说到科学进化理论和进步理论，虽然它像新的欧洲科学一样自己缩起了脖子，但仍继续在那个方向上卖力，就像一个抵达了乏味疆界的疲惫不堪的泅渡者，又返身游向神智学的海岸。神智学是旧的欧洲科学的直接继承人。它的出路也就通向那里。仍是那种愚蠢的无穷，仍是再体现学说中脊椎的缺乏——“因果报应”，仍是对超感觉世界庸俗理解上的愚蠢和天真的唯物主义，仍是追求能动认识的意志和趣味的缺乏，或某种慵懒的杂食，极其沉重的、指望着数千个胃的反刍，与冷漠毗邻的对一切的兴趣——与无知毗邻的全知。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作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文学中的进步理论，是一种最愚蠢、最令人生厌的小学生式的无知。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但是，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获得都伴随着损失。由于没有任何一台文学机器，没有一个要在别人之前赶去的起点，因此，文学中就没有任何的“更好”，也没有任何的进步。

甚至在个别作家的手法和形式中，这种无意义的优化的理论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便在这里，每一个获得也都同样伴有损失。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掌握了福楼拜小说的心理力量和结构的托尔斯泰，其《战争与和平》中那种野兽般的嗅觉和生理的本能哪里去了？在《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处，《童年与少年》那种形式的纯净哪儿去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作者即便愿意，也无法再写出皇村学校时期的那些诗作了，完全一样的是，如今谁也写不出杰尔查文的颂诗了。而谁更喜欢哪一部作品，那则是另一回事了。就像存在着两种几何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罗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一样，也可能存在着用两种手法写出的两种文学史：一种说的是获得，另一种说的是损失，可两者说的都将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俄国文学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的，那么其延续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优化的理论，我们谈论的将仅仅是现象的内在联系。首先，我们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统一之准则，寻找那使纷繁、零乱的文学现象得以在时间中展开的轴心。

某一民族文学的统一、假定的统一之准则，只可能是民族的语言，因为其他所有的征兆自身就是假定的、暂时的和随意的。语言虽然也在变化，一刻也未处在宁静中，从一个点奔向语文学家意识中另一个非常明晰的点，但在其所有变化的范围里，它仍然是一个“常量”，仍然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每一个语文学家都清楚，什么是适用于语言自我意识的个性的一致。当流行于所有罗曼语系国家的拉丁语开出了新的花朵，培育出了罗曼语系后来诸种语言的萌芽，这时便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与拉丁文学相比，它还很幼稚、贫乏，但这已是罗曼语系的文学了。

当《伊戈尔远征记》的生动、形象的语言响起时，那在每一个转折中都完全是世俗的俄罗斯语言响起时，便开始了俄国的文学。而当维里米尔·赫列勃尼科夫，一个当代俄国作家，沉浸到俄语词源学的最深处，沉浸到聪明读者心爱的词源学之夜中去的时候，那样一种俄国文学——《伊戈尔远征记》的文学——便又复活了。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民族性一样，是由众多无止境的掺和、杂交、授粉和异族影响构成的，但是在有一点上始终是忠于自我的，当我们厨房的拉丁语还没有响起，当强大的废墟上还没有露出新生活的苍白的萌芽，正像一首关于女受难者欧拉里娅的法国民歌所唱的那样：

欧拉里娅是个好姑娘。

她身体美，心灵更美。

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做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因此俄国的语言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自外包围着语言，以其国家和教会的厚墙圈起语言，并充斥着语言，为了慢慢地腐烂或在语言衰落的特定时刻开放出花朵，那么，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则被俄国口头语言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环绕着，这样的语言不具有任何国家的或教会的形式。

俄国历史现实中语言的活力，以其存在的丰满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事实；对于俄国生活的其他所有现象来说，这种丰满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淆。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本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俄国的唯名论，即对自在的词的现实性的认识，鼓舞了我们语言的精神，使我们的语言与希腊哲学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不是词源学和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两者同样具有的内在自由的原则实现的。

任何一种功利主义，都是违背俄国语言希腊化天性的致命的罪过，会不会出现这种为了节约和简化目的而追求电报或速记符号的倾向，或者说，会不会出现一种为神秘的本能、人智说和任何一种吞食一切的没吃饱词的思维而牺牲语言的更高层次上的功利主义，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比如，安德烈·别雷就是俄国语言生活中一个病态的、令人厌恶的现象，这仅仅是因为，为了排他地迁就其投机思维的热情，他无情地、放肆地驱赶着词。他被精细的连篇废话噎住了，无法牺牲其恶作剧式思维的任何一个语气、任何一个断头，炸毁了其懒惰所通过的桥梁。结果，在瞬间的漂亮话之后，是一堆碎石子，一幅忧伤的毁灭画面，它们代替生活的饱满、有机的完整和能动的平衡。像安德烈·别雷这样的作家的基本过错，就是对词的希腊化天性的不尊重，是出于自己本能的目的而对词的无情的剥削。

对词表达情感之能力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作为一个主题在俄国诗歌中比在任何一种诗歌中都被重复得更多：

心灵怎样道出自己？

他人怎样来理解你？

语言就这样使自己免遭放肆的图谋……

语言的发展速度与生活本身的发展毫无共同之处。机械地去促使语言适应生活需要的任何尝试，都事先就注定是失败的。这种强加的、机械的促使，就是对这同时是飞毛腿和乌龟的语言的不信任。

赫列勃尼科夫张着词，像一只耗子，在地下刨出了一条通向未来整个世纪的通道，与此同时，自称为意象主义者的莫斯科比喻派的代表们，却在竭尽全力地欲使语言适应当代，他们远远地落在了语言的后面，他们的命运，就像一堆废纸屑那样被清扫出去。

恰达耶夫认为，俄罗斯没有历史，也就是说，俄罗斯属于一个无组织、非历史的文化现象圈，但恰达耶夫忽略了一点，即语言。如此高度有组织的、如此有机的语言，不仅是一扇朝向历史的门，而且就是历史本身。对于俄罗斯来说，与历史的脱离，与历史必然性和继承性王国的隔离，与自由和合理目的性的隔离，也许就是与语言的隔离。两三代人的“聋哑”，也许会将俄罗斯带向历史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因此，说俄国的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代俄国作家中，比所有的人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危险性的是罗扎诺夫，他在捍卫与词的联系、捍卫语文文化的斗争中度过了一生，那一语文文化是坚定地站立在俄国口头语言的希腊化天性的基础上的。面对一切无政府主义态度是坚定不移的，充分的混乱，一切都无关紧要，只有一点我做不到——过没有词的生活。我无法忍受与词的隔离！这大约就是罗扎诺夫的精神构造。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精神只承认一种权力——语言的魔力和词的权力。就这样，请诸位注意，不要做一个诗人，一个词的搜集者和串联者，而要简单地去做一个说话者或一个爱唠叨的人，丝毫不要去关注风格。

我认为，罗扎诺夫一生都在一个柔软的空间中摸索，竭力想探出俄国文化的四壁。像恰达耶夫、列昂季耶夫、格尔申宗等其他一些俄国思想家一样，他也无法没有墙壁、没有“卫城”地生活。四周的一切都倾塌了，一切都疏松、柔软。但是我们却想历史地生活着，我们内心有一个不可遏止的需求，要找到一个宫城、卫城的坚固，而不论这个硬核名叫国家还是社会。对坚固的渴望和对任何一种象征这一坚固的墙壁的渴望，决定了罗扎诺夫一生的命运，也能完全使他免遭无原则、无政府主义的指责。

一个人去做整整一代人是沉重的，除了死亡他什么也得不到，我腐烂的时候，却是你开花的时候。而罗扎诺夫没有生活过，他在经历他理智的、思想的死亡，在像一代代人那样死亡。罗扎诺夫的生命，就是语文学的死亡，是语言的凋零和枯萎，是一场为生命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生命闪烁在单词和口语、括号和引文中，但它是在语文学中，只在语文学中。

罗扎诺夫对俄国文学的态度，恰恰是非文学的。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现象；而语文学，则是一个家庭的、书房的现象。文学，这是演讲，是大街；语文学，则是大学里的研讨班，是家庭。是的，就是大学里的研讨班，那儿有着五名大学生，他们彼此熟悉，能叫得出各自的名字和父名，他们在听着教授的课，大学花园里几根熟悉的树枝探进窗来。语文学是家庭，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以语调、引文和括号为支撑的。一个懒懒道出的词，在家庭里也具有自己的微妙含义。无休止的、独特的、纯语文学意义上的词的音调变化，构成了家庭生活的背景。正因为如此，如此有力地决定着其文学活动整个结构的罗扎诺夫对家庭性的追求，才被我从其心灵的语文学天性中抽取出来，他的心灵在对坚固的不倦寻求中噼噼啪啪地嗑着自己的词，给我们留下的只有皮壳。罗扎诺夫成了一个无用处的、无成果的作家，便是毫不奇怪的了。

“……多么恐惧，人（永恒的语文学家）为这件事替自己找到了一个词——‘死亡’。难道这件事是可以被命名的吗？难道它有名字吗？名字即是定义，即是‘我们知道什么’。”罗扎诺夫就这样独特地定义了自己的唯名论。

罗扎诺夫与之斗争的反语文学精神，来自历史的最深处；这一精神也是一团不熄的火，和语文学之火一样。

大地上存在着一些被石油点燃的永恒之火；这种火会突然在什么地方燃起，燃上个数十年。没有阻燃剂，没什么能完全扑灭它。路德就已是一个很糟的语文学家，因为他代替证据步入了墨水瓶。反语文学的火焰映亮了欧洲的躯体，像西方大地上一座座炽热的火山一样燃烧着，使它从中喷发而出的那片文化土壤永远地荒芜了。没有什么能扑灭饥饿的火焰。应当让它燃烧，让它去席卷那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急于赶往的敌对之地。

没有语文学的欧洲，甚至连美洲都不是；这，只是文明了的撒哈拉，是一片荒凉。欧洲的宫城和卫城、哥特式的城市、森林般的大教堂、圆顶的寺院将一如既往地挺立着，但是人们将会不理解地看着它们，带着疑问的恐惧犹豫地问道，是什么样的力量竖起了它们，他们周围强大建筑的脉管中流动着什么样的血液。

有什么话好说！美洲也胜似这目前尚能被理解的欧洲。美洲在用尽自欧洲带去的语文学储备之后，似乎失去了理智，沉思了一阵，然后突然引出了自己的语文学，并从其中刨出了惠特曼，他就像一个新亚当，开始给万物命名，像荷马一样，为一种始初的、新命名的诗歌树立了样板。

俄国不是美洲，我们没有语文学的舶来品；我们这里生长不出一个像埃德加·坡那样的古怪诗人，像由一颗随船漂洋过海的棕榈种子长出一棵树那样。巴里蒙特是个例外，他是诗人中最非俄国化的一位，是西方从来不曾有过的风鸣竖琴的异域译者；他天生就是一个译者，是自己最原本的作品的译者。

巴里蒙特在俄国的处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语音强国的外国代表处，是一个无原著的标准翻译的罕见现象。巴里蒙特虽然是个莫斯科人，但在他和俄罗斯之间横亘着一个海洋。

我们没有卫城。我们的文化至今仍在流浪，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度。然而，达里词典的每一个词却都是一个坚果般的卫城，一座小小的克里姆林宫，一座会飞翔的唯名论的要塞，这座要塞装备着希腊化精神，准备与处处威胁着我们历史的无形式的自发性和虚无做不知疲倦的斗争。

既然罗扎诺夫是我们文学中苦行僧的、乞丐式的家庭希腊化的代表，那么，安年斯基就是英雄主义的希腊化和战斗的语文学的代表。安年斯基的诗歌和悲剧可与古代的要塞、城堡相比拟，它们由封侯的王公们在遥远的草原上筑成，以抵御佩切涅格人，与哈扎尔人的黑夜相对峙。

我不再为我黑暗的命运感到委屈：
奥维德也曾赤身露体，疾病缠身。

安年斯基没有能力服务于任何一种影响，没有能力做一个中间人或译者，这简直使人感到吃惊。他最为原本地抓住了别人的东西，但还在空中，在浩渺的高空，他就已放开了自己的猎物，让它自己坠落。他那只曾抓获过欧里庇得斯、马拉美和勒孔特·德·李勒的诗歌之鹰，却没有给我们抓来任何东西，它的爪子上只有一把干草。

你们注意：一个疯子要敲你们的门，
天知道他在哪儿与何人过了一夜，
他的目光不定，他的话语野蛮，
他的手心里攥着一把碎石子；
一转眼，他就会倒空另一只手，
他会将干枯的树叶向你们投去……

古米廖夫称安年斯基为伟大的欧洲诗人。我认为，当欧洲人有朝一日知道了他，虔敬地在对俄国语言的研习中教育自己的后代，一如前人在古代语言和古典诗歌中接受教育一样，到那时，欧洲人会惊讶于这名杰出窃贼的大胆，他从他们那里为俄国的十四行诗窃得了欧几里得的母鸽，从淮德拉的肩膀上扯下了古典主义的披巾，并像一个俄国诗人应该做的那样，带着温情向一直感到寒冷的奥维德献上了一张兽皮。

安年斯基的命运多么令人吃惊啊！触摸到了世间的财富，他为自己保存下来的是可怜的一小把，更确切地说，他抓起了一小把灰烬，然后又把它撤回了燃烧着的西方宝库。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在安年斯基不寐的时候，俗人们声音嘶哑，还没有出现“路标”。年轻的大学生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在师从蒙森，用拉丁文写作关于罗马税收的专题论文。与此同时，皇村学校的校长安年斯基却在整夜整夜地与欧里庇得斯搏斗，汲取着智慧的希腊语言的蛇毒，制作着一种苦涩、辛辣诗句的浸液，那样的诗句，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写过。

对于安年斯基来说，诗歌是一项家庭事业，欧里庇得斯是一位家庭作家，是一连串的引文和括号。安年斯基将整个世界诗歌当成了希腊投出的一束光线。他懂得距离，感觉到了那束光线的激情和冷漠，从不接近外在的俄国和希腊世界。对于俄国诗歌

来说，安年斯基的创作经验就是：不是希腊化，而是完全呼应俄国语言之精神的内在的希腊式，就是说，是一种家庭的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就是一只瓦罐，一把炉叉，一只牛奶罐，一件家庭容器，餐具，身边的一切；希腊精神，就是能像神性一样被感觉到的火炉的热量，是使外部世界依附于人的每一种能力，是怀着那种神圣颤抖的感情披上爱人肩膀的每一件衣服：

急速的河流封了冻，
冬天的旋风在疯狂，
它将一层松软的皮肤，
蒙在神圣老人的身上。

希腊精神，这就是容器取代冷漠的物体对人的有意识的包围，是这些物体向容器的转化，是周围世界的人化，是其逐渐稀薄的目的论热能的扩散。希腊精神，这就是每一座火炉，一个人坐在它的旁边，像评估自己内在的热能一样评估着它的热能。最后，希腊精神，这就是埃及逝者们坟墓般的大船，其上藏有一个人继续其尘世漫游的所有东西，小至香水瓶、镜子和梳子。希腊精神，就是柏格森对词的理解上的一个体系，人可以在自己周围展开这一体系，像展开一把现象的扇子。这些现象独立于时间的决定性，服从于穿越人的“我”的内在联系。在希腊式的理解中，象征就是容器，每一件延伸进入的神圣范围中的物体都可能成为容器，因此，也就都可能成为象征。所以，值得怀疑的是：俄国诗歌中是否需要一种特别的、有意为之的象征主义？它是否会成为有悖我们像容器一样为人的需求而创造形象的语言之希腊化天性的过失？

实质上，词和象征并无任何区别。象征就是一个被封了口的形象；它不能被触动，它不适用于日常生活。这样一些被封了口的形象同样是非常必需的。人喜欢禁止，甚至连野人也将有魔力的禁止、将“禁忌”置于特定的物件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被封了口的、不再使用的形象又是与人相敌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稻草人。

“所有暂时的东西都仅为一种相似。”我们举玫瑰和太阳、鸽子和姑娘为例。这些形象中难道没有一个是本身就有趣的吗？难道玫瑰只是太阳的相似，太阳只是玫瑰的相似，等等？形象像稻草人一样被掏空了内脏，填充进了其他的内容。代替象征主义的“应和森林”的，是一座稻草人作坊。

这便是职业象征主义的追求。认识被搅乱了，没有任何真正的、地道的东西。彼此点着头的“应和”之可怕的对舞，永恒地使着眼色。没有一个明晰的词，只有暗示，吞吞吐吐。玫瑰向姑娘点头，姑娘向玫瑰点头，谁也不想成为自己。

俄国诗歌中相当突出的象征主义团体“天秤座”象征主义的时代，在近一年里扩展成了一座虽是以黏土的腿为支撑的然而却硕大的建筑，但这一时代最好应被定义为一个伪象征主义的时代。但愿这一定义不如人们对古典主义的冠名那样简明易懂，人们曾以学生般的无知给这一出色的诗歌和拉辛那硕果累累的风格一个绰号：伪古典主义，这一绰号便贴附在这一宏大的风格上了。俄国的伪象征主义，是真正的虚伪的象征主义。茹尔登在暮年时发现，他一生都一直在用散文说话。俄国象征派也发现了这样的散文，即词的亘古以来的、形象的天性。他们封存了所有的词、所有的形象，只将它们用于弥撒，结果非常地不舒服，无论是通过，是起立，还是坐下。在桌上不能吃饭，因为这不仅仅是桌子，不能点燃火光。因为这会引起使自己也感到不快的东西。

人不再是自己家中的主人。他不得不生活在教堂里，或是在祭司神圣的树林里，人的主人的眼睛无处可以歇息，无处可以得到安慰。整个容器都造反了。扫帚请求下班，陶罐不愿再煮东西，而要求绝对的意义（似乎煮东西并非绝对的意义）。主人被赶出了家，他再也不敢走进家门了。该怎样将词固定在其使命上：难道这就是奴隶制的依附？要知道，词不是物，它的意义绝对不是它自身的翻译。实际上，从来不会有人给一个物施洗，用事先想好的名字去称呼它。

最合适、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将词看作形象，亦即词的想象。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排除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如果说语音是形式，那么其余的一切就都是内容。还可以排除另一个问题：词的意义和它发声的天性，何者是第一性的？词的想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组合，一种关系，一个“体系”。词的意义可以被视为一只纸灯笼中燃烧的蜡烛，而反过来，声音的想象，即所谓的音幻觉，又可以位于意义之中，亦如那同样的灯笼中同样的蜡烛。

旧的心理学只会将想象具体化，在克服了天真的唯我论的同时，又将那些想象视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存在的因素便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意识产品的客观现实让那些想象与外部世界的物体相接近，使得想象能被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科学的异常迅速的人性化，将认识的理论引入此处，把我们推上了另一条道路。想象不仅能被视为客观的现实，还可以被视为人的器官，和肝、心脏完全一样。

对于词来说，词的想象的这一认识开拓出了新的广阔前景，使得我们可以去幻想建立一种有机的诗学，这一诗学的性质不是立法的，而是生物学的，它为了机体的内部运动而消灭了陈规，它具有生物科学的所有特征。

构建这种诗学的任务由一个有机的俄语抒情诗流派来承担，这一流派于 1912 年初由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创意成立，其正式成员有阿赫玛托娃、纳尔布特、森凯维奇和本文作者。研究阿克梅主义的文献很少，阿克梅派首领们的理论阐述也不多，这使得对这一流派的研究变得困难起来。阿克梅主义源自一种拒斥：“远离象征主义，鲜活的玫瑰万岁！”这就是它最初的口号。戈罗杰茨基曾有过尝试，要在阿克梅主义上嫁接一种文学世界观，即“亚当主义”，一种关于新的大地、新的亚当的学说。这一尝试未获成功，阿克梅主义没有过多涉及世界观，它只不过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趣味感受，这些感受比思想更有价值，这主要是一种对于词的完整呈现之兴趣，对新的有机理解中的形象之兴趣。

文学流派不是靠思想而活，而是靠趣味而活，只带来一大堆新思想，而没有带来新的趣味，这并不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新流派，而只是引起了一场论战。反过来，仅依靠趣味，不需任何思想，就可以创建一个流派。

对于象征主义而言，致命的东西并非阿克梅主义的思想，而是其趣味。阿克梅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部分源自象征主义者，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本人便为阿克梅主义理论的构建多有贡献。但是，你们请看有什么奇迹发生：对于那些生活在俄语诗歌内部的人而言，新的血液已在它的血管中流淌。据说，信念可以移动群山，可我要说，在诗歌方面，趣味可以移动群山。正是由于世纪之初在俄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趣味，拉伯雷、莎士比亚和拉辛这样的巨大山峰才挪动了位置，来我们这里做客了。就对文学及其重量和负载的能动爱好而言，阿克梅主义的举力是巨大的，而这种能动爱好的杠杆就是一种新的趣味，一种针对诗歌和诗学的男性意志，在它的中心站着一个人，他没有被伪象征主义的恐怖压垮，而像主人一样，是被象征环绕的真正的象征主义，也就是说是一个器皿，这器皿拥有词的呈现，一如拥有其部件。

俄国社会不止一次地体验过对西方文化心脏进行天才阅读的时刻。比如，普希金以及与他同时的整整一代人，就阅读了谢尼耶；比如，接下来的一代，奥陀耶夫斯基的一代，就阅读了谢林、霍夫曼、诺瓦利斯。比如，60 年代的人就阅读了他们的巴克尔，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理想的相遇还是在这里实现了。

如今，一阵风翻过了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书页，它们展开在时代最为需要的地方。拉辛在《淮德拉》中展开了，霍夫曼在“谢拉皮翁兄弟”中展开了。谢尼耶的韵律和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也都展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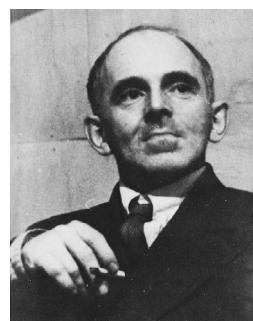
阿克梅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俄国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与阿克梅主义一同，俄语诗歌的精神力量得以复兴。勃留索夫曾言：“我想有一艘自由的船四处航行，我会同样歌颂上帝和魔鬼。”这种贫乏的“虚无态度”在俄语诗歌中永远不会再重复出现。俄语诗歌的社会激情到目前为止仅上升至“公民”层面，但还有一个比“公民”更崇高的因素，即“大丈夫”概念。

完善的勇敢精神的理想，取决于我们时代的风格和实际需求。一切都变得更为沉重、更为巨大了。人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更坚硬，这一信念决定了诗歌的祭司性质。世纪将不再喧嚣，文化将沉睡，民族将再生，把自己最好的力量赋予新的社会阶级，这整个的洪流将把人类词语的脆弱的船带进未来的广阔海洋，那儿没有同情的理解，那儿将有现代人敌意和偏袒的清风去代替忧伤的注释。怎样装备这艘远航的船，要给这船补充上那非常陌生、非常亲爱的读者所需的一切东西？我又一次将诗比喻成一艘死者的埃及航船。生命所需的一切均已备下，在这艘船上无人会被遗忘……

但是，我看到许多反驳的可能性，看到对阿克梅主义的拒斥开始出现，一如伪象征主义的危机。纯生物学不适合用来构建诗学。生物学的类比是个好方法，富有成效，但是其持续不断的应用却得到一个生物学定律，与伪象征主义定律一样咄咄逼人，让人难以忍受。关于艺术的生理学理解就像是“灵魂的哥特式理性深渊”。萨列里值

得尊重和热爱。他听到的代数音乐和活的和声同样有力，这并非他的过错。

一种以作为对象的词为基础的鲜活诗歌取代了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取代了觊觎纯粹象征和词的抽象美学的贵族幻想家，取代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这一鲜活诗歌的创作者并非理想主义的幻想家莫扎特，而是严厉、严谨的手工艺大师萨列里，他向物和物质价值的大师伸出手去，向物质世界的建造者和生产者伸出手去。



曼德尔施塔姆

俄国著名诗人。生于华沙，在圣彼得堡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早年曾参与阿克梅派诗歌运动，赢得了阿克梅诗派“首席小提琴手”的称号。他曾两次被捕，长年流放，多次自杀未遂。1938 年死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生前出版诗集《石头集》《忧伤集》《诗》，散文集《时代的喧嚣》，文论集《论诗歌》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ourtney Garvin](#) on Unsplash

非虚构

一部独特的女儿回忆录，直视深埋的创伤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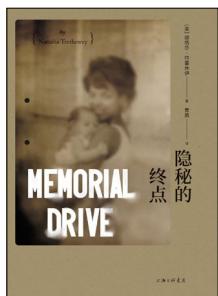
娜塔莎·特雷休伊 | 新书推荐

“你知道有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意味着什么吗？”

十九岁时，娜塔莎·特雷休伊的母亲死于继父的枪口，她的世界从此被彻底颠覆。面对生与死的重负，她选择回避这段经历，掩埋悲伤。时隔三十年，她终于重返案发现场，翻阅信件、日记和警局档案。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中，她试图重现家族昔日的南方生活、母亲作为黑人女性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不幸遭遇家暴的悲惨历程。

《隐秘的终点》是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娜塔莎·特雷休伊首次完整公开这段经历，讲述家庭暴力和种族主义对个人及社会造成的创伤和持续影响，探索这段记忆如何重塑自己的生命，使她成为一名诗人和作家。

以下经风之回响 RESONANCE 授权发布。



1972年夏末，我母亲和我永远离开了密西西比。当她跟随收音机轻声哼唱，我望着松枝在车窗外倏忽掠过。在我的回忆里，她唱的总是同一首歌，诱惑乐队的《那只是我的想象》，虽然我知道我一定记错了。这首歌在1971年首次发行，不那么经常播出，尤其不会在长达一天的旅途中反复播放。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曾无数次见

她哼唱那首歌，在熨衣板旁扭动腰肢，而夕阳从背后照亮她的身形，即便现在，我也将她保留在相同的瞬间里——她将唱针一遍遍地放到电唱机上。这是我仅有的，她看起来栩栩如生的画面之一，没有大部分记忆中笼罩着她的那层阴翳般的帘幕，透过那层帘幕，我不得不看见并洞悉一切。仿佛未来已经摆在我面前，仿佛命运已等候在我们正愉快驶向的那片地域。

早在我出生之前，我母亲已在考虑离开密西西比。在她写给我未来父亲的信里，她哀叹自己出走的愿望落空，因为在密西西比有那么多增进种族关系、为黑人争取更多机会的工作要做。“我想挣脱这里，”她写道，“但我知道，我的州需要我。”1964年夏末，我母亲搬去更好的地方居住的愿望已经超越了她留在密西西比的心愿。置身密西西比之外，在南部附近几个更大的城市，远距离目击那些历史事件，于她乃是大开眼界。她寄回的一张明信片上，城市熠熠闪亮的天际线映衬着夜晚，她给我父亲留言：“亚特兰大趣味无穷，”她说，“提醒我跟你详述……”

毫不奇怪，她会被作为新南方崛起之象征的亚特兰大城所吸引。在民权运动的年代，亚特兰大因种族问题上的激进态度声名卓著，而随后在1960年代的社会动荡里，它又被城市领导者毫无反讽意味地昵称为“一个太忙碌而无暇憎恨的城市”。然而，在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拥有另外一个名字：1837年建立的亚特兰大作为“铁路的尽头”诞生。作为计划中的铁路交汇点，“终点”是它最初的名字。

我回想起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行驶了一整天，汽车后备箱负载着我们所有的财产，几乎拖拽着在路面上前行。当我们沿着第20号州际公路来到城市远郊，亚特兰大的天际线仿佛突然之间从树林上方升起。在薄暮倾斜的光线中，它仿佛明亮的天空下一块二维的幽暗剪影。如果我母亲看到的是类似于明信片上的理想画面，那这正是我俩对于这段旅程叙述的分歧所在。在给我父亲的一封信里她的描述是乐观的：“旅途顺利，”她写道，“只花了八个小时。”此外无他。可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旅途绝非她所描述那样轻省。相反，困扰我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象：浓烟从汽车的引擎盖里翻滚而出，朝着亚特兰大的天际线飘荡。我知道这发生过，但发生在几时？或许，那些年的创伤让我折叠了时间，将到达之后几个星期内发生的事件叠合在一起。又或者，我母亲隐藏了她的真实境遇，她已习惯如此。在这件事上，我可以想象原因：我父亲经常催促她进行车辆保养、换机油并保持液位。她不愿让他知道自己并未做好恰当的防护，尤其在与我一同踏上漫长的旅途之前。

这是我所记得的：我母亲熄灭引擎，紧握方向盘让汽车滑向高速公路的边沿。车停下来，我看不见她在胸前画十字，嘴唇安静地翕动。一个我熟悉的姿势——我曾看见过启智计划的修女们这样做——但我不明白为何在浸礼会教堂里成长的母亲也这样做。十多年后我才知道，她转信了天主教。虽然，在此后的岁月里，我将经常看到她画十字的动作：我想那更多算一种护身符而非祷告。

我们背靠护栏站着等候援助，似乎等了很久。我母亲让我紧紧偎依着她，而汽车在我们身边疾驰而过。她穿着我喜欢的那套酸橙绿的连身衣裤：短裤，一条宽腰带系在她纤细的腰肢上。这让她看起来像漫画书里的女英雄——神奇女侠和路易斯·莱恩，亚马逊复仇者和聪明的事业女性的混合体，内心爱慕着从天而降、拯救世界的超人英雄。那一刻我紧贴着她，脸颊压在有罗纹的衣料上，向着城市遥远而多丘的地带扬起头。当浓烟缓缓飘向天际线，我难以抑制地想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随时会被火焰吞噬。

或许这就是头脑耍的诡计，努力让过去的一切变得有意义，努力去寻找一条叙事的线索，并解读——回溯——我们在当时没有留意的那些征兆。在我们离开密西西比前的那些日子，我时常哭泣，暗自希望我们可以不用走，希望某些事情发生以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仍旧与外祖母同住，住在我父亲和那个大家庭附近。此刻，看着拖车司机和他的灭火器，目击我母亲的焦躁不安，我隐约感到自己对我俩陷入的困境负有责任，仿佛我的行为带来了坏运气。

我已然是个迷信的孩子：回避人行道上的裂缝；在我外祖母扫地时绕道而行，以免扫帚碰到我的双脚；如果碰到了，就向它吐口水；在伯祖母休格家的餐桌上打翻了盐罐，就把盐从肩头撒向背后；说某些固定语句以消除某些刻意行为带来的厄运——或者更糟糕——它因为我无意间做过的某件事情而到来。伯祖母休格说，所有这些“阻止了恶魔的脚步”。和许多孩子一样，我还有轻微的强迫症。我的玩具须

得以准确的角度和相同的间距安放整齐。我对它们的位置谙熟于心，能一眼分辨它们是否被移动过。自从我学会系鞋带，我就执迷于对称，两根鞋带必须在松紧度上绑得完全一致。有时候，我一次次反复拆绑鞋带，只为尽善尽美。我开始感到，至少有些东西可以由我掌控。

认知理论学家认为，普通的侵入性想法如果被错误地诠释，将导致执迷和强迫行为，而在这些行为、童年时代的迷信，以及离婚、搬迁、至亲去世等创伤造成的环境因素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我不知道我孩童时代的迷信是在哪一刻让位给某种更强烈的东西的。更有可能的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片刻，而是一个逐渐积累、升级的过程，或许就在那个陌生城市道路边沿最初的心惊魄动的几分钟里，我的焦虑导致了错误诠释：关于灾难的想法。当我站在地上抱住我的母亲时，我伸出两根手指在脸上摹画从前额到鼻梁至嘴唇的轮廓线——一遍遍地，让手指在两侧的用力完美地平衡。我母亲在两辆拖车到来时画着十字，而我的动作看起来一定像是对她的拙劣模仿。

我们抵达的亚特兰大城正在经历着人口、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戏剧性变革。就在十多年以前，学校正式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曾经竖立在亚特兰大城西南部，阻止黑人搬入白人社区附近的路障被法院下令拆除，与之呼应的，是白人居民迅速逃向城郊。1960年，黑人居民占城市人口不到三分之一，但至1970年，他们已经占据了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在一片曾经属于白人的领地上，我母亲为我俩找到了栖身之所：一幢双层公寓，靠近我即将报到的威尼斯山小学。

在1962年一张七年级的班级照片里，显示的全是白人的脸庞。到了1972年秋天，当我进入一年级学习，我的班级里却没有一个白人同学。我记得整个学校都没有。除了几个没有到郊区工作的白人，学校里的大部分老师都是黑人。那些留下来的，和新雇来的黑人老师一道，全心拥护学生的种族转变，并采纳了一套持续一整年，而非仅仅在黑人历史月使用的课程，其中包含美国黑人的历史和他们对文化作出的贡献。仅在十年前，在学校尚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时期遗留下来的《迪克和简》读本，描述了一个没有黑人角色的世界。

威尼斯山小学的墙壁上装饰着杰出的黑人男女的肖像：伊达·B·威尔斯、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兰斯顿·休斯、玛丽·麦克劳德·白求恩。每天，当我们完成在书写板上拼写单词的功课后，便沉醉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唱约翰·亨利挥舞他的榔头，跟随我们的老师背诵邓巴的方言诗，挥舞双手表演约翰逊的《创造》：创造太阳剩下的余光 / 上帝把它集束于一个闪亮的球体 / 然后将它掷向黑暗 / 用月亮和星辰让黑夜清辉盈满。在学校里，我仿佛被另一群祖先环绕，无论他们离得多么遥远。沐浴着他们的余晖，我和同学们完全忘记了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他们宁愿搬离附近社区，也不愿意送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道上学。在集会上，老师们带领我们唱黑人的国歌《扬声高唱》，我们双手捂住心口，就跟唱《星条旗永不落》同样热血沸腾。

在亚特兰大，学校是第一个让我感到自在的地方。我可以只身在学校和校车站之间往返。那些下午，我一边蹦跳着沿路返回，慢吞吞做着白日梦，一边采摘道路两旁盛放的花朵，黑眼苏珊、黄水仙或白水仙。我母亲在公寓里等我。一切与在密西西比时并无太大区别，那时候，我父亲除周末以外都在学校待着：我和母亲两个人独自面对世界。

但我依然难以习惯这个陌生的地点。我的睡眠时断时续。两层楼的公寓显得大而空旷。在一层，狭长的楼梯背后有一块闲置的空间，夜晚，它看上去像洞穴的入口。这足以加剧童年时代的恐惧，它们在我离开密西西比之前就已在心中生根——总是担心某种可怕之物会在黑暗中显现。我的朋友德德和我都不敢长时间看向我外祖母幽深的壁橱内部，于是我们编一些有什么潜伏在那里的故事，并以此为乐。她会讲述魔鬼如何把人带到地狱门口，土地如何裂开，而魔鬼拽着你的脚踝将你拉进去，或者你如何穿过一道本不应穿过的门，发现自己已置身冥府。我们也玩血腥玛丽的游戏，拉起遮光帘，让正午的房间像午夜般黢黑。站在一面镜子前，我们轮流召唤血腥玛丽，念三次她的名字，以便她能够在镜中显形。最后一个音节尚未吐出，我们当中的一个便尖叫着呼唤圣克里斯托弗前来护佑，另一个猛地拉开遮光帘，让明亮的光线奔涌进来，以驱逐我们此前召唤的一切东西。

如今，远离外祖母的宅邸所提供的安全感，我已无法轻易驱逐那怖骇之物。夜里，

如果我必须去洗手间，我会紧闭双眼，不去看黑暗中我母亲梳妆台上的镜子，以免从那里发现什么。我也不会下楼去厨房喝水，害怕看见有什么藏匿在楼梯背后。

我母亲决心帮助我适应新环境里的生活，让我快乐。一天下午，她心生一计，要把楼梯底下的空间装修成我的游戏室。我们没有试图将它变得敞亮，而是利用那黑暗——就像夜晚仍在工作的头脑：一个梦幻之地，充满创造力，丰饶多产。我们在跳蚤商店找到了所需的一切：一卷宽宽的黑色天鹅绒，长度足够覆盖天花板和这个狭窄空间的入口。我们用厚纸板和铝箔做成小星星，泡沫塑料制成的行星上缀满亮片，能够攫住最细微的光。她在门口悬挂标语：星空下娜塔莎的房间。

我拥有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和一个搁板，用来放置我的书和我所有的圣物：一枚顶针、一双木质线轴、我外祖母曾在教堂里使用的一把手绘绸扇。在我们离开密西西比的那天早晨，她将它们全都放进伯祖父桑的一个旧雪茄盒里。“你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孩，”她说着把我拉到她身边，揩去我脸上的泪水。每当我在那个小空间里打开雪茄盒，空气里便充满了熟悉的香味。我坐在那儿，一寸一寸地在头脑的视域里唤起对我外祖母宅邸的记忆。我在学校也开始这么干，在休息时间和任意一群愿意聆听的孩子一起。对我们离开的那个家的反复回忆变成了一种安慰。我日复一日地回想每个房间里器物的准确位置，环绕房屋的庭院和沟渠，并用栩栩如生的细节来讲述它们。也许正因如此，相对于我们在亚特兰大第一年生活里的许多时日来说，那部分记忆显得更为真实：我已经开始将我认为的需保存之物形诸语言，为了避免它的丧失。

抵达亚特兰大不久，我做了一个噩梦：我站在外祖母家宅邸的背后，在户外的庭院当中，土地突然开始摇晃。朝下看，我目睹大地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而我一只脚踩在裂缝的一侧。当我醒来，我努力按照母亲教给我那样，用愉快的图像替代令人不安的画面。我想象花朵和糖果，明亮而斑斓。我一遍遍地念叨黄水仙、棒棒糖，直到它们的意义消失，变成纯粹的声响。我只身在黑暗里，试图安抚自己入睡，我听着隔壁屋里母亲有节奏的呼吸声，直到它和我自己的呼吸节奏一致。

大部分时间我们在一起——白天，她捧着书坐在门廊上，看我玩跳房子或骑着自行车沿公寓门口的人行道来来回回。每周六我们外出游玩，最常去的是公共图书馆，在那里，印有我名字的浅蓝色卡片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货币。我母亲在阅览桌上工作，而我在童书区里漫游，一连几个小时乐而忘返。我尽可能多地借出图书，躺在书堆间的地板上阅读，直到离开。我们的公寓里没有空调，图书馆让我们得以短暂地躲避炎热的印第安之夏。

某一周天气凉爽，她带我去格兰特公园的动物园。动物园里最惹人瞩目的明星是威利·B，一只银背大猩猩，关在那儿许多年了。我母亲几乎没有停下来瞧它一眼，而我却在铁笼前徜徉，试图通过直觉获知它的思想。它一动不动地蹲坐着，仿佛芬克斯，忧郁地朝后瞥一眼聚集在它周围的稀稀拉拉的看客，一台小电视机是它唯一的伙伴，在背景中微弱地闪光。

“它悲伤吗？”我赶上母亲问。

“难道你不会吗，”她说，“像那样被隔绝，形单影只？”在她的语调里有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开始使用我惯用的辩证法。

“但是为什么？”我问。

“你指什么？”

“为什么它形单影只？”

“因为它身在囚笼里。”

“但它为什么会在囚笼里？”

她的眼睛望向别处，许久才转过头来，双眼灼目的阳光而眯成一条缝，“为了让你可以到这里来看它，”她说。

“但是为什么？”我再一次问，并不清楚我在问什么，也不清楚我想要什么答案。

“我们可没在玩那个游戏，娜塔莎，”我母亲愠怒道，她抓住我的手转身离开。她变得沉默，陷入沉思，我想我不知怎么让她失望了。

我把我的那些日子分为两栏加以衡量：我做了让她高兴的事，映衬出她的可爱，那些日子里，她叫我“甜蜜的梅子”，把我的脸捧在她的手心里。在另一些日子里，我做了让她伤心、受伤或沮丧的事。我记得另一个周末，在电影院里，她以同样的

方式抓住我的手。我们去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场电影，在接近尾声的一个场景里，战壕里的士兵们身负重伤，有的即将死去，彼此间却展现了极大的柔情。我被共同经历造就的战友情谊，男人们之间高尚的情感和休戚与共的情景深深感染。越南战争造成的大量伤亡，返回家乡的黑人士兵面临的种族歧视完全被我抛在脑后。我满心渴望地冲口而出：“我希望我长大后也能遇到战争。”她迅速站起来，抓起我的手，沿着座位间的走廊几乎是将我拖出了放映厅，而屏幕上的演员名单还在滚动。

她的坏情绪从未持续太久。她总是很快原谅了我，这让她显得阴晴不定。我知道她是双子座，天性变化无常。她可以甩给我一张发怒的脸，随即又换成另一张。我曾经猜想，那系在她钥匙链上的金坠儿意味着什么。我父母一人有一个，我父亲的钥匙串上挂的是一只迷你金手套，是他参加金手套锦标赛的纪念物，她的则是一个雅努斯面具护身符，那个悲喜剧里的双面神。这是她大学时期参加戏剧社团的纪念品，但它同时也是她性格的象征。多年以来，她经常佩戴的是塔利亚的面具——那张笑吟吟的脸；而她真正的面容，正如她的想法一样，在大部分时间里向我隐藏。

—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取悦我的母亲。在学校，我不仅阅读和写作课成绩优异，在数学方面也开始出类拔萃，这个进步让我母亲感到惊讶而愉快。为了奖励我，她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洋娃娃回家，把它放在楼梯顶端。当我努力解答数学作业里的方程式时，它就端坐在那儿。当我母亲大声念出问题，等待我作出回答，我能一眼望见它，就在她的肩头上方，仍然裹在玻璃纸包装里。我不知道开了多久小差。我母亲敲碎我的幻想，严厉地说：“别想要那只娃娃，除非你答对所有方程式。”

我曾经偷偷将目光投向楼梯平台，梦想与洋娃娃一同玩耍吗？或者，我曾经向着它的方向仰头沉思，仿佛试图从以太中提炼答案吗？我十分清楚：我的渴望之物是对完美的奖赏，若我足够聪明，便能获得，而我母亲的快乐建立在我的学业之上。我被羞耻感战胜了。即便现在，它当中的某些东西还会回来伤害我。伤人的是什么呢？我将愿望如此明白地写在脸上，抑或我被误解了——我俩互不了解对方，无论当初，还是现在？

当时日渐短，晚饭后所有时间我都待在游戏室里——那儿离厨房很近，能听见母亲翻书的声音。我坐在我的小书桌旁，读书或照料她买给我的洋娃娃，模仿她在书桌边的样子——手掌托腮，若有所思地从工作中抬起眼睛，或者当她训斥我时拉长下颌的模样。我们的日子遵循着一个平稳的模式，在那段时间，我与洋娃娃过家家看起来正像我们的生活本身：没人能打扰我们的亲密无间，没人能闯入这对母女的故事。

我母亲无法知道，我俩独自在一个崭新的城市里生活的那几个月带给我的影响，以及我如何深深地眷恋两人独处的时光，母亲和女儿的二位一体。她也不会知道，因为远离家园，我那增长了的孝顺之心，不仅促进了我的驯顺，也造就了我的缄默。当我试图想象在那一年里母亲——一个28岁的年轻女人——站在新生活的岔道上是怎么想的，我难以在她写给父亲的信件里找到些许线索。“一切顺利，”她告诉他，“我在亚特兰大地下城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叫矿井的餐馆。”

—

那封信以后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傍晚，我母亲把我叫出游戏室，去见一个站在我们厨房门口的男人。他又高又瘦，长鬓角描画出脸的轮廓。他也斜着眼睛看我，一只眼睛似乎比另一只睁得更大些。

“乔尔，这是塔莎，我母亲对他说。他朝着厨房的方向退了两步，伸手去够一只椅背，我能看到他的手微微发颤。

“我该怎么称呼你？”我问。

他回答的方式让我不安，我好奇母亲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你可以随便叫，”他咧嘴而笑，他的笑容也是歪斜的，当他嘟起嘴说你的时候，上唇抽搐了一下。

我摇动长长的辫子，这是我的习惯，仿佛在驱逐一个想法。“我可以叫你大伙计乔，”我说，然后蹦跳着离开厨房，回到我的游戏室。从那时候开始，他对我而言就是大伙计乔了。这个称呼确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提醒我俩他并不是我的父亲。

也许那就是我提防他的原因——他姿态里的某种东西——即便当他扮演着我母亲那乐于助人的男友角色，自告奋勇在她上课的那些下午前来看护我。我开始定期见到他。在他照料我的日子里，我们时常驾车周游城市，这后来成为了多年以来我俩的交往模式。他似乎喜欢漫无目的地驾车漫游，仿佛只是为了待在他花了许多时间照料的那辆车上——一辆黑色的福特银河，带着洁白无尘的内饰、白壁轮胎，和被他擦得锃亮的铬合金装饰。

我远远地靠着客座车门坐着，试图从关得严丝合缝的窗口呼吸新鲜空气，而他抽烟，当他吸气的时候，雪茄尖端发红的余烬像一盏闪烁的红灯。我小心翼翼，不让自己显得焦躁，或做出任何吸引他注意力的事情，只在他跟我讲话时简短回答。八声道立体声系统播放音乐，低音砰砰砰像放大了的心跳声：柯蒂斯·梅菲尔德唱《弗雷迪已死》或《推进者》。对这些歌曲的理解，让我又悲伤又焦灼，仿佛那张唱片并非电影配乐，而是在描述我和大伙计乔在一起的时光，我在亚特兰大城的新生活的一部分。当音轨改变，《惹眼》传来，他用颤动的假声跟着哼唱，完全不着调子。窗外，风景像音乐一样循环往复。我那时并不知道，我们沿着285号公路行驶，那是亚特兰大城外的一条绕城公路。

这些驾车旅行总是富于教益，我能回忆起最早学到的是如何辨识你是否被警察驾驶的未标记车辆尾随。“在汽车仪表盘的中央，会有一个像小脑袋一样的圆形凸起，”他告诉我，仿佛这是我必须知道的一样。从那时起，我观察他怎样经常地扫视后视镜，我自己也有意查看，希望真的有人在尾随我们。

每一次返回公寓，我都长舒一口气。无论与他共同乘车出游多少次，我都会担心他在某个地方遗弃我，而我将永远失去我的母亲。我为这种可怕的想法惩罚自己，一次次将它们从头脑中驱逐出去。这是一种有魔力的思维方式，孩子们相信通过它可以致使某些事情发生，就像迷信的人相信你得施展某些法术以阻挡灾祸——相信灾祸是可以用某种方式阻挡的。神话里的教训并不支撑这一论点：如果有人相信卡桑德拉的话，多少灾难将得以避免。然而没有人信。

换一种方式去看待卡桑德拉的重荷的神话。既然没人拿她的劝告当回事，也许她就开始认为，唯有她的沉默能阻挡事情发生。与其说出来，用语言召唤出灾难，不如缄口不言，保守秘密。

我没向母亲讲起过与大伙计乔在一起的这些下午，也没告诉她我担心，某一天，他会做什么。

—

当我回想那个遥远的夜晚，目睹我母亲为了去亚特兰大地下城的矿井餐馆工作而盛装打扮，想不起她是否已经遇见他了，那个将成为我继父的男人。也许他们正是在那一晚相逢的。我只晓得那是冬天，亚特兰大的黄水仙已经盛开。我晓得我为她采摘它们，一把黄色的水仙花——在母亲和女儿的神话里，这花朵被用来将珀耳塞福涅诱向她的宿命：被冥王绑架。她摘下明亮的花朵，大地在她脚下裂开，将她吞入黑暗的咽喉。

仿佛我重写了这个神话，通过将那一束乱蓬蓬的黄水仙递给她，将我的厄运传递给了母亲。那个夜晚，当她降至城市地下去工作，我母亲已然步入了一座冥府，她再也无法完整地从那里归来。



娜塔莎·特雷休伊

美国诗人、作家。美国西北大学温伯格艺术与科学学院董事会教授。2020 年博比特国家诗歌终身成就奖、2007 年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美国第 19 任桂冠诗人。著有非虚构作品《卡特里娜飓风之外：密西西比海岸的沉思》；诗集《纪念碑：新诗选》《奴役》《家园保卫者》《贝洛克的奥菲利亚》《家务劳动》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George Grosz](#), (1918) *Gefährliche Straße*

非虚构

1933 年，46 天里， 集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命运

乌维·维特施托克 | 新书推荐

从魏玛到纳粹，从浪漫到独裁，
巨变中的德国社会肖像

1933 年 2 月，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随即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展开迫害，活跃在德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作家和艺术家首当其冲，在纳粹当政初期的短短一个月内，这些作家、艺术家或遭监禁、枪决，或被迫逃离德国。

《文学之冬》以切近的视角和细腻的叙述，记录从 1933 年 1 月 28 日到 3 月 15 日每一天里发生的迫害和逃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多位文化巨匠的遭遇。这短短一个多月成为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

以下经万有引力授权发布。



1月31日，星期二

临门之斧

托马斯·曼很紧张，但并非由于昨天的政治结果，而是文学原因。他的儿子克劳斯刚从柏林和莱比锡回来，想和他谈一谈希特勒。可他现在没这个心思。

过去几周，他不得不再次搁置小说《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为 2 月 10 日将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理查德·瓦格纳逝世 50 周年纪念日的演讲做准备。关于瓦格纳的音乐剧，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这是他生中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经验。最初他以为会速战速决，结果却一发不可收，讲稿变成论文，然后发展成本小书。他的想法和灵感喷涌而出，最后不得不努力构思，才能让它不致太过臃肿。

不仅如此，在他答应去慕尼黑之后，荷兰的瓦格纳协会请他去阿姆斯特丹的国家音乐厅，希望他再做一次演讲。另两份法语演讲的邀请也接踵而至：比利时笔会请他去布鲁塞尔，然后去巴黎的大使剧院——在巴黎他甚至要讲两次，一次用法语，另一次用德语。这是一轮光荣的小型欧洲巡演，却也给托马斯·曼添了额外的麻烦。还在写稿期间，他就不得不请他的法国朋友、日耳曼语学者费利克斯·贝尔托帮忙翻译。几天前他才写完文章，现在必须马上把它缩短成适合演讲的长度，这无异于直接对自己的肉下刀。译稿一出来，他还得不断练习，至少别把法语讲得太磕磕巴巴。



托马斯·曼在慕尼黑的别墅中，
1932 年

没什么时间留给政治。更何况在过去一年中，他已经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谈论过自己对纳粹的看法——一场试图以革命之名欺世的骗局。他不能一再老调重弹。普鲁士文化部前部长阿道夫·格里梅鼓动他去柏林参加社民党的竞选活动，但他只打算明天或后天写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声明，好让格里梅能在会上宣读。他还能怎样？

茶余饭后还是免不了谈论政治话题。埃丽卡和克劳斯对局势感到紧张，克劳斯显然读过了所有报纸，连《人民观察家报》也没放过，还模仿左翼媒体面对政权更迭时故作克制的痛苦语气说话。饭后，两个孩子出发去埃丽卡的胡椒磨歌舞剧团彩排，2 月份的节目明天就要首演了。对于卡巴莱小品来说，希特勒上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话题。

戈培尔睡饱了觉，开始与同僚们讨论近在眼前的选举计划。宣传的第一个高潮应该是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的葬礼。他宣称这两人是“民族运动”的“烈士”，在“胜利之夜”被“红色谋杀犯”“卑鄙”地枪杀。他要在柏林大教堂为两人大摆排场，要极尽奢华，还要安排声势浩大的游行。虽然柏林大教堂是新教教堂，而佐里茨是天主教徒，但戈培尔可不管这些。

尤其顾不了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之死的真相。最近几个星期，许多冲锋队队员担心纳粹党会让他们干脏活。他们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街头战，现在，当政治目标终于触手可及时，党首却想摆脱掉他们，独吞所有胜利的好处。圣诞节后不久，六十多个夏洛滕堡冲锋队队长曾会面商讨此事，他们认为，上面会不择手段，尤其是戈培尔。戈培尔的线人报告说，迈科夫斯基曾放开嗓门宣布，若是那样，他就亲自动手，击毙戈培尔，没有半点迟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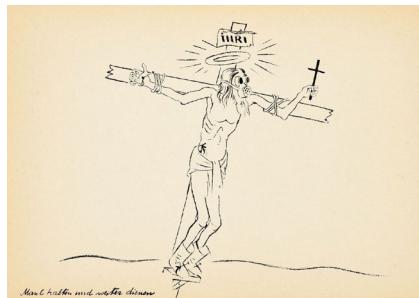
因此，对于戈培尔来说，采取反制措施是聪明的政治行为。作为柏林的党部头目，他身边始终围着冲锋队，他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他们，但不能放任迈科夫斯基吹嘘什么用一颗子弹让他脑袋开花。戈培尔必须让每个冲锋队队员明白，企图暗杀他而不受到惩罚，想都别想。幸运的是，弗里茨·哈恩对他手下第 33 冲锋队的人了如指掌，知道有个叫阿尔弗雷德·布斯克的人靠得住，此人会为了一笔不错的赏金干掉迈科夫斯基。前一天，布斯克找准时机完成了任务，并顺手一起解决了警方唯一的证人

佐里茨。若有其他人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戈培尔也没办法。警告四处传开，他可不会任人威胁。

想到已被他除掉的迈科夫斯基还能为自己派上用场，戈培尔很满意。宣布迈科夫斯基是“烈士”，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他要让迈科夫斯基像国王一样下葬，还要亲自在迈科夫斯基的棺材旁讲话。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大教堂，献花圈，默哀，演奏管风琴乐，发表感人的演讲，然后穿城送殡。一出相当热闹的大戏。

傍晚，一支冲锋队小分队冲进威尔默斯多夫位于特劳特瑙大街 12 号的宁静的房子。一到目标公寓门口，这些人就踹开门，冲了进去——却发现房间里已是空荡荡。没有租客，没有家具，没有画，什么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墙。他们犹豫了片刻，从这个意外里缓过神来，然后跑回街上，右转跑向拿骚大街。他们冲进拿骚大街的一栋房子，用斧子砸开门，可画室里依旧空荡荡。没有人，目标人物都走了，他们来得太晚。

冲锋队在找乔治·格罗兹，他是一名画家、设计师和漫画家。纳粹恨他，就像恨其他几个艺术家那样。他不仅用画作攻击他们信仰的和认为神圣的一切——他们的元首、他们的男子联盟、他们对战争的热情，还嘲笑他们，把他们表现为自负的傀儡、酒鬼、麻木的暴徒、嫖客和流氓。任何想在政治斗争中被认真对待的人，都不会低估这样的对手——讽刺可以致命。可就算控告他侮辱国防军或攻击公共道德也无济于事。格罗兹曾在《闭嘴，当你的差》这幅画里给十字架上的基督画了防毒面具和士兵的靴子。因为渎神，他和出版商威廉·赫兹费尔德被一次次告上法庭。诉讼拖了四年，从 1928 年一直拖到 1931 年。



《闭嘴，当你的差》

这些案子最后均以无罪释放或小额罚款而告终。让纳粹怒不可遏的是，格罗兹因此越来越出名。但持续不断的法律攻击也令他身心俱疲。没完没了的仇恨和争端对格罗兹毫无益处。他越来越怀疑，理性究竟能否坚持到底，随之增长的还有他对自己艺术的内在推动力的怀疑。无论讽刺得多妙，讽刺的影响力究竟是否被过度高估了？他还能寄希望于仅仅通过愤怒的艺术就让愤怒的大众睁开眼睛吗？

这时纽约来信了。艺术生联盟为他提供了 1932 年夏季的教职。格罗兹很兴奋，因为从小美国就吸引着他。他立即接受，仿佛凭借它能突破眼下绝望的局面。五个月后，他乘坐横跨大西洋的巨型汽轮返回德国。还在舷梯上时，他就告诉前来迎接的妻子伊娃，他回来只为带她和孩子们最终移民美国，过完圣诞节就走。

这样做，他赌上了很多。在德国，他是功成名就、人脉极广的艺术家；而在美国，他几乎什么都不是。他将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不得不重回艺术学校当老师，每月赚 150 美元。能否再次以画家的身份闯出名声，他还不确定。但他心意已决，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是他的怀疑。他要离开这个国家。

他和伊娃把公寓退掉，只收拾了一点东西。格罗兹送光家具，清空画室，将画作和书籍存放在岳母那里，然后就像块木头，从一条不为人知的暗河上漂走了。1933 年 1 月 12 日，“斯图加特”号从不来梅港起航，船上载着格罗兹和伊娃。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装在了三个箱子和三个手提箱里。孩子们被留在格罗兹的姐姐家，他们会在那里住到夏天。在这次跨洋之旅中除了忍受颠簸之苦，他们还在纽芬兰附近遇上了 12 级大风。不过，1 月 23 日他们在纽约上岸时，已是一片春光。一周后，希特勒成为总理。八天后，冲锋队拿着斧头站在他们的旧公寓和画室门前。

今日要闻

- 一个十到十二人的纳粹小队还刺杀了社民党的国会议员尤利乌斯·莱贝尔，当时他正带着两个保镖行驶在回家的夜路上。他们袭击了莱贝尔的车。其中一个保镖

把一个纳粹分子打成了重伤，莱贝尔也在战斗中受伤。袭击发生后，警察逮捕了莱贝尔，据说是由于他袭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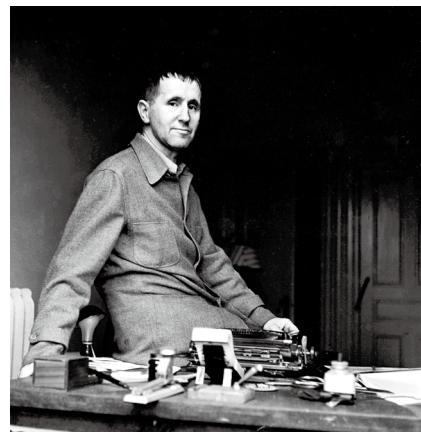
- 在布雷斯劳，一名警察中尉向一支共产党游行队伍开枪，杀死了一名示威者。
- 在杜伊斯堡 - 汉博恩，在一场共产党员和纳粹党成员的巷战中，一名纳粹党成员和一个本地人被杀。另有三名官员受枪伤。
- 在埃森附近费尔贝特，一名共产党员因试图拆掉纳粹旗帜而被打死。傍晚，共产党员冲入一个冲锋队住宅，两名纳粹党成员受伤。
- 在汉堡附近哈尔堡，一名铁路官员在工区里因政治争论杀死了一名同事。肇事者随后开枪自杀。
- 在齐陶，纳粹报纸《上劳西茨早讯》的当地代理被发现死亡。
- 流感迅速蔓延。仅在柏林，今天就有 572 例新增病例。

2月2日，星期四

劣等外族血统

布莱希特在达姆施塔特惹上了麻烦。他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原定在黑森邦剧院首演，却遭到纳粹党抗议。在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纳粹议员得到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他们联合要求警方出具禁演令。为戏剧爱好者协会举办的内部演出也被禁止。只有社民党捍卫着剧院总监古斯塔夫·哈通自由安排剧目的权力。

哈通算是德国国内最重要的导演和戏剧创新者之一。布莱希特认识他，也了解他的作品。哈通 1931 年来到达姆施塔特，此前他曾在柏林的文艺复兴剧院担任过三年负责人。《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是布莱希特对教会和资本主义半嘲讽、半教育性质的清算。这部作品三年前就完成了，但至今仍只能以删减版的广播剧形式在广播中播出，卡萝拉·内尔、海伦娜·魏格尔、弗里茨·科特纳和彼得·洛尔等优秀的演员均曾为其配音。



布莱希特

和之前在柏林一样，古斯塔夫·哈通在达姆施塔特的剧院也不采用民间作者的作品，而是选择了埃尔泽·拉斯克 - 许勒、埃里希·凯斯特纳、弗朗茨·韦尔弗或卡尔·楚克迈耶的剧目。《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极为轰动的首演将把这份名单延续下去。但这也足以成为纳粹在《黑森报》上大肆诽谤哈通的理由。他们指责哈通上演“外族血统的劣等品和陈腐的杂耍伎俩”，指责他的剧院偏爱雇佣犹太人。

这是对宪法保障的艺术自由的侵犯，可自由派德国国家党的市长鲁道夫·米勒没有反对，而是做出了妥协，以迎合市议会中被激怒的议员：他谴责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教会倾向，但为古斯塔夫·哈通的总监工作作了辩护。在他看来，纳粹的反犹指控尤为荒唐：州剧院的 361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3 名犹太人。他说，这不能称作“犹太化”。

流感继续迅速蔓延。今天柏林上报约 800 个新增病例，其间，本市学校 200 多个班级不得不停课。英国已有千余人死亡。作家汉斯·米夏埃利斯从日本向《柏林晨邮报》发回报道，提及了一种预防感染的新措施：“病菌面具，一块剪成椭圆形、系于口鼻前的黑布，担负着抵御病菌入侵的重任。”然而，让米夏埃利斯惊讶的是，

日本人只在户外佩戴这种面具，在地铁或办公室里就会摘下来。他们坚信，流感病毒主要在大街上传播，而不是在密闭的室内传播。

今日要闻

- 负伤的社民党国会议员尤利乌斯·莱贝尔被警察暂时释放。但武装人员埋伏在市警察局前，向送他去医院的汽车开了火。不久后，莱贝尔再次被捕。吕贝克的工人们决定为此举行 24 小时的抗议罢工。
- 在阿尔托纳，共产党员和纳粹分子爆发枪战。一位与妻子散步的行人被击中肺部，死于医院。另有 10 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 在柏林 - 夏洛滕堡，一名共产党员在与纳粹分子打斗的过程中被刺身亡，另一名共产党员负伤。

2月3日，星期五

被缝上的舌头

在基希投宿的莫茨街，还住着埃尔泽·拉斯克 - 许勒。她在萨克森霍夫酒店有个小房间，这里离纪念教堂边的罗曼咖啡馆、施利希特餐厅和施万内克酒馆都不远。埃尔泽·拉斯克 - 许勒喜欢有作家、艺术家、出版商、画商、演员们聚集的地方。这是她逃离现实的避风港。曾有几年，她是柏林当之无愧的波希米亚女王：她顶着一头醒目的黑色短发，孩子般娇小的身体总裹在宽大的袍子和天鹅绒夹克里，戴着玻璃项链、哗啦啦响的手镯，每根手指都套着戒指。她仿佛是来自东方的舞女，却给自己起了童话似的男性名字，自封了一个贵族头衔——底比斯的优素福王子，因为她对任何界限都不以为然，不论是虚实、阶层，还是性别。

她下周就 64 岁了，日子过得很难。5 年前，她的儿子保罗死于肺结核，即使夏利特医院的主治医师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也无力回天。事出意外，令她猝不及防。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不赚钱，如她所说，每天靠 15 芬尼过活，一直欠着酒店的账。

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她正重返舞台。去年，她同时有两本书在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一部新诗集，另一部短篇小说。她还写完了新剧本《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与里夏德·比林格一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起初她很委屈，因为只能得一半奖、拿一半奖金（750 马克）。但随后她就收起了骄傲，乖乖领奖，用奖金还了欠酒店的债。

她过去的情人，戈特弗里德·贝恩，发来电报祝贺：“您让常因颁奖者或获奖者受辱的克莱斯特文学奖重返高贵。”他们的情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 1913 年那会儿，他们是很不般配的一对：他，26 岁，事业刚刚起步；她，44 岁，已是德国先锋派的核心人物。他是牧师之子，却不信教，一心要把宗教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浇灭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她是拉比的孙女，信仰和信心天经地义地弥漫在她的诗中。虽则如此，或正因如此，激烈的爱情让他们在几个月里难舍难分。两人都在诗中提到



埃尔泽·拉斯克 - 许勒

过那种“兽爱”。贝恩写道：“欲望所向，用牙齿抓牢。”拉斯克 - 许勒则说：“我总把你带在身边，安置在我的齿间。”连分手也被定格在诗行里，她固执：“我是你的过客。”他同样坚决：“无人是我的过客。”

当然这都是老皇历了。今天，埃尔泽·拉斯克 - 许勒给她在伍珀塔尔的“财政大臣”克劳斯·格博哈特写了信。格博哈特是丝绸制造商、艺术收藏家，也是个很好的朋友。每次她要和出版社谈合同时，他就会出手相助，对于这些事她一窍不通。有时候，格博哈特还会催促那些稿酬支付太迟的出版商。因此她任命他为她的私人财政大臣。她喜欢给自己认为重要的人起新名字，他们由此成为她诗意世界里的生命。比如，贝恩是她的“野蛮人吉泽赫尔”或“老虎吉泽赫尔”。

那是一封活泼的信，干脆利落，热情洋溢。她擅长此道，几乎给所有人写信都是如此。她受到邀请，去她的出生地埃尔伯费尔德参加一场读书会，因此请他出面谈一笔 200 马克的报酬。她还盛赞席勒剧院为《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首演排练所付出的“巨巨巨巨大的努力”：“大事件！”

然而，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她的真实处境，包括格博哈特。去年的成功并非皆大欢喜。原本她几乎已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但克莱斯特文学奖却让纳粹重新注意到她。她是犹太人，看起来像来自东方的梦幻人物，她写现代的、极富表现力的诗——在纳粹眼中，这一切都罪不可赦。《人民观察家报》恼羞成怒：“贝都因酋长的女儿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几个男人迅速出现在她的酒店前等她，他们辱骂她、推搡她，直到她摔倒倒地不起。有一次摔倒时，她狠狠地咬到了舌头，不得不缝了几针，成了一位被缝上舌头的女诗人。

《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也惹上了麻烦。去年春天，剧本终于完成时，大导演和剧院总监们蜂拥而至。古斯塔夫·哈通反应最快，他从达姆施塔特来信说他有多么欣喜，希望她把首演的权利给他，她同意了。随后，她还同意了马克斯·莱因哈特和莱奥波德·耶斯纳将分别在柏林的德国剧院和御林广场剧院这两个国内最好的舞台上演出该剧。两人都只能排在哈通的首演后，而一般像莱因哈特和耶斯纳这样的明星可不愿意等。

然而，前天，哈通心情沉重地给她写了信：很遗憾，他不得不推迟首演。目前，他正在达姆施塔特艰难地反抗纳粹党，因为他把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列入了演出计划，也因为他的剧院被认为雇了太多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推出《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一部犹太女人创作的剧，就会让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雪上加霜。这像是在公然挑衅，眼下他做不到，请她再等等。

所以，她现在把赌注押到了席勒剧院，耶斯纳正在那儿排练。商定的首演时间或是 2 月 12 日，或是 2 月 19 日，但还没确定。无论如何，耶斯纳为这部剧投入的心血让她感动。希特勒上台之后，它正好能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讲述了近百年前发生在威斯特法伦一个村庄里的反犹大屠杀。在一个犹太地主、他极富魅力的小儿子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帕德博恩主教的共同努力下，情势最终险为夷。最后一幕中，睿智的主教表率性地参加了地主家的逾越节晚餐，并为以色列人民祈神赐福。当纳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德国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时，埃尔泽·拉斯克 - 许勒却在她的剧中赞美宗教的和解。耶斯纳是犹太人，也是个政治上很清醒的戏剧人，难怪他向她保证，拍戏时会投入“巨巨巨巨大的努力”。

晚上，卡尔·冯·奥西茨基将为人权联盟演讲。活动争取到贝多芬大厅的场地，那里空间很大，是柏林爱乐音乐厅的扩建工程，环绕着明艳的壁画、水晶吊灯和石膏花饰的立柱，是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场所。联盟的执行主席库尔特·格罗斯曼为此很是自豪。然而，当格罗斯曼带人在入场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时，大厅所有的门都上了锁。他紧张地把管理员从办公室叫出来，后者却递给他一封警察局局长的信：禁止集会。原因荒唐不堪：鉴于激烈的政治局势，“不同见解”的参会者可能会对奥西茨基的演讲不满。有了这种理由，选举周内任何地方的任何言论都可以被禁止。

可时间太紧，活动没法叫停。格罗斯曼迅速作出决定，让到场的客人移步，去不远处波茨坦广场的弗里迪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几年前还叫乔斯蒂咖啡馆，至今仍是市内最受欢迎的咖啡馆之一。他也把奥西茨基引去了那里，但一位友好的警官明确告诉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演讲。奥西茨基灵机一动，坐到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



卡尔·冯·奥西茨基

开始与朋友们大声谈论社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其他桌的客人都饶有兴致地听着。这种事警官干涉不了。

对于许多民主人士与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近年来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导向人物，是一位共和国的英雄。1929年4月，《世界舞台》刊载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德国军方不顾《凡尔赛条约》的禁令，建立空军的秘密计划。结果，受审的不是相关的国防军官员，反倒是文章作者和责任编辑奥西茨基。他们因叛国罪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此案引起了国际轰动，德国竟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在蓄意违反《凡尔赛条约》的禁令。

许多朋友和政治伙伴警告奥西茨基不要真去坐牢，恳请他到国外躲一躲。但他另有打算。1932年5月，他开始服刑，但并非出于对法庭的尊重，而是，如他所写，以此向不公正的司法机构“亲身示威”。他在政治斗争中赌上了个人自由。若干同事、作家和名人一路护送他去往泰格尔监狱，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里希·米萨姆、莱昂哈德·弗兰克、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恩斯特·托勒和讽刺作家亚历山大·罗达·罗达。就这样，他们把他入狱的第一天变成了针对这一可耻判决的抗议集会。

六周前，奥西茨基才因兴登堡例行的圣诞大赦提前出狱。今天的演讲本应是他获释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听众想听一听他对希特勒新政府的看法。

今日要闻

- 在厄尔士地区安娜贝格，一名黑红金国旗团的成员在人民之家前被纳粹枪杀。
- 在杜伊斯堡－汉博恩的一场混战中，纳粹将一名共产党员打成了重伤，这名共产党员最后在警察局里不治身亡。
- 纳粹在柏林－莫阿比特枪杀了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柏林－新卡伦枪杀了一名21岁的德国共产党员。



乌维·维特施托克

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曾在《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日报》《焦点》杂志等媒体担任文学编辑，曾获得特奥多尔·沃尔夫新闻奖，著有《剃掉胡子的马克思》《现代性之后：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论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生活的故事》等书。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1877 年大宫花园，摄影：[Felice Beato](#)

非虚构

1839 年， 当一个叛逆的女人来到江户 艾米·斯坦利 | 新书试读

一个东亚女性用一生战胜命运的真实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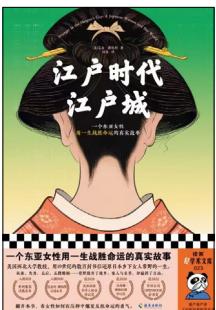
1839 年，一个名叫常野的日本女人逃离家乡，从乡下徒步前往首都江户。这一年她 35 岁，离了三次婚，她的家人急着再把她嫁出去，无论对象是谁。

在江户，日子比在乡下要苦得多，常野只能住在三叠大小（约 5 平方米）的房间里，甚至没有一件可供换洗的外套。作为外乡人，她的生活脆弱如浮萍，火灾、饥荒、幕府改革……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毁掉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家乡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常野认输回家，可是她没有。

《江户时代江户城》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艾米·斯坦利的作品，她偶然读到了常野在江户写给母亲的信。此后，她花了十年时间，一次次从美国飞往日本，从数百封信件和无数档案中还原了这个 19 世纪的日本乡下女人艰难但顽强的一生。

经读客文化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六章《城市生活的新装》分享给读者。



常野的日常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比在旗本府邸里打扫榻榻米、给水壶挨个儿灌水的几个星期要好。她为主人的新茶室备茶，这件事，她多少知道一点。尽管她家的物品清单里没有提及任何茶具，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理应熟悉跟茶相关的基本知识。她还做些跑腿工作（这是人人都能做的事），其余时间用来做针线活儿。她甚至为主人缝制了一件很难做的加厚丝绸纺纱长袍。缝纫是她引以为傲的手艺，她很庆幸自己长于此道。会做针线活儿的女佣比不会的女佣挣得多，有时甚至挣得跟做随从的武士一样多。

常野让母亲从家里给自己寄一把尺子来，虽然在江户买一把新的尺子很容易。或许那把尺子是她用着最称手的，或许只是因为熟悉它。不管置身何处，针线活儿的例行仪式都是一样的：挑开细密的针脚，锋利的刀子裁开丝绸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很久以前，她跟母亲和妹妹清美一起练习，在庭院里堆满大雪的漫长冬天，靠这打发时间。她一直在为不同的生活做准备。她一定想过，有一天，她会教女儿怎样缝纫。

虽然没能如愿，但仍有理由心存感恩。戏院区传来了鼓声。叫卖蔬菜的小贩已经把菜切好，方便下锅。人偶们摇晃着木制的小脑袋。茶室布置优雅，她的地址上有着显赫的主家名字。她手里攒下了硬邦邦的银两。

还有，越后那些头发稀疏、大嗓门儿的讨厌老头子，没有一个成为她的丈夫。

从冬天直到春天，常野都要直面其他人有衣服可以换洗这件事。哪怕是在隆冬，阳光明媚的日子，后巷里也挂满了长袍、罩衣和样式各异的内衣。和服是分成一段一段晾晒的，它拆解开来，等晾干了再重新组装；罩衣用衣架撑起，宽大的袖子伸展着，在寒风里微微飘动。直到春末，花园里的盆栽开花之前，它们是灰尘扑扑的小巷里唯一的彩色斑点。大部分洗干净的衣服是条纹或花卉图案的棉布衣服，有的褪色了，有的衣角已经磨损。但也有少数丝绸衣物。按照十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上所说，服装的标准正不断提高：“过去，除了武士，农村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拥有一件加贺丝绸制成的条纹或带图案的外套。但现在，哪怕是后巷匠人，也无人不有。”这个说法太过夸张了。比如常野就没有加贺丝丝绸衣物。但这些挂着晾晒的衣服，仍然是一连串惊人的展示：每一件衣服都宣告有人拥有一样常野还不曾拥有的小小奢侈品——额外的换洗衣物，洗了一套还有另一套可以换。

与此同时，全彩印刷的匿名美女画像和歌舞伎表演广告，让常野知道了这座城市最时髦的人穿些什么。诚然，很多戏剧与历史人物有关，中世纪的武士服装也不在讨论之列。但其他戏剧是以当代女性为原型来塑造角色的：艺伎和店主的女儿。常野可以研究图案的形状、衣领的起伏、腰带的确切折痕、木屐的高度，并依靠直觉判断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里会流行些什么。一些舞台画像已经开始创造时尚史了：五代目市川团十郎的女佣角色，掀起了一股名为“团十郎茶”的颜色风潮；佐野川市松扮演一名在劫难逃的年轻情人，他的表演引发了对黑白格“市松纹样”的狂热。五代目半四郎也有自己的纹样：半四郎方点，这种图案看起来像是麻花叶子首尾相扣。如果常野看过 1840 年 1 月的一份印刷广告，就能看到了不起的演员尾上荣三郎打扮成艺伎的样子。他裹着带紫色、橙色和绿色格子的罩衣，穿着缀有白色斑点的浅红色衬裙。

常野的黑衣服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不显脏，但很惨的是，她太不合乎时尚了。如果她还有别的罩衣和外套，是可以拿去交换的。哪怕是高级武士也习惯了光顾城里的当铺，那里卖的漂亮衣服价格相当优惠。就连全身是洞、几乎没法穿的衣服，也能找到买家。总有捡破烂的背着不成形的肮脏包袱走街串巷，他们什么都愿意收。常野绝不会想从他们手里买东西，但他们本来也不卖：他们会把当天收到的旧货送到神田川沿岸的货摊，破衣服会在那里洗干净了再卖。这是一座廉价旧货市场，休闲购物者可以很方便地买到东西，但对习惯了漂亮东西的常野来说还不够档次。

团十郎茶



“团十郎茶”

离人偶街只有几条街的富泽町，有一座出名的二手服装市场。这个地区得名自 17 世纪初的大盗弯泽半藏（此为音译，Tobizawa Kanzō），只是发音略有不同。弯泽半藏被捕后有可能被处以死刑，为求保命，他跟幕府做了一笔交易：幕府赦免他，条件是他得从事合法职业，做二手服装买卖，并留心通过这条渠道处理赃物的其他窃贼。在他的同名市场里，收购相对高质量服装的经销商，会碰到购买并转售它们的掮客。有些东西会卖给江户的服装贩子，他们与拾荒匠恰好相反，肩上挑着挂有二手衣物的竹竿走街串巷。其他衣物会出售到东北诸省的商户，那里的农民渴望购买江户淘汰的废旧物什。常野家乡的一些邻居说不定就穿过来自富泽町的二手衣服。常野从前总是比他们穿得好得多，但眼下，她甚至没钱穿得足够暖和。她恳求哥哥幸笃：“我其余的好东西都不需要。只是，求你，求你把我的厚外套和两件旧棉袍送来给我顶顶寒吧。”她还向母亲索要一条围裙、一面镜子、一只发夹和一把梳子，这样就能好好梳头了。

至少，常野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赤贫者长期承受着衣物不足之苦，一些家庭的外衣比人丁还少。幕府甚至赞许过德行高尚的女儿在严冬不穿衣服，好让父母有长袍穿。与此同时，体力劳动者（以男性为主）习惯了近乎赤裸地干活儿。他们买不起衣服，而且做的工作也不需要穿衣服。他们只在腰间缠着兜裆布，推着手推车，扛着轿子，背着包袱和信件在城市里奔走。赤身裸体是他们地位低下的标志，就像武士在腰间佩带的两把佩刀一样清晰可见。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一缺点，苦力们用五颜六色的文身装点自己的身体，文身从背部一直延伸到大腿，他们用厚厚的长袍和盔甲、闪闪发光的鱼鳞和龙鳞，以及直立的虎毛来遮挡暴露在外的皮肤。这些标记是反抗的象征，借鉴了幕府为罪犯文身的做法，同时也是以体力为生者骄傲的勋章：他们已经在江户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有着稳定的收入积攒银钱，多年来能坚持一周又一周地拜访文身师傅。

有些人穿的长袍，是用几十张厚纸做成的。为此，要先把厚纸揉皱软化，接着用柿子汁处理隔热。这种衣服气味奇怪，但还算暖和。如果是用新纸制成，它们可以染成任意颜色，但绝对不能用水洗。还有更便宜的用旧纸做的衣服，上面还残留着印刷文字、插图和墨汁乱写乱画的微弱痕迹。最初，它们是歌舞伎的表演服，曾短暂地受到欢迎，人们为模仿它们，穿上装饰有随意涂鸦的高级丝绸。这是街头风格的高档版，把绝望打扮成城市魅力。

在常野居住的街区，每个人都明白服装和幻觉的道理。制片人、木匠、人偶雕刻师、发型师、画家、作家、布景设计师——他们都靠着维持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象为生。但年复一年地，它逐渐有磨损穿帮的迹象了，仍然有人出手阔绰得叫人啧啧称奇。有传言说，歌舞伎戏院河原崎座 1839 年制作的《国姓爷合战》里，三位主角的戏服花掉了 1000 枚小判，远超大多数旗本的年俸。但别的戏剧，大多没那么成功，演员只能穿从远处看起来显得豪华的戏服。明星们仍然穿着金线刺绣的中国丝绸。但这些戏服并不新，剧团会在演出间隔期送去典当，等到推出新戏时再赎回。

据说，名角们（包括五代目半四郎在内）一年能拿到的酬劳仍然超过 1000 两金币，戏院为了付钱给他们，可谓殚精竭虑。戏院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筋疲力尽地反复重建。再加上夜晚人群密集，灯笼众多，戏院区很容易失火。有好几次，一家甚至几家大戏院悄悄没了声息。尽管歌舞伎仍有铁杆粉丝购买戏单，排在狭窄的鼠门前等候入场，但普通观众正逐渐萎缩。看戏太贵了，更何况可以看的东西还有很多。帐篷表演只需花几个铜板，有珍奇的鸟儿、豪猪、散发着臭气的鲸尸，还有完全用扫帚做成的高耸雕像。这类演出的明星是女摔跤手和耍蛇人、机械人体模型、胖得离谱的人、巨人、长着阳具的女人、长有鳞片的男孩。还有一个半是野人的孩子，能把自己的眼球挖出来给观众看。哪怕是最优秀的歌舞伎演员也没法跟这样的奇观争风头。

大型歌舞伎戏院的确努力想借鉴帐篷演出的一些魅力。19 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它们的表演呈现华丽的幻觉和怪诞的奇观。到了常野住在那儿的时候，它们把戏剧的背景放在江户最污秽的角落，把主人公设定为出身低微的人。为了自己的主公牺牲一切的武士仍然出现在舞台上，但也加入了其他许多类型的角色：从不知道自己父母的被遗弃的孤儿、流窜的强盗、丑恶的鬼魂。推崇传统者大感绝望，一位剧作家抱怨歌舞伎“绝对已经触底”。



歌川国贞《东海道四谷怪谈》

但是，这些新剧目捕捉到了江户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让人们关注到欺骗——为生存所需，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机制。靠着丝绸外套和钱，靠着纸袍和文身，人们塑造出一种坚不可摧的形象，但这从来没法叫人完全信服。或许，在衣服下面，江户所有的人都像歌舞伎剧《东海道四谷怪谈》里的女主角一样：当丈夫剥下顺从妻子的和服、拔掉她的发夹，打算用它们到当铺换取现金时，女人开始陷入疯癫状态，容颜尽毁。或许，江户的每个人都在用衣服和发夹来保持一种理智的幻觉。或许，他们原本都是善良的人，只不过，当他们一次次地发现永远没法抓住自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们就变成了鬼怪。

新年伊始，常野的母亲终于寄来了一个包裹：两件棉袍。林泉寺的内勤传八把话说得很清楚：常野仍然是被正式逐出家门、断绝关系的。这些东西只是她妈妈担心她挨冻送来的非正式礼物，这正是常野需要的东西。后来她家里甚至还送来了一个更好的包裹，里面有无衬长袍和少许配饰，但两个包裹写的收件人都是她的前租屋家守甚助。甚助的妻子拿走了所有东西，甚助本人甚至连一件无衬和服都不肯给常野。常野仍然欠着他的钱，他大概认为自己有权拿到赔偿。在常野看来，他是个可憎之人。她给家人写信说，要是再送包裹到他家，应该加写一封恫吓他的信。

但通信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什么也不能。

越后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常野认输回家。来自石神村的朋友、林泉寺的信徒矶贝安五郎在离开江户、回乡下去春收之前，成天念叨这事。常野深感失望，因为安五郎是自己跟村里的唯一联系，她希望他能把自己新生活的近况带给她母亲。“我想告诉他很多我没法轻易用文字写出来的事情，”常野写道，“但每回我见到他，他都会说：‘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所以，我想对他说的许多话最终未说出口，我觉得这太丢脸了。”

转眼到了夏天，道路通畅了，她的家人认为是时候让她回家了。她收到了传八恳求她回家的一封信，她流着泪，把信读了好几遍。义融仍然不肯写信，但她总归并未失去自己的家人和村庄。然而，她必然会叫他们失望的：她不会离开江户，回到林泉寺令人窒息的生活里。就这方面而言，一切毫无改变。“我理解你们认为我应该在本月十八九日回家，但请恕我难以从命，”她写道，“不管我多么担心令你们不快，我仍然不打算嫁给一名鳏夫。”她的话听起来很冒犯，她担心这会疏远家人。她知道自己说这话的分量，当她的违逆以文字形式出现在家人手里，甚至会显得更加震撼。“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又放下，反反复复十多次，即便如此，我还是为难得发抖。”她承认她很担心，但她意志已决。“毕竟，”她写道，“不管我写了什么，全都出自我的内心，请本着这种精神读这封信吧。”在信的末尾，她再次列出了自己仍然需要的东西：衣物、手帕、几块备用布匹和一把尺子。

常野有一件衣服可遮身，有一份自信可掩饰恐惧，还有一份工作可填补生活。这只是一套戏服、一个角色，但足够她过活了。

春去夏来，在江户的后巷，1840 年还跟普通的年头一样。就在第一批鲤鱼旗挂出来庆祝男孩节之后，雨季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成千上万把雨伞似乎一下子就打开了。而当云层散开，数百万把纸扇又代替了雨伞。

在夏天最热的日子里，只要买得起，人人都吃鳗鱼。白天长到了极限，而横跨午夜的夜猫子时段几乎消失。戏院上演廉价的恐怖剧，卖鲱鱼寿司的小贩开始卖活金鱼。和往常一样，城里的流言充斥着可怕的通奸和谋杀故事，町奉行张贴在大门和布告板上的告示，说的则都是寻常事情。春天，他们责备职介所未能充分调查求职者的背景。几个月后随着夏天的到来，一份公告提醒人们不得在人群稠密处生火。夏末，町奉行表彰一名善良的理发师之子，因为他全身心地照料瘫痪的年迈父亲。唯一稍微叫人兴奋的公告赞许了一名巡夜和门卫的勇气，面对一名精神失常、拔刀威胁路人的男子，他们夺下了他的武器。

仲夏的一个节日，两国桥附近人群聚集。桥下的广场挤满了喧闹的小贩和敲锣打

鼓的狂欢队伍，灯笼多得让夜晚亮如白昼。河面上，两队驳船上的人把点燃的鞭炮投向空中，比着看谁能放出更漂亮的烟火。有一阵子，小贩、锣鼓和江户所有人头顶上，都是烟花的一声声璀璨绽放，接着消失在烟雾中。灰烬像雪似的落在波光闪闪的河面上。

常野想到了越后。在夏天，雪乡似乎变得更近了，因为这时道路通畅，信件往来更快，不过，也有许多季节性移民已经离开城市去收割庄稼了。常野决定留下来，而来自石神村邻村的一名叫井泽博辅的人也决定留下来。两人在江户相遇之前，常野已经有 24 年没见过他了。井泽还是个孩子时，她就认识他，那时她是寺庙住持的女儿，他则是蒲生田村村长的儿子。他从前经常跟她的兄弟们一起玩。“你就像是他的弟弟，”常野写信给义融，“自然跟他很熟。”现在，每当两人见面，他们就聊起越后。博辅还经常给家里写信，能为她带来过去认识的人的消息，这番善意让常野倍觉感激，因为义融还是不肯写信。

她和博辅都觉得，老了以后还会回到越后。他们都希望死在家里，在田野与大山的围绕下，身边陪伴着认识了一辈子的人。

和常野一样，博辅放弃了乡下的稳妥人生，到江户城里冒险闯荡。他为旗本做过短工，等得到雇用，他便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合格的武士。有时，在他和别人的信件里，他被叫作浪人，也就是没有主家的武士。这里有个技术性的细节：他的地位是暂时的，后代不能继承。他只是个自封的武士。不过，在受雇之后，他仍然穿着武士的长袴，佩戴家徽，人们尊重他所代表的家族的显赫地位。有时，他甚至会佩刀。因为博辅能够流利地读写，并有一定家族资源的支持，他比那些被老板派遣到兵营的普通下等人地位略高。他会像赶牲口一般驱赶工人，并分得后者的部分收入。对一个打定主意留在城里的人来说，这足够维持生活了。而且，从名声上听来，似乎也是村长儿子可以接受的一条出路。

博辅对常野说想要娶她。他至少是第九个产生这个念头的人——她结过三次婚，拒绝了五名追求者，只有这些人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家族保存的文书上，而没出现过的，兴许更多。但博辅是第二个未经常野父母或哥哥转达，直接向她提出这一请求的人。第一个是她竭力拒绝的智鉴，那是在差不多一年前，前往江户的路上。博辅的情况不一样。他认识她的家人，还说不想冒犯失礼。他的求婚是正式的。

可供做决定的时间不多。博辅不怎么有耐心。他说，要是常野拒绝了他，他就去另娶别人。但常野的经历教会了她谨慎小心。她认为，他们应该再等等，经常见面，重新熟悉一番。毕竟，过了 24 年，互不了解的地方太多了。眼下，她在江户的处境相对稳定：她喜欢自己的主人、街坊和工作。她的女佣同伴们（常野会向她们寻求建议，借用衣服），从实际的角度评估了她的处境：“你现在很穷，但薪水还不赖。如果你靠自己谋生，不必听从别人，你是成功还是破产无关紧要。你会习惯的。”既然一个女人能独自在城里生活，何必找丈夫呢？

但一路驱使常野来到江户的自信，在能更清晰地看到将来的这一刻，变得有些动摇。她的财务岌岌可危，而且还欠着家守甚助的债。“你们都知道，”她写信给义融，“此刻，哪怕我想方设法地赚钱谋生，我也得自己购买每一双筷子和茶碗。这儿的东西太贵了。我难求温饱，哪怕凑够了四两金币，也必须拿给甚助。这让我很心痛，也很担心。”与此同时，对智鉴看走了眼的事，也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她请寺庙内勤传八把自己最初从江户寄出的信，都交给她母亲保管。“留在你处，让我甚是尴尬。”她写道。她想忘掉跟智鉴在一起的那几个星期。她不想留下让自己受辱的记录。

博辅可以帮常野偿还部分债务，解决她的财务问题，况且她门前也并没有更好的丈夫人选在排队等候。“如果博辅和我答应试试看，”她写道，“那么，只要我最终没能变成江户某个富人之妻，那就比待在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况里好。”博辅也可以结束她和义融无休止的争执。如果她已经有了丈夫，哥哥就不可能把她再嫁出去。她情不自禁地重申：“就算我一辈子待在家乡，我也绝不愿意嫁给鳏夫。”

此外，在对义融的反击里，似乎也夹杂着一丝满足感。三次了，常野的家人让她嫁给他们选中的男人，决定要她去的地方。他们会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给她讲一些关于对方家族的事情，而她便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寺庙的女主人、农民、城镇妇女。可现在，选择权回到了她自己手里。

这一回，不再有宴会了。没有人可以主办，也没有人可以邀请。更重要的是，没人付钱了。没有人会采购鲸鱼肉，摆好清酒的酒杯。没有人会列出用人的名单、嫁妆的项目。没有满是邻居和朋友、唱着歌的送亲队伍，也没有家具从一户人家搬到另一户人家。只有常野，一个人，还有她好使的头脑、不灵光的眼神以及求生的本能。

一个邻居带着常野结婚的消息来到林泉寺，义融这才知道。全家人既惊且喜，虽说常野的母亲仍然希望她能回家。义融素来是个负责的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博辅自己背负的担子：“你兴许知道，她是个很自私的人，如果事情进展不利，请把她交回家。”但他也很有礼貌地祝福这对新人好运：“我们真诚地希望，由于你们一家人的善意与同情，你们可以幸福生活。你让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母亲，深感心安。”

这样的心安，是常野一家迫切需要的。那是不幸的一年。义融和常野的妹妹伊野去世了，他们的母亲患病，佐野怀孕困难。内勤传八患上了眼疾，无法轻松读写。就连义融也感觉不太舒服，很难保持通信。他给博辅（连带着也是写给自己的妹妹）写信时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还给常野寄去了一份包裹：更多的衣服、被褥和一些用于缝纫的丝绸。现在，她需要的一切都有了。

常野知道博辅是个普通人，但他愿意做她的丈夫，这产生了一种魔力。她曾是耻辱和困窘的源头，遭到家人抛弃，不配得到善待，不够格称职，不值得信任，而且孤独。一年多的时间，她写信回家，家人给她的帮助都十分勉强，还略带侮辱的意味。但就因为“已婚”这个词，她的地位改变了。她得到了救赎。

博辅自信能改变常野的生活，倘若从这个角度责怪他，倒也很容易。和常野一样，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同样离开了越后，翻山越岭，在同样的街道上奔波，寻找工作。但他在这座城市里来来往往，仿佛自己本来就有资格在这里。他从不曾像常野那般感到脆弱。他不会招来智鉴那种不受欢迎的关注，也不会面临要么屈服、要么被抛弃的抉择。他也不必承担后果。如果他曾遭受欺骗，如果他也有伤疤，那么，他至少不必为此道歉。

另外，常野一辈子都知道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他们学习的技能不一样，书写的词语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遭遇的命运不一样。哪怕是在净土里重生，女人也比男人难。一些传道的僧人说，女人会下一重地狱，那里专为用经血和分娩之血玷污了地球的人所保留。许多女性自觉罪孽深重，捐钱乞求救赎。常野从没想过自己长大后能跟父亲一样做一名僧侣。她从不曾想过能像哥哥一样会写汉诗，代表寺庙参加村中集会，向将军的属下撰写正式的请愿书，或是计算纳税款项。那就如同给她剃度一般荒唐可笑。

《女大学》的第一行写道：“为女之道，既长则嫁，善事夫家。”常野在孩提时代就了解过这个概念，不是这本给女孩看的读物，就是那本。它们说的多多少少都一样。对常野来说，她 12 岁就嫁去了大石田，事情无疑就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名女性都了解到，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身为女性，必然会感到羞耻、自我怀疑，最重要的是，到处都是约束。奥妙在于，要学会占据允许她们生存的空间，一如在其他遥远的地方，女性学着用缠小的脚走路，戴着嘴嚼子呼吸，甚至把非难视为优势。毕竟，扛重物的女性不能穿紧身胸衣，也不能缠足，非常贫穷的妇女没钱学习礼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不会写道歉信。

常野的笔下勾画出日文字母优美的线条。她使用的是柔和、女性化的语言。她对很多事情感到愤怒，但这怒火，对准的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概念。她对家守甚助而非支付房租感到火冒三丈。她懊恼的是自己的哥哥，而非父权家庭制度。她怎么可能因为自己是个女人而生气呢？她压根儿不知道除了女人还可以成为其他什么样的人。



艾米·斯坦利

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史、城市史、性别史，2023年获古根海姆奖。她偶然读到了常野在江户写给母亲的信。此后，她花了十年时间，一次次从美国飞往日本，从数百封信件和无数档案中还原了这个19世纪的日本乡下女人艰难但顽强的一生。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八、2024.2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